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伟人之初 领袖篇

周恩来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周恩来青少年时期大事记
（1898—1927）

1898 年诞生

3 月 5 日　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县）城内的驸马巷。幼名大鸾。

9 月　过继给叔父周贻淦。不久，嗣父去世，由嗣母陈氏抚育。

1903 年 5 岁

进家塾读书。取学名恩来，字翔宇。

1904 年 6 岁

随父母、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镇外祖父家居住，在万家家塾继续读书。

1905 年 7 岁

随生母和嗣母从外祖父家迁入陈家祖辈的旧居——陈家花园，在家塾中读书。

1907 年 9 岁

春　生母病故。

夏　陪伴嗣母到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两个月后返回清江浦镇。

1908 年 10 岁

7 月　嗣母病故。

秋冬之交　带两个弟弟迁回淮安老家。回淮安后，曾到表舅龚荫荪的家塾寄读。龚是革新派人物，常向周恩来介绍新思想，使周恩来开始受到政治上的启蒙。

1910 年 12 岁

春　随三堂伯周贻谦去东北，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市）周贻谦家寄居，入银岗书院读书。

秋　移居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大伯父周贻赓家，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高等丁班学习。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1 年 13 岁

夏　暑假中，随同学到奉天南郊魏家楼小住，参观日俄战争遗址。
10 月　辛亥革命爆发。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

1912 年 14 岁

10 月　作《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1913 年 15 岁

春　随伯父搬到天津，住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升学。
8 月　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编入乙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

1914 年 16 岁

3 月　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被推为智育部长。
10 月　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创刊，周恩来担任编辑员，并在该刊上发表诗作、散文、小说等多篇作品。
11 月　南开学校新剧团成立，担任布景部副部长。
12 月　获南开学校“国文传观”比赛第二名。

1915 年 17 岁

2 月　当选为南开学校演讲会副会长。
5 月 9 日　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激起全国公愤。
6 月 6 日　在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奋起图强，振兴本国经济，誓雪国耻，坚决不当亡国奴。
8 月 30 日　南开学校《校风》周刊创刊。周恩来为该刊成员。
9 月　当选为敬业乐群会副会长。
10 月　在南开学校成立十一周年纪念会上参加演出新剧《一元钱》，扮剧中女主角。
12 月　敬业乐群会改选，任会长。

1916 年 18 岁

3 月　在《校风》上发表《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
5 月 6 日　代表所在班级参加全校国文会考，选《诚能动物论》为题，获第一名。所在丁二班作文成绩获全校第一，得“含英咀华”奖状。
5 月下旬　率敬业乐群会同学参观农业实验场、工业实验厂和农事讲习

所。

9 月　在《校风》上发表《吾校新剧观》。

10 月上旬　参加全校演说比赛，题目为《中国现时之危机》，演说词发表在《校风》第四十五期上。

12 月　参加全校习字比赛，获行书优胜奖。

1917 年 19 岁

5 月 2 日在《校风》第六十三期开始发表为《校风》撰写的社论《本社之责任观》（全文分六期刊载完）。

5 月参与筹编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并撰写序言。

6 月 26 日　参加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典礼，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

7 月下旬　和李福景等同学去北京筹划赴日本考官费留学事。赴日前，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到奉天母校同师生相见话别。

9 月　由天津登轮赴日本，行前写《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

10 月　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12 月　初参加南开学校留日校友会，被选为评议员。

1918 年 20 岁

1 月 2 日　诵读嗣母陈氏生前所写诗作遗墨，然后含泪焚香静坐，以表达对去世十年的嗣母的思念。

2 月 11 日　春节时，在日记中立下本年内应做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3 月 4 日—6 日　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因日文成绩不好，未被录取。

5 月　参加反对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

5 月 19 日　参加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发表入会演说。

7 月 2 日、3 日　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又因日文成绩不好，未被录取。

7 月 28 日　离开东京，经朝鲜釜山归国探亲，9 月 4 日返回东京。

10 月 17 日　参加东京留日南开同学会庆祝校庆日集会，发表演说，并当选为该会副干事。

1919 年 21 岁

3 月　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

4 月上旬　归国途中在京都停留时，写《雨中岚山》等四首诗。

4 月中旬　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约在 4 月底返回天津。

5 月 4 日　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全力参加运动。

5 月中旬　致函留日南开同学会，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捐助经费一事。后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校方此举未成。

6 月 27 日　到车站为赴京请愿的马骏、刘清扬等十名天津各界代表送行。

6 月下旬　受天津学生联合会委托，主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筹备工作，担任该报主编。

7 月 7 日　和部分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一起，出席南开学校慰劳茶话会，慰问假期中在校坚持斗争的同学，并在致词中对下步斗争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7 月 21 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刊名下方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

8 月 9 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天津其他各校学生报刊联合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周恩来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

8 月 26 日　北京、天津三四千人，齐集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28 日遭到军警驱赶毒打，请愿示威的现场总指挥马骏等人被捕。周恩来闻讯后，即和张若茗等率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在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 30 日释放全部被捕代表。

9 月 16 日　参加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的觉悟社成立大会，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

9 月 21 日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觉悟社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

9 月 25 日　出席南开学校大学部（稍后改为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为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

9 月 30 日　与郭隆真等人前往北京，为山东问题开展第二次请愿示威。

10 月 1 日　各省请愿代表在新华门总统府门前被捕。周恩来与全国学联及各省市学联负责人商定，在"双十节"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随后赶回天津具体组织。

10 月 10 日　参与主持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的共和纪念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

10 月 13 日　代表天津学联起草并发布《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

12 月 10 日　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新学联）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

12 月 29 日　根据觉悟社全体社员的讨论，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和《觉悟》两篇文章。发表于 1920 年 1 月 20 日出版的《觉悟》杂志第一期。

1920 年 22 岁

1 月 23 日　天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社会公愤。学生及各界代表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时，被反动当局逮捕。

1 月 26 日—28 日　主持觉悟社秘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出面领导。

1 月 29 日　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武装军

警镇压。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四人被拘捕，押往营务处。

2 月 6 日　周恩来等被捕代表被押送警察厅监狱。

4 月 2 日　被捕代表相继开展绝食斗争，抗议警厅的非法拘捕和迫害，提出从速开庭公审等要求。

4 月 3 日　警察厅被迫答应代表要求，代表们当晚复食。

4 月 5 日　天津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人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捕代表，当局被迫允许他们与被捕代表见面。

4 月 7 日　被捕代表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

4 月 28 日　参加代表们纪念国耻日集会，并讲述山东问题始末。

5 月 4 日　主持被捕代表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

5 月 28 日—6 月 7 日　周恩来在晚间讲演会上向难友们介绍马克思学说。

6 月 5 日　根据被捕代表的回忆和日记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完稿，后由天津《新民意报》连载，并印成单行本发行。

6 月 8 日　写《别李愚如并示述弟》一诗。

7 月 1 日　和郭隆真等人联名致信著名律师刘崇佑，提供真实情况，驳斥检厅起诉案由。

7 月 6 日—8 日　天津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周恩来等人所谓“妨碍安全及骚扰案”，周恩来等在法庭上列举事实揭露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行径。辩护律师刘崇佑反驳当局强加给爱国群众的罪名。

7 月 17 日　天津地方审判厅宣布“期满”释放周恩来等全体被捕代表。在各界欢迎大会上，周恩来报告狱中斗争情况。

8 月初　主持觉悟社年会。在会上总结一年多来开展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会后偕同觉悟社社员十一人赴北京。

8 月 16 日　觉悟社在陶然亭召开茶话会，约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的代表，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在会上发言。

8 月 18 日　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个团体的代表召开联络筹备会，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10 月 8 日　和南开同学李福景到北京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证明。

11 月 7 日　由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

11 月 24 日　在轮船航行到印度洋时，写成《<检厅日录>的例言》。到法国后，《检厅日录》全部脱稿，1921 年春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

12 月中旬　抵法国马赛港。翌日，换乘列车抵巴黎，暂住拉丁街旅馆。

1921 年 23 岁

1 月 5 日　赴伦敦，决定投考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

2 月 1 日　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

2 月上旬　因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在秋天，而英国生活费用昂贵，故从伦敦回到巴黎，在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

3 月—5 月　采访大量国际新闻，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通讯。

春　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6 月　与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

8 月 16 日　经过国内外爱国群众的奋力斗争，中法秘密借款被迫中止，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向国内报道这一情况。

8 月下旬　中、法政府当局决定停发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并拒收勤工俭学生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

9 月 21 日　由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率领的人校“先发队”冲入里昂中法大学，与校与交涉。次日，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将“先发队”一百余名队员押到法国兵营中囚禁。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开始营救工作。

10 月 13 日　在中法政府当局策划下，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一百零四名代表被强行遣送回国。随后周恩来撰写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介绍中法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

1922 年 24 岁

1 月　赴伦敦采访国际新闻，住南开同学常策欧寓所。

3 月初　由巴黎迁到柏林。旅德期间，与张申府、刘清扬、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

3 月　得知觉悟社社员黄爱被军阀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写作《生别死离》一诗，寄给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在信中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6 月　出席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小空场召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会后返回柏林。

8 月 16 日　为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

10 月　赴巴黎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议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0 月下旬　在柏林住所接待为寻找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和孙炳文。

11 月　和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 年 25 岁

2 月 17 日—20 日　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会议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当选为书记。

3 月 13 日　代表旅欧之部起草给团中央的第一号报告。

3 月 18 日　陪送赵世炎、陈延年等第一批赴莫斯科学习的人员到柏林，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的手续。

4 月 6 日　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致邓颖超的题为《德法问题与革命》的信。

夏　返回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专门从事党、团工作。

6 月 16 日　去里昂，与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务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7 月 3 日　以《少年》杂志社代表身份，发起并出席旅法各团体代表在

巴黎西郊华侨协社的集会。会议决定开展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群众斗争。

7 月 15 日　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旅法华人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当晚，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当选为中文股书记。

秋　任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

1924 年 26 岁

2 月 1 日　所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创刊。

2 月 15 日　在《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等文章。

3 月 1 日　在《赤光》第三期上发表《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

6 月 15 日　在《赤光》第十期上发表《太平洋上的新风云》等文章。

7 月 13 日—15 日　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

7 月 20 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

7 月下旬　奉中共中央指示，和刘伯庄、周子君等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

9 月 1 日　在香港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9 月初　到达广州。

10 月 10 日　出席广州各界群众为纪念武昌起义举行的警告反动商团大会，并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发表演说。

10 月　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

秋　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

11 月　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月，所主持的中共广东区委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2 月 29 日　出席广东反基督教大同盟在广东大学召开的大会。在会上演讲《基督教与帝国主义》。

1925 年 27 岁

1 月 11 日—22 日　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 月 15 日　广州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发布东征命令。黄埔校军参加右路作战。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负责黄埔校军的政治工作。

1 月 31 日　在黄埔军校举行的东征誓师典礼上，向全校师生进行政治动员。

2 月 3 日　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同校长蒋介石及苏俄军事顾问加伦等率黄埔校军出发，参加东征。

2 月 6 日　出席东莞商务分会举行的欢迎东征军大会，并发表演说。

2 月 11 日　在平湖右路军司令部，和蒋介石、加伦听取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报告攻取淡水城的计划。

2 月 27 日　东征军攻克海丰。次日，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驻海丰。

3 月 6 日　随军进驻揭阳。7 日出席群众大会，作题为《国民革命的宗旨和三民主义的真谛》的报告。

3 月 30 日　出席黄埔军校在兴宁举行的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在会上宣读祭文。

4 月上旬　兼任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

4 月 26 日　出席梅县第九届商会举行的欢迎大会。

5 月中旬　在帝国主义收买、支持下，驻守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密谋发动武装叛乱。广州政府急令东征军队主力从前线回师广州，平息杨、刘叛乱。

6 月 2 日　随军回师途中向黄埔校军作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

6 月 12 日　东征军队回师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向叛军发起进攻。遵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指示，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6 月 15 日，迫使杨、刘两部缴械。

6 月 23 日　率领党军两个营和黄埔军校学生军一个营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途经沙基时，在沙面的英国军警悍然向队伍开枪，造成“沙基惨案”。

7 月 31 日　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坚决支持省港大罢工。

8 月 4 日　出席黄埔军校追悼沙基死难烈士大会。在会上宣读祭文。

8 月 8 日　和邓颖超结婚。

8 月 20 日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

8 月 25 日　任国民政府为审理廖仲恺一案组织的临时特别法庭的检查委员。

9 月下旬　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

9 月 29 日　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

10 月 6 日　东征军总指挥部及各特种部队和各部随军人员出发。

10 月 8 日　在东莞石龙各界人士欢迎东征军大会上讲话。

10 月 13 日—14 日　参与指挥惠州战役。

10 月 22 日　和何应钦指挥第一师攻占海丰，次日占领公平。

11 月 9 日　出席潮安各界在西湖运动场举行的欢迎东征军大会，并发表演说。

11 月 21 日　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11 月 23 日—27 日　以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身份出席并主持国民党惠、潮、梅、海陆丰各县党部大会。

12 月 5 日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潮梅特委。同日，出席在潮州举行的公祭东征军阵亡将士大会，在会上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说。

1926 年 28 岁

1 月 20 日　所领导创办的《岭东民国日报》出版。

2 月 1 日　宣誓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布《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公署组织大纲》，任命该署职员。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

2 月 22 日—3 月 3 日　主持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在会上做政治报告。

3 月 16 日　广东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周恩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职务。

3 月 17 日　应蒋介石来电要求，乘船离汕头回到广州。

3 月 20 日　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下令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等。周恩来闻讯后赶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被蒋软禁一天。

4 月上旬　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4 月 23 日　返抵汕头，办理移交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和第一军政治部的工作。

5 月初　回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

5 月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首先由广东肇庆、新会出师。途经广州时，周恩来在司后街叶挺寓所向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讲话。

5 月—7 月　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

夏　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

7 月 12 日—18 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山舰事件”的经过。

7 月　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讲《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

9 月 24 日　出席广东各界慰劳北伐军演讲大会，并发表演说。

10 月 25 日　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北伐前线各军的军事情况。

12 月　离广东，秘密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1927 年 29 岁

1 月 1 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广东问题的报告。

1 月 10 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

2 月　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2 月 22 日　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临时被派往南市区指挥行动。起义遭到军阀孙传芳部与租界工部局的联合镇压。

2 月 24 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各区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决定采取“为进而退”的策略，集中力量准备新的武装起义。

3 月 3 日　在中共特别军委会议上做“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

3 月 4 日　出席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军事情况和起义的准备工作。

3 月 21 日　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举行起义的指令。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

起义爆发，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经过激烈战斗，于 22 日下午六时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

3 月下旬　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会谈，争取他支持上海市政府。

3 月 30 日　出席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详细分析起义后上海的政治形势。

4 月 12 日　上海发生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

4 月 13 日　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周恩来参加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十万多人。会后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游行群众遭到反动军队的残酷屠杀。

4 月　起草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4 月下旬　在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嘱邓颖超速到上海。

5 月 1 日　邓颖超抵沪。

4 月下旬—5 月上旬　在聂荣臻协助下，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工作，并安排江浙一带地下武装斗争。

5 月下旬　从上海秘密乘船来到武汉。

5 月 25 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

5 月 29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报告“马日事变”后长沙的政治局势及军事情况。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

6 月中旬　派出军事干部十人到湖南浏阳、平江一带组织农民，准备武装暴动。

7 月上旬　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参加中国共产党。

7 月 12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

7 月 15 日　在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后，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7 月中旬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初步决定调集革命武装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7 月 24 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在发言中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

7 月 26 日　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向李立三等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

7 月 27 日　到达南昌，住朱德寓所。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央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起义的有关问题，决定在 7 月 30 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7 月 28 日　前往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告以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

7 月 30 日　张国焘到南昌后，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等一致反对这一主张，坚决表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

停止。

7 月 31 日　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讨论。经过数小时辩论，在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 8 月 1 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8 月 1 日　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出席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由宋庆龄等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顾问

王忍之　卢之超

主编

曹志为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渔	王承光	王树盛	方　立
刘家新	朱　玉	朱元石	孙　钢
杨　泰	杨瑞广	李　捷	陈石平
陈艾菲	迟爱萍	罗英才	金　凤
姚建平	郭春福	高　路	黄　瑶
萧心力	章学新	辜文兴	程中原
	蔡庆新	黎　白	

丛书献词

我们在近现代中国悲壮而撼人的历史画卷前肃立、沉思！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个个名字不停地闪烁，一条条对理想苦苦追求的轨迹清晰地呈现。

如果有人问：谁的理想最宏远，谁的追求最理性，谁在中华民族的自救和解放道路上洒下了最多的热情与鲜血？历史已经昭示，那就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着这一代震古烁今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常想：同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为什么他们能走出封建中国凝重的历史和文化壁垒，在改造社会中不断抛弃旧我，完善新我？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此不屈的求索精神，如此撼人的牺牲精神？为什么他们能脱颖而出，成为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袖，成为我们这个悠久、灿烂而又一度落伍的古老民族的脊梁？

我们企望沿着他们从平凡走向伟大所留下的履迹寻求答案。

我们努力地求索。

我们坚信，这中间蕴含着一个不屈民族永恒的内力。

我们还坚信，中华民族走向明天的灿烂与辉煌，依旧需要这种永恒的力量。

《伟人之初》丛书，正是我们这种努力的记录和结果。如果青年朋友们在与这些也曾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伟人们的心灵对话中有所启迪的话，那末，这就是对我们这种努力和追求的最大鼓励。

《伟人之初》丛书编委会

伟人之初　领袖篇　周恩来

一悲欢童年

淮安之子

淮安古城，坐落在一马平川的苏北平原上，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和东流入海的淮河在此交汇。这里自古就是南北孔道，江浙要冲。早在五千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辉煌的古莲岗文化。东晋永和年间，这里开始营建城池，设府建镇。唐代的文通塔，宋时的镇淮楼，至今还屹立在淮安城内。风光绮丽，人杰地灵，周恩来就诞生在淮安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1898 年 3 月 5 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在太阳刚刚破晓之际，一个男婴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县城驸马巷的一所宅院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一个农历年出生的婴儿是属“狗”的。在这个婴儿降生的第二天，他的外祖父就病逝了，临终前，这位在宦海里沉浮了三十多年的老人，听说家里添了一个外孙子，显得格外高兴，他颤巍巍地问了孩子的生辰八字，沉思良久，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说：“好，这孩子有出息！”说完慢慢地阖上了眼睛，这是他留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孩子的父母，给孩子起名叫“大鸾”。在中国民间传说中，“鸾”是与凤凰齐名的一种神鸟，是吉祥和幸福的象征。父母对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寄托了人世间最美好的希望。大鸾五岁进家塾读书时，取学名周恩来，字翔宇。他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和淮安土地的养育之恩，以辉煌的一生给家乡，给祖国，给全世界带来了幸福之光，成为一位永垂青史的伟大人物。

周恩来诞生之际，他的家庭和家族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给他的童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从祖父一辈起，他的这一支家族迁居淮安。祖父周殿魁（字攀龙）在淮安县里做师爷（清朝官府的幕僚、秘书），经过惨淡经营，终于升为淮安知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做了三十年的知县。因此，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和母亲万冬儿的婚姻可谓“门当户对”，周恩来也可谓是这一官宦世家的宠儿。然而，好景不长，周恩来出生不久，他的外祖父和祖父相继过世。这个没有田产和积蓄，只靠官府俸禄为生的家族开始走上衰落之途。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在才学和能力上，显然不如他的父亲。他学过做师爷，然而没有学成，从性格上他比较内向，老实忠厚，不苟言笑，与世无争。周殿魁去世后，周贻能和他的兄弟不得不奔走他乡，谋个小职员做，挣得甚微的薪俸寄回家中以养家度日。目睹世态的炎凉，生活的艰辛，周恩来自幼就对他的父亲十分理解和敬重，四十多年后，当周贻能去世时，周恩来因事未能赶到，以至“悲痛之极，抱恨终天”[①]。就连毛泽东也打来电报：“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②]与周贻能的性格相反，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则是一个性格开朗、精明果断的人，她办事有主见，有魄力，整个周家的家务就是由她主持的。她的性格，对周恩来的成长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三个母亲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电报，1942 年 7 月 17 日。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 年 7 月 17 日。

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的小叔父周贻淦病危，心地善良的周贻能夫妇为了使贻淦兄弟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就把周恩来过继给了贻淦。两个月后，贻淦病故，周恩来就由嗣母陈氏带在身边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兼通医学。她性格温和，办事细心，仁慈礼让，自幼喜书画，好诗文，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深的文学修养。她年轻守寡，与继子恩来相依为命，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用来抚养、教育幼小的恩来。陈氏为恩来请来一位乳母，叫蒋江氏，他们一同生活。这样，周恩来就有了三位母亲：生母、嗣母、乳母。三位母亲都把人间最珍贵的母爱给了周恩来，也以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经历给周恩来的成长以不同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嗣母陈氏。从三四岁起，周恩来就跟陈氏妈妈读书、写字，五岁被送进私塾读书。为了帮他学习，陈氏妈妈教他同小朋友们做拼字游戏——把诗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小块厚纸片上，然后打乱，看谁先准确地拼成一首完整的诗词。在这种游戏中，周恩来总是最先拼好。陈氏还经常给周恩来讲故事，如《天雨花》、《西厢记》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的传说等，讲得最多的是宋代女英雄梁红玉在淮安筑建新城，击鼓抗金兵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着周恩来，“终日听之不倦”，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上南开学校读书后，曾以《射阳忆旧》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中回忆了他童年时听陈氏妈妈讲过的关于一个忠诚正直的仆人的故事，其梗概是：一家贫之少年，因父母双亡，又受其兄虐待，离家出走，到一绅士家做仆人。他做事认真，言语朴诚，受到主人器重，让他做了会计。这位仆人记忆力甚强，虽然不会写字记帐，但主人所问事项，脱口而出，无一遗漏。一日主人将一千贯钱锁在柜中，把钥匙交给仆人，并告诉他，这柜里有六百贯钱，家里的支出就从这里取，全部由你掌管。数月后，仆人计算花销，发现钱多了，急忙找到主人，说已经用去四百余贯，柜里还剩五百多贯，因此上次放在这里的钱不是六百贯，而是一千贯。主人深受感动，说自己老而健忘，既然已经说是六百贯，那六百贯以外的钱就送给仆人吧，但仆人坚决不收。后来这位仆人年龄大了，得了哮喘病，记忆力也不如以前了，便和主人告辞，回到家里后不久就去世了。周恩来在文章中写道：“夫钱犹腻，近则受污。古今士夫，以此坏名节者，何可胜数！而闾巷细民，目不知书，乃能慎于所守，不敢自监而自盗焉。

《论语》所谓见利思义者，其在斯人欤！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①]陈氏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是异常深刻的。四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②]

他又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中也有她的这一部分。”[③]

[①] 周恩来作文：《射阳忆旧》，《敬业》学报第 1 期，1914 年 10 月。

[②] 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文萃》第 31 期，1946 年 5 月 23 日。

[③]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索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 5 页。

乳母蒋江氏给周恩来的慈爱也是淳朴和宽厚的。这位农家女儿教给周恩来的是另外一种知识，比如吃米饭吧，蒋妈妈会把播种、插秧、收割、舂米的事情讲给年幼的周恩来听。在周恩来长大一些时，她又带着周恩来到乡下家中去玩。在那里，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农民的耕耘劳动，理解了嗣母教给他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的含义。从乡下回来后，在乳母的帮助下，周恩来在庭院里种了玉米、南瓜和一些蔬菜。这种田园劳动的收获果实是有限的，然而它对于陶冶周恩来的性情，却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周恩来对他的乳母的养育之恩，是难以忘怀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淮安县委的负责人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并请他们帮助查问，他的乳母还有没有后人在。

1904 年，六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嗣母、乳母和两个弟弟一起搬到淮阴他外祖父家居住，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外祖父家的藏书很多，从诗词歌赋、通鉴野史到古今小说都有，周恩来在陈氏妈妈的指导下，阅读了许多中国优秀的神话故事和古典小说。他所读的第一部小说《西游记》，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看的。万氏家塾办得非常糟糕，教书先生是一位落第秀才，其学问只可混饭，绝无独到的见识。陈氏妈妈和万氏妈妈都怕这位先生误人子弟，耽误了周恩来的前程，便决定搬到另一所住宅去，单独请一位先生来教孩子读书。在新居里，周恩来的学业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尤其在历史和古汉语知识方面，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万氏妈妈还常常带着周恩来去参加亲友的婚礼、丧事；过年过节请客摆席时，教他一些应酬答对的礼节；在家族间发生纠纷时，万氏妈妈经常带着周恩来去调解。这些活动增长了周恩来的见识，使他学会了许多办事的方法。在外祖父家生活的日子里，他勤奋地学习，书籍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他了解社会，认识生活，向一切未知的领域不断地进取；他与同辈的孩子一起玩耍、游戏，留下了许多美好趣事的回忆。他度过了几年比较欢乐、充实的童年生活。

1907 年，周恩来的生活陡然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随着家境日趋贫困，不得不靠借债度日。由于贫穷、愁苦和劳累，周恩来的生母患了胃癌，在这一年的春天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岁。外祖母为了维持官宦人家的面子，非要厚礼安葬不可，父亲只好借钱买了楠木棺材安葬了母亲。料理完丧事，家里已是债台高筑。父亲经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了。陈氏母亲为了解除心中的痛苦，也为了治病，便带着周恩来到自己的家乡宝应县住了两个月。在宝应，陈氏母亲的病情不见好转，他们又回到了淮阴县城。在这期间，周恩来又经历了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情。一天放学回来，听家人讲，官府抓住了一个强盗，一会儿就要砍头。原来五六年前，这个强盗夜入富户抢劫，不料被官府护兵抓住，要押往县衙门问罪，强盗挣断缚绳，夺刀杀了护兵，逃走他乡。官府加以通缉，毫无结果。两日前，强盗在街上乞讨时被抓获，今天要砍头。周恩来随同家人一起来到街上观看，只见街头人声鼎沸。一会儿，刑车押到，相貌凶恶的强盗被五花大绑地捆着。这时一个官员喊道：“护兵之儿在此吗？”“在。”随着一声回答，一个面容惨淡的矮小的十四五岁小孩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原来这就是被强盗杀死的护兵的儿子。这时一种异常难过的感觉涌上了少年周恩来的心头，他挤在人群的前排，两目直视。一个捕头强迫强盗睁开眼睛，并对强盗说：“这就是你杀死的护兵之子，是你使他们一家陷于悲痛，你好好看一看。”强盗看到这个瘦弱的孩子，凶恶的面容上出现了不可言表的愧赧之色，他大喊道：“公子宽恕我，我和你父亲无冤无仇，

只因急于逃命，才失手杀了他，我有罪于你，我今天唯有一死来告慰你父地下之灵，我乐于去死。”听完强盗的话，护兵之子不发一语，号陶大哭，“哭甚哀”。这时刽子手们一拥而上，将强盗押赴刑场。观看的人群中不少人流下了眼泪。这时的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感情，失声痛哭起来。七年之后，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一文中专门记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如此情况，为余幼年所未经。”“及今思之，犹如昨日。”“凡圆颅方趾，同为人者，皆有不可移之正义。有击于目，必动于心。”①失去母亲的痛苦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少年周恩来心事重重，寡言少语，在生活的磨难中他开始走向成熟。

1908 年的夏天，周恩来又一次蒙受了巨大的打击。久病不起的嗣母陈氏终于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死时年仅三十一岁。周恩来对陈氏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对记者说道：“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①]作为长子，在嗣母去世后，周恩来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忍住心中的极度悲哀，亲自主持，为他最亲爱的嗣母办丧事。他提出，陈氏妈妈简便入殓，遗体运回淮安和小叔父合葬。秋冬之交，在萧瑟的西风中，十岁的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扶着陈氏妈妈的灵柩，乘船返回了淮安。

主持家政

重返家园后，家境每况愈下，已完全陷入了危机之中。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小叔父早逝，三叔父贻奎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家族同辈人当中年龄最大的是周恩来，他必须出面主持家政，才能维持住这个濒于崩溃的家庭。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搜罗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去当铺典押，或者去向那些有钱的亲戚启齿借债。淮安城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艰难奔波的脚印。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过去曾和周家很要好的一些亲友，现在竟然翻脸不认人，非但不予帮助，反倒趁火打劫，逼债勒索。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周恩来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虚伪和冷酷，他对于那些为富不仁、落井下石的阔人充满了憎恨。尽管债台高筑，借贷无门，但满脑袋封建思想的长辈们，还要周恩来在墙上贴上一张纸，把亲戚的生日、忌日都记下来，到时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①]。尽管对这种做法，周恩来十分看不惯，但出于对长者的礼貌和尊重，他又不得不去做。这种艰难而凄凉的生活，磨练出了与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坚韧忍耐的性格和精明果断的办事能力，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对封建社会和旧习俗的憎恨的火种。

少年周恩来是一个不向困难低头的人。生活艰辛，身处逆境，历尽人世间悲欢离合，更显示出他的性格特点。为了排解沉重的生活负担给他带来的压抑和苦闷，他常常登上淮安城的镇淮楼，伏在石栏杆上俯瞰全城，仰视云天，浮想联翩。秀丽的淮安风光、淮安人民强悍的性格和读书得到的历史知识，构成一股股巨大的力量，使周恩来坚强起来，振奋起来。

淮安城东街有一座关天培祠堂，这是少年周恩来常去的地方。关天培出生在淮安，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在鸦片战争中为了抗击英军入侵，他在虎门炮台率军迎战，最后与四百将士一起壮烈殉国。人们在血泊中找到了他的一

[①] 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文萃》第 31 期，1946 年 5 月 23 日。

[①] 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等谈话记录，1964 年 8 月 2 日。

条腿，送返淮安安葬。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修建了这座庙宇。在庙宇里悬挂着一副林则徐亲笔写下的挽联：“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共坎坷，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每当周恩来徘徊此地，凝视着祠庙的关天培塑像和这副如位如诉的挽联，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感情的波澜，他敬仰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更为祖国坎坷的命运忧心忡忡。林则徐悼关天培的挽联如此深深地印到了周恩来的脑海里，以至于在抗日战争中，他多次用这副对联来激励前线将士。

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有一天，周恩来到淮安东门附近表舅龚荫荪家去探亲。龚荫荪思想倾向维新，是个革新派人物，他到过日本，尊崇孙中山先生。他与周恩来非常谈得来，喜欢周恩来的勤奋好学和聪明能干，同情他的艰难处境，便让周恩来到他家的家塾里读书。这样，周恩来的生活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龚荫荪的家中除有许多古籍外，还有一些宣传近代西方文明和近代科学的新书刊，阅读这些书刊极大地开阔了周恩来的视野和知识领域。龚荫荪还向周恩来讲解一些社会政治知识，讲解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些大事。继陈氏妈妈之后，表舅是对周恩来成长影响特别大的第二个人。五十多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回忆道：“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有一件事情，使得龚荫荪对他年少的外甥更加得意和器重。一天，一个曾在龚家做过丫头，又被她父亲领回去的姑娘，偷偷地跑回龚家要求收留。原来她的父亲是个鸦片烟鬼，把她卖给一个有钱人做小老婆。在这个有钱人家，她经常挨打受骂，备受欺凌。她实在不堪折磨，才找机会逃跑到龚家。听完这个姑娘的哭诉，龚家老太太摇头叹气地说：“唉，忍着吧，这就是命，你还是回夫家去吧，不然人家找来了还是要把你抓回去的。”这时，周恩来说：“不，绝不能回去，永远也不回去。谁敢来抓，我们就一齐把他打出去。”“打出去？”“是啊，他能欺负一个女孩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同他讲理，把他轰出去！”表舅龚荫荪听了周恩来的话，非常赞赏，不住地点头说：“嗯，好！恩来是对的，这孩子有见识，有肝胆，将来一定有出息。”在龚荫荪的保护下，这个姑娘在龚家留了下来。

在龚家的日子里，周恩来与龚家的表姐妹、表兄弟们相处得很好，常常在一起做游戏，玩得非常愉快。然而，他又不得不时常去照顾他那个残破的家，那副生活的担子几乎不是少年周恩来所承受得了的，可是他还是咬紧牙关挺住了。当他感到烦恼和苦闷时，他就强迫自己去想表舅所讲的那些大事情、大道理。他知道表舅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龚荫荪常常变卖家产，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之间，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真希望跟表舅一道走出家乡，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天，表舅又要远行，恩来缠着表舅，要求带他出走。表舅非常赞赏他的志向，但是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表舅说：“你年纪还小，妈妈去世了，父亲又不在家，我不好带你走，等你长大了再说吧。”

表舅走了，接着表舅家又发生了变故，全家迁到了淮阴。周恩来又一次失学了，他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和苦闷，在令人厌烦的家务中苦苦挣扎。尽管他凭借自己的治家能力，终于把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安顿下来，在外地谋生的父亲和伯父有时寄些钱来，也使家境有所好转。但从表舅那里学到的新知识、新事物，使得周恩来对眼前的一切都不满足，他要走出家乡，到外面的

世界去闯闯，看一看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这个机会不久真的到来了。

改变一生的选择

1910 年，对周恩来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这一年里他所作的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一年的年初，在东北做事的三堂伯周贻谦回家探亲，带来了大伯父周贻赓的信，信中要周恩来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生活。周恩来对大伯父有很深的感情，在他父亲兄弟四人中，小叔父即他的养父早已过世，三叔父偏瘫在床，常年不起。他的父亲生性胆小，与世无争。唯有大伯父，颇有才学，见多识广，对人又很热心。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同大伯父商量。周贻赓自己没有子女，夫人又居住在天津，他单身在奉天（今辽宁沈阳）供职。他对自己这个侄儿的才学十分欣赏。这一年他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升任科员，生活稍稍安定一点，经济上也有了一定保障，便打算让周恩来到东北和他一起生活。接到大伯父的信，周恩来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去的决定，这正是他多少日子以来梦寐以求的呀！

这是少年周恩来一次至关重要的选择。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①]

周恩来把家事交待给比他小一岁的弟弟周恩溥，又去祭扫了陈氏妈妈的坟墓，探望了久病在床的三叔父，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小伙伴，跟着三堂伯踏上了大运河上北去的帆船。伫立船头，望着渐渐远去的家乡，回想起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十二个春夏秋冬，他心潮起伏，然而，他更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他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①]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索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 5 页。

二求学辽东

初到奉天

逆流而上的白帆船，载着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了江淮平原，向着祖国的北方行进。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长途旅行。在和煦的春风中，船儿驶过了山东、河北，周恩来和三堂伯在天津下了船，转乘火车，穿山越岭，经过近一个星期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东北重镇奉天。

大伯父周贻赓在火车站迎接他们。见到久别的亲人，周恩来一头扑进大伯父的怀抱，向他诉说着家乡的情况和旅途的见闻。大伯父也非常高兴地向恩来介绍东北的风土人情。然而这种和谐的气氛很快就被一件事情驱散了。走出火车站不远，大伯父指着路对面一片繁华地区说：“恩来，以后不要到这里来玩。”“为什么？”“因为这里是租界，惹出麻烦，没处去说理。”“租界是什么？”周恩来不解地问，他以前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儿。“租界就是把中国土地租让给外国人，在这块土地上外国人说了算。”大伯父以一种凄凉的口吻答道。“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上要外国人说了算？”周恩来大声问道，他的拳头握了起来。“为什么？中华不振啊！”大伯父紧紧地拉住恩来的手，他发现自己的侄儿确实长大了。“中华不振”，大伯父的话长久地在周恩来的脑海里索绕。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对内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帝国主义列强恣意地蹂躏中国的土地，瓜分中国的版图。东北就是当时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1904 年至 1905 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势力范围，在我国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 1910 年，也就是周恩来到东北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并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为拯救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开始了他在辽东的求学生涯。

就读东关模范学校

周恩来刚到东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所以又随三堂伯转赴铁岭，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这一年的秋天，他返回了奉天，进入官立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高等丁班学习。这所学校位于奉天古城大东门外，它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刚刚开办的比较新式的学校，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书，开设了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门课程。

周恩来从偏僻的乡镇来到城市，从念家塾到求学于新式学校，周围的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校舍之宏，人才之盛”，使周恩来感到非常的新鲜和高兴。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是国文的成绩更为突出。国文老师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周恩来的作文常常被贴在

学校的成绩展览处，供同学们观摩。除了学习学校的课程之外，课余时间，他还博览群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以及《苏报》都是他经常阅读的报刊。他关心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变革，养成了每天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出版的《盛京日报》，“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

周恩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思想的敏捷，引起了教历史的高戈吾老师的注意。一天，高老师把他叫去，借给他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周恩来早就听说过这本书，正苦于借不到，今天终于如愿以偿。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他聚精会神地读着《革命军》，“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若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这充满激情的呼唤，像一团团烈火燃烧在周恩来的心中，使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如果能得益于一位良师的教诲，那将是终生难忘的。高戈吾老师就是周恩来的这样一位良师。他学识渊博而又富于正义感，常常在课堂上宣传反清革命，慷慨激昂地向同学们讲述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事迹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周恩来和同学们经常被高老师的演讲感动得泪流满面。在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周恩来还读了《警世钟》、《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扬州十日记》等革命书籍，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危机的情况和反清革命的道理，使他的朴素的爱国救民的感情不断得以升华。高老师对周恩来寄予了厚望，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周恩来说：“历史上革命的先驱，都是学识渊博的。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符合时代脚步的学问，是挑不动挽救中华的重担的。你要爱惜每一寸光阴，洞悉社会，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啊！”周恩来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中。多少年后，他对高老师的女儿说：“高老师的帮助，为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良师是永远值得尊敬的啊！”

访魏家楼子

为了洞悉社会，暑假中，周恩来到同班同学何履桢家去做客，那里是奉天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几年前日俄战争的战场之一就在那里的烟龙山。何履桢的祖父何殿甲，是村里的私塾先生，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老人，他领着周恩来他们到烟龙山战场遗址去察看，听当地的老乡诉说沙俄军队血洗村子的悲惨情景。1904 年到 1905 年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我国的东北，在这里进行了一场罪恶的战争。腐败的清政府，置国家主权和人民死活于不顾，无耻地宣布所谓“中立”，把辽河以东划为战区，让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的土地上恣意践踏。1904 年 10 月，日俄两军在魏家楼子相遇，村东烟龙山为日军指挥部，俄国向烟龙山大举进攻，村里所有房屋霎时间成了一片火海，烧成灰烬。全村男女老少无家可归，外出逃难，不少无辜百姓死于战火之中。有些村民奋起反抗，为此遭到了更残酷的屠杀。战争过后，这里留下了沙俄军队立的碑和日本军队建的塔。听到老乡们血泪

斑斑的控诉，看着象征着帝国主义罪恶和中华民族耻辱的“沙俄碑”和“日本塔”，周恩来满怀悲愤地唱起了当时学校里流行的谴责日俄战争的歌曲：“哥萨克队肆蹂躏，户无鸡犬宁。”他大声疾呼：“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周恩来强烈的爱惜之情，使何殿甲老人很受感动，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送给了这位胸怀大志的少年：“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慨三省兮民涂炭，溯历代兮皆然。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①

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

1911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在武昌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解放了武汉三镇，建立了军政府，宣布实行“共和”。“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接着便在各省领导和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仅一个多月的功夫，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就有十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掀起了反清斗争。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

辛亥革命的爆发，给周恩来以极大的鼓舞，他和同学们尽情地谈论着斗争的胜利，年轻的周恩来找来一把剪刀，剪掉了象征奴役、屈辱的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他是学校中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周恩来以极大的热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活动。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演讲会上，他发表了禁烟救国的演说。他说：“某些人每日烟钎子、烟板儿不离手，烟枪烟泡不离口，自己对自己开火，如此，国焉能富，民焉能强，不禁毒焉能救国？”他号召大家抵制鸦片，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

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向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袁世凯妥协了。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一线希望，又被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和残酷屠杀革命党人的腥风血雨扑灭了。从时局的急剧变幻中，周恩来看到了政治的恶变。他为革命失败而惋惜，为祖国的前途而忧虑，从而也更加促使他努力学习，以便为今后参加革命活动打下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周恩来在讲到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时说：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2 年 10 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这篇作文抛弃了八股的文风，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并以新思想贯穿其间，全文九百余字。国文老师读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文后批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第二年 6 月，奉天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把这篇文章作为甲等作文展出，并

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1915 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以后上海大东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也收入了这篇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周恩来提出：学生读书的目的和任务不应为个人名利，而应为担负和完成“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把教育办好。他写道：“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力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这篇作文，表现出周恩来的高尚志向和引人注目的才华，它为我们寻觅少年周恩来的思想轨迹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素材。

在奉天求学期间，周恩来以他远大的志向，高尚的品格和勤勉的好学精神，给学校的老师、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感人的事情流传至今，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

有一次，兼教修身课的魏校长在讲到“立命”一节时，问同学们：“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同学们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也有的说“为了家父而读书”。当魏校长问到周恩来时，周恩来庄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不由得一怔，他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还从未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竟有如此远大的抱负，他又一次问道：“为什么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提高声音又一次大声答道：“好哇，‘为中华之崛起’！”魏校长显得有些激动，转对同学们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还有一次，老师以历史上“赵苞弃母全城”的故事为题，要求学生作文。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郡守，当时北方的鲜卑族侵入辽西，他们掠走了赵苞的母亲和妻子，作为人质，要挟赵苞让城投降，但赵苞不为所动，表现了为国家不能顾私情的气节。他忍痛出兵进击，大败鲜卑军，保住了辽西郡城。而他的母亲和妻子却因此而惨遭鲜卑军杀害。同学们在作文中对赵苞的做法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赵苞弃母就是“不孝”，并说“城失犹可得，母死不能复生”。然而，周恩来在文章中，则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了赵苞反对侵略，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他认为赵苞弃母不是“不孝”而是“大孝”。一个人只有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才是一个有道德的大孝之人。

周恩来在奉天读书时，非常谦虚朴实，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同学常请他答疑解难，他总是热情待人，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同学。当时，班上有一位腿有残疾的同学，周恩来经常主动帮助他，当他缺课时，便帮助他补习功课。学校里有一个姓吴的老校工，工作很辛苦。周恩来常常起早来到学校，帮助老校工扫地、烧水。有一次这个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八个铜元给他，帮他治病。周恩来刚到东北时，身体比较瘦弱，说话又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一些大同学骂他是“小蛮子”，经常欺负他。为了对付这些欺负人的大同学，周恩来和许多受欺负的小同学交了朋友，这样人多势众，被欺负者形成了一个坚强同盟，使得那些大同学再也不敢欺负人了。

感谢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

周恩来到东北的另一个收获是，他的身体锻炼得强壮了。从南方来到北国，气候条件和饮食习惯都有了很大变化，从小就受到艰苦生活磨练的周恩来，以顽强的毅力，很快地就适应了北方的寒冷、干燥的气候和以高粱米、玉米面为主食的东北生活。当时，奉天风沙很大，他每天徒步往返学校，常常是风沙扑面，泥路难行。特别是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周恩来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在学校附近的万泉河边跑步，坚持三年，毫不松懈。在学校里，他也喜欢体育课，尤其喜欢和同学们一起踢“熊头”（类似足球）。这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运动，那时条件简陋，没有球门而是往高踢，“熊头”在同学中传来传去。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一定的技巧，而且需要参加者的相互配合。周恩来不仅在学习上是一个佼佼者，在运动场上也是一员猛将。

如果说秀丽的南国水乡赋予了童年周恩来以温和谦恭的性格，那么东北的黄土、大风和高粱米则锻炼了少年周恩来的强壮的体魄，这两点都是他终身受益的。千里迁徒给周恩来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1962 年 8 月，周恩来在与亲属的谈话中，回忆他求学辽东的生活时说：“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胃肠，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后来，他还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1913 年 2 月，周恩来大伯父周贻赓的工作有了调动，到天津改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刚好周恩来也完成了小学各门课程的学习，他准备报考当时国内著名的南开学校，于是他要和大伯父一道去天津了。临行前，他与老师、同学依依惜别，互相赠言、赠诗作为分别纪念。周恩来为一位考入了奉天省立第一中学的同学书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魏家楼子的何殿甲老先生得知周恩来要赴天津考学的消息后，特意写了《赠周恩来南归诗》五首，列举历史上著名人物通过刻苦学习和磨练，获得“非常之才”，成就“非常之业”的典故，用“不大困者不大亨，能冒险者方出险”的哲理，意味深长地赞扬、鼓励风华正茂的周恩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周恩来踏上了南去天津的火车，春天里来，春天里去，他把整整三年的宝贵光阴和一连串坚实的人生脚印留在了宽阔的东北大地上。

三南开学校

欧美风格的新式学校

天津，周恩来生活旅途上的第二个大城市，正悄然地等待着他的到来。这是一座与奉天风格迥然不同的城市，它处于华北海上门户的战略要地。1860年辟为通商口岸后，英、法、俄等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设了租界。海河上，经常游弋着外国的商船和兵舰，外国的大银行纷纷在这里设立了派驻机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新式教育也很发达，与奉天相比，这里更具开放色彩和充满商业气息。

周恩来到天津后，首要的事情是准备报考南开学校。南开学校，位于天津南开区南开四马路，是 1904 年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一所私立四年制中学。创办人严修（字范孙），做过清朝的翰林和学部侍郎，较为开明，是一位主张教育救国的人。校长张伯苓，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因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转而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教育学家。南开学校是一所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教学作风比较民主的学校，它以管理严格著称，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均仿照英美，课程较重，考试繁多，各科每月考一次，期末大考。由于采取考试淘汰的管理法，再加上学费昂贵，能考取入学和坚持到毕业都是十分不容易的。

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科目有英文、国文、数学三门。尤其重视英文的成绩，因为在这所学校里，从二年级起，除中国史地和国文外，其余八门课程都使用英文课本，有的课程，还由美国老师教学。为此，周恩来先在天津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1913 年 8 月 16 日，他参加了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录取后，编入了一年级乙三班（后改为了二班）。入学考试的顺利通过，使周恩来非常高兴，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的学习生活，他决心做到五个“不虚度”，即“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周恩来带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抱负，在这所颇具欧美风格的新式学校里度过了四个年头的中学时代。

学业不虚度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据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的介绍：“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学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初至英文非佳，嗣后发奋攻读，始同趋进步。”从 1915 年 3 月到 1917 年毕业，两年多时间里，周恩来获得了国文传观、化学考试第一，全校数学速赛、全校国文特试第一，默国文考试第一，全校习字比赛行书优秀奖等十多项荣誉，毕业时获得国文最佳奖。当时，天津每年举行一次全市中学校际演讲比赛，周恩来曾两次被推举为学校的三名代表之一，并且这两次南开学校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入学第二年，经老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了他的学杂费，成为全校少有的免费生，这种情况在私立学校是极为罕见的。

1916 年 5 月南开学校举行全校国文比赛，各个班级都推选出作文优秀的

五名代表参加。比赛规定，不论年级高低，同样的作文题目，同一标准评卷，共取四十名。当时出了两个作文题目，周恩来选择了《诚能动物论》为题。在这篇仅用 3 个小时完成的作文中，周恩来文思奔放，纵古说今，语言简练、气势磅礴地阐述了他“崇诚信，弃诈伪”的观点。他写道：“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无量数生物分子以成人。人者，万物之灵也。各具本能，感拥仁智，发挥其固有之天性，以角逐于天演界中。”“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对当时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深恶痛绝，他在文中写道：“且吾窃怪以今人之明，而终不免于欧洲血战，华人自争，使世界无宁日。丧无量数人之生命脑力，以供彼一二私人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对于虚伪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他借用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名言写道：“善乎美总统林肯之言曰：虚伪可以惑少数人于终世，惑人类于一时，而决无惑世界人类于最长时期也。”①

这篇精彩的作文得到了阅卷的全体国文教师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扬。其评语为：“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少陵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者实得其妙诀。而通体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尤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经南开学校校董严修亲自阅卷选定，周恩来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全校第一名，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获得班际第一名，学校奖给了二班一面锦旗，上面是严修亲笔写的四个大字“含英咀华”。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优异学习成绩，是靠他的勤奋用功取得的。刚入校时，他的英文基础较弱，他的苏北口音又影响英语发音，学习起来感到吃力。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每天早起，到操场或校内小花园练习发音，并随身带着单词本，走到哪儿念到哪儿，经过这样的发愤苦读，他的英文进步很快，进入二年级时，他的英文就相当好了。

读书不虚度

周恩来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的东西，认为“校课限于普通”。他在课外读了许多书，其中有中国历史方面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等。周恩来很爱读《史记》，有一次，他上街看到一部《史记》，爱不释手，就把伙食费全掏出来买回这部书。据他当年的同学回忆，当大家晚上在寝室里休息时，周恩来常给他们讲《史记》中的故事。周恩来还读了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以及谭嗣同的《仁学》等，从中吸取了爱国主义的思想营养。周恩来还读了许多 18、19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上二年级后，由于他的英文水平已相当高，他又常常看一些原版英文书籍，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英文阅读能力。值得提及的是，周恩来在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后，常常把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如他读了《天演论》后，写了《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他认为“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

之物质文明世界”[1]，老子、赫胥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之所以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是由于二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其实他们“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周恩来认为，统世界之学理教说的“儒之孔，西之耶，印之佛”的“三氏之说，非不善也。然其于生死存亡之观念，未免后于老、赫也”。读了《原富》之后，他写了《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他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如何拯救中国，一种主张言义不及利，“乃正人心之所本也”。一种主张言利不及义，“斯富国之左证也。”周恩来认为：“斯二说也，吾咸取之，引其证以论之，则知二说之不可偏废而必折衷采之行之，以救中国也。”[1]周恩来的这种融古今中外为一体的比较式的读书研究方法，对于正确地理解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评价其适用性，是十分独到和有价值的。周恩来还坚持阅读当时出版的《民权报》、《民主报》、《大公报》等进步报刊。这种课余读书生活，使周恩来拓宽了知识面，视野和思路更广阔了。同时也对他学习有关课程，如国文、英文、史地等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修身·尚志·人格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一个重要收获，是道德修养的日臻完善。在这方面，南开学校的良好校风对他很有影响。南开学校重视学生的“修身”教育，每周星期三下午有一次“修身”课，全校同学一齐高唱“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校歌，然后由张伯苓或其他教员讲国内外大事和做人处事之道，有时还请校外的名流学者来校演讲。学校要求学生仪表必须整洁，举止必须有礼貌，放荡的生活是不允许的。违反校规者，要受到严厉的惩处。这种“修身”教育和严格的纪律，使南开学校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校风，它对于学生思想性格和道德修养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在南开学校期间，自幼飘泊、远离故乡亲人的周恩来，经常承受着浓烈痛苦的怀乡思亲之情。“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1]与这种感情相伴而生的，是周恩来对集体和老师、同学的格外依赖。他认为，人立足在世界上，不能像禽兽草木那样只为自己生活，必须依赖于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2]所以，他对学校和班上的各种公益活动，总是热心尽力去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猥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3]毕业时，同学们为他写了如下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4]

---

[1] 周恩来作文：《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手稿。

[1] 周恩来作文：《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手稿。

[1] 周恩来作文：《避暑记》，手稿。

[2] 周恩来作文：《论名誉》，手稿。

[3] 周恩来作文：《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后》，手稿。

[4] 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1917 年。

在南开学校期间，周恩来对人生道德修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反省和总结，人生观初步形成。他在《诚能动物论》中论述了诚实是做人的美德，“设众人皆各本其天性，相接以诚，则世界又何至有虚假诈伪现，而以诚为贵哉”[⑤]。在《尚志论》中，他论述了一个人必须有高尚的志向，这种志向不应从个人私利出发，而应当从大局出发。他写道：“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抱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尚志是也。”“然则志固尚已，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年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①]在《爱国必先合群》和《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他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凌辱的历史，阐述了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合群”爱国救国之责，他写道：“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他认为，中国国民欲称强于世界，则当爱国。“欲爱国则必先合群，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虽无治民之主权，何妨尽合群之责任，诚若是也，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神州无恙，吾种常强，是在吾国民之能合群能爱国也。”[②]在《论名誉》中，他认为，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是“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他写道：“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③]在《我之人格观》中，周恩来论述了人格对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写道：“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事待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茫茫天壤，莽莽大地，所以得生存于世界，而向全盛之境、大同之世以共趋者，岂非恃此一线之人格耶！”[①]

思想观念上的升华，使得周恩来在待人处事方面处处与人为善，温和诚实。尽管他品学兼优，各项活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但他从不骄傲，从来不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无论对同学、友人，总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同学解答疑题，辅导功课。尤其到他毕业那年，许多同学都埋头于紧张的功课，无暇他顾，而周恩来一如既往，热心从事公益活动，身兼社团的八种职务，从未少懈。他还很善于团结同学。从二年级起，他与张鸿诰、常策欧两位同学自愿结合，住进一个宿舍，一起住了两年，彼此很和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提议：我们一块住了两年，交谊很深，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人接触太少，应该分开，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这样可以

[⑤] 周恩来作文：《诚能动物论》，南开《校风》第 30 期，1916 年 5 月 15 日。

[①] 周恩来作文：《尚志论》，手稿。

[②] 周恩来作文：《爱国必先合群》，手稿。

[③] 周恩来作文：《论名誉》，手稿。

[①] 周恩来作文：《我之人格观》，《敬业》学报第 5 期，1916 年 10 月。

团结更多的同学。他的提议得到了这两位同学的赞同。

周恩来尊重师长，与老师的关系非常融洽。他有时利用休息日去校长张伯苓家拜访。张伯苓非常喜欢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总是留他吃饭。张伯苓常对家里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尽管他们之间的政治见解不很一致，但他们的师生情义却是笃实的。后来，新中国成立时，张伯苓专门向他最杰出的学生、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拍去了贺电。1951 年张伯苓病逝时，周恩来亲自登门吊唁，表示他对老校长的一片深情。南开学校的国文教师张皞如、化学教师伉乃如等，都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思想上、学业上和生活上给予周恩来的帮助，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生活十分俭朴。大伯父收入微薄，家里的生活还要靠大伯母做些编织活才能维持。为了减轻大伯父的负担，周恩来在课余和假期中经常为学校刻蜡纸、油印或抄写讲义，以换取一些收入。那时，周恩来没有什么新衣服，一件蓝布长衫已经洗得发白，每到星期天洗了，都要连夜烘干，第二天又穿着去上学。有时饭费接济不上，他就拿几个铜板，到校门外买点大饼充饥。星期日回家，就从家里带一小罐酱来下饭。周恩来的大伯母周杨氏心地善良，勤劳朴实，为了周恩来的学业，她自己节衣缩食，做编织活常常干到深夜，每次周恩来回家，她都要设法改善一下伙食，给正在长身体的恩来补充一些营养。正是在这种艰辛的境遇中，周恩来发愤苦读，在学业上和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中所写：“ 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千万苦干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 ”这种清贫俭朴的生活，对周恩来以后的生活道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敬业乐群会

在南开学校期间，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创办和组织“ 敬业乐群会 ”。1914 年 3 月，周恩来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发起组织“ 敬业乐群会 ”的学生团体，其名称表示“ 敬重学业，联络感情 ”之意。该会的办会宗旨是：“ 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辅教科之不及。 ”在“ 敬业乐群会 ”成立之前，学校里已有两大学生团体，一是“ 青年会 ”，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学生的组织；一是“ 自治励学会 ”，主要吸收高年级同学参加。“ 敬业乐群会 ”成立后，会员最初为二十多人，后来逐步发展到二百八十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会员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校外也有它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张伯苓校长对“ 敬业乐群会 ”的成立，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亲自参加了该会的成立大会，并代表学校的全体教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张伯苓一贯主张，学生在学校不单是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培养管理能力。学校规定，下午 4 时起是课外活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教室和宿舍里不许留人，学生们或到操场上参加体育锻炼，或去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开明校长的大力支持和校方的倡导以及经济上的资助，为“ 敬业乐群会 ”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于是，周恩来和他的伙伴们在“ 敬业乐群会 ”这个舞台上导演了有声有色的戏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对于周恩来来讲，在这里，他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得到了初步的显示和全面的锻炼，从而为他若干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

挥更大作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敬业乐群会”成立之初，建立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创办了会刊《敬业》学报。张瑞峰担任会长。周恩来担任了智育部部长，后来他还担任过稽古部部长， 1915 年 9 月当选为副会长， 1915 年 12 月当选为会长。

为了便于同学们课外阅读书籍，以弥补课堂所学之不足，周恩来领导智育部的第一项工作是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的图书馆。据记载，周恩来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杂志》等十六本书刊。这个图书馆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一到课余，他们就来到这里看书看报。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把每周一、三、四、五的课余时间，定为会员活动时间。经常聘请老师作专题学术报告，题目有：荀子的哲学思想，司马迁的《史记》等等。有时还邀请校外知名人士来演讲中外大事，如吴玉章、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曾接受“敬业乐群会”的邀请，来南开学校演讲和与同学们座谈。这些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开阔了大家的眼界，陶冶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了学习兴趣。

“敬业乐群会”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如每周一次的茶话会，就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在茶话会上，或由会长报告会务，或讨论时事政治和学校大事，然后进行各种游艺和联欢活动，如表演相声、双簧、剑术、灯谜、棋类比赛等。据当年校刊报道，周恩来表演的趣语和伉乃如老师表演的相声都是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常常使大家捧腹大笑。

“敬业乐群会”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组织会员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实际生活。1915 年 10 月下旬，“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1916 年 5 月下旬，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周恩来带领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实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种校外参观活动，使周恩来和同学们了解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新鲜事情，他们觉得收获很大。

主编《敬业》，经理《校风》

周恩来除了担任智育部部长外，还负责主编“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学报的工作。据《同学录》载：周恩来“热心从事学报，尤倍竭其力，编辑印刷之习，遂为全校冠。”《敬业》学报系半年刊，每年 3 月、 10 月出版，自 1914 年 10 月创刊，先后出版了六期。《敬业》学报的创刊词中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机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了办刊者的办刊宗旨。《敬业》学报还积极反映会员对时政的评论，学习的心得，报道会内的各种活动，在周恩来的主编下，这份刊物办得生动活泼，文字清新，内容丰富。据当年南开学校校报报道：《敬业》学报“材料丰富，外观亦异常精美，颇蒙校内外欢迎，共销至一千数百份之多，阅者无不交口赞谈，可为出版之特色。”在《敬业》学报上，周恩来以“飞飞”、

“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许多诗歌、评论、小说等作品，后几期还专门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发表他的杂感和小评论。主编《敬业》学报使周恩来受到很大锻炼，一方面积累了编辑、印刷、出版等办刊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为他表达政治见解，发表文艺作品提供了园地，使得他的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不断得以提高。以下列举几篇周恩来在《敬业》学报上发表的作品，以增进我们对青年周恩来思想状况和《敬业》学报的了解。

《敬业》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最早的诗歌作品之一《春日偶成》，全文如下：

一

极目青郊外，
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
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
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
相思又一年。

这首诗写于 1914 年春，它透过对春意盎然的大自然景象的描述，对祖国美好山河的赞叹，揭示了袁世凯等反动军阀镇压革命，祸国殃民的罪行。

1916 年 4 月，在《敬业》学报第四期上，周恩来发表了《送蓬仙兄返里有感》诗三首，以表达对高校返乡，再转往日本留学的“敬业乐群会”会长张瑞峰（字蓬仙）的送别之情。相逢萍水亦前缘，

一

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
持螯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
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
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
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
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
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
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
孤雁入寥天。
惟有交游旧，
临岐意怅然。

这三首诗通过对与同学好友的共同学习生活的回顾，抒发了周恩来为拯救祖国而刻苦自励的革命情怀，表达了与好友惜别时的真挚情义和良好祝愿。诗中尤以“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的佳句，表达了一代青年为国为民，准备“卧薪尝胆”，勇敢献身的远大志向。

1916 年 10 月出版的《敬业》学报第五期上，发表了张皞如《伤时事》和周恩来《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两首七绝诗，全文如下：

伤时事

张皞如

九月二十八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在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意。国生命已断送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

太平希望付烟云，
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客天涯空涕泪，
伤心最怕读新闻。

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飞飞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这两首诗是反对张勋复辟的重要作品。 1916 年 6 月，袁世凯死后，张勋为了打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处心积虑地拉拢、勾结各地军阀，在徐州阴谋订立北洋七省军事攻守同盟，妄图拥戴清废帝溥仪上台，复辟封建帝制。对于张勋之流的倒行逆施和举国昏沉的险恶局面，张皞如和周恩来师生二人义愤填膺，吟诗唱和，表达出他们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

除了主编半年刊的《敬业》学报之外， 1916 年和 1917 年，周恩来还参加了南开学校校刊《校风》周刊的编辑工作。当时这份校刊由学生主办，周恩来担任《校风》总经理，负责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宜。他还担任编辑部的纪事类总主任、文苑部部长、译艺栏编辑等。他的工作既繁重又琐碎，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他还要亲自到印刷所去检查印刷质量，保证刊物的按时出版。

周恩来为《校风》周刊撰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发表在 1916 年 11 月第四十五期上的《中国现时之危机》和在 1917 年 5 月至 6 月第六十三至六十九期上连载的《本社之责任观》。

《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是根据周恩来在全校演说大会上的演讲稿改写的，在那次演讲中他获得了全校第五名。这篇文章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治时弊的透辟见解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周恩来认为，中国现实之危机，可分作两层观。第一属于事实的，第二属于精神的。就事实的危机而言，文章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变，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内

患言，国内无何种事业，当其兴也，如火如荼，及其渐也，无声无息。考其弊，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之。”他以辛亥议和、二次革命、云南反袁起义等事实为例，说明“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姑息、妥协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后患无穷。“总上原因，何一非因政治之不良，有以致百事之停滞。政治之不良又何作？敷衍姑息，有以养成之也。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林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就精神上的危机而言，“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无人。”周恩来对官场上的腐败之风和社会上的颓靡之气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他写道：“在朝者处现今之时势，国务员私利之争无时或息；议员欲得优薪，督军竟思攘利。在野者或自命圣哲，启宗教争端；或自命清流，置国事于不顾；或灰心国政，作种种不道德之举，以为亡国之预备；或聚集金钱，以作富家翁。凡此种种，无非泯国性，丧国魂，使国果亡也。”在文章的最后，周恩来认为，拯救中国危机的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他大声疾呼：“呜呼！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也耶？然而国诚危矣，吾党青年，际此时势，知之可，欲奋起而救之则力有未足。恐谦让未遑，故吾今日之言，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而不欲有弱冠请缨之举，于国事无大补也，幸甚幸甚。”

1917 年 5、6 月间，周恩来在即将毕业之际写了一篇长文《本社之责任观》，在《校风》上分六期连载。这篇文章总结了《校风》的办刊经验，提出了办刊的基本责任，并对如何办好《校风》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周恩来认为，作为由学生自己主办的校报，应当担负起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则学生于学校之责任，舍读书励行健身外，尤有建议之义务”，“未来兴腾之事业，或已发初，或尚未经道出者，本部均应负提倡建议之责。良以一校机关，学生自由发表言论之地，而犹不事提倡，则千人集中之力将谁所属？两仪停动，万物尚何茁而生生不已不足言哉！”周恩来认为，今日之学生是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只有在学校期间养成关心学校、热爱集体的优良作风，才能担负起对未来社会的责任。他严厉批评了在一部分同学中存在的那种‘独善其身，自鸣清高”的不良倾向，认为那样做无异于“自斩其生机哉”。周恩来通过对办刊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依靠全校师生办好校刊的观点，他说：“优劣之权，固不在《校风》主事者，而在吾千人师生之掌握矣。不仅师生，而并在校外阅者，诸君子提倡与否卜之焉”。“未来之兴腾荣耀，固以吾及千人师生阅者诸君子负共同之责。”周恩来对南开学校，对《校风》充满依依不舍之情，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对《校风》新的编者与读者寄予了语重心长的赠言，他写道：“愿董吾《校风》之事者，勿苟安，勿自诿，勇往直前，百屈不挠。勿临渊掘井，勿缘木求鱼。预备于先，持久于后，为《校风》谋与校俱长与日俱存之念。勿囿于目前，致贻事后之悔。勿故息俯就，致弊重而难返。发扬增长非诸公之力莫措，精美丰富非诸公之力莫致。今日辛勤，图《校风》巩固，他日舰学校精神者，追论中兴人士，固亦非诸君莫属矣。阅者诸君子乎，吾愿各本其责任之心，扶持掖助，使《校风》稿件日益盈，经费日益充。存相与共始之念，勿存相与偕终之心，则《校风》之增长赖诸君以传之无尽，而诸君之精神亦赖《校风》扬之永久。异日论《校风》维繁之功者，又舍诸君其谁与归哉，其谁与归哉。”

在南开学校期间，主编《敬业》学报和参与编辑《校风》的工作，使周

恩来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一方面实现了他为公众“服役”的生活准则，另一方面使他的编辑水平、写作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了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周恩来在《敬业》、《校风》上共发表文章二十五篇，其中论说文十二篇，小说、小史、剧本、游记、杂忆、编志、翻译等各种体裁的文章十三篇。此外，还有纪事一百三十七则，笔录三篇，诗歌六首。这对于一个承受着繁重课程和众多社会活动的中学生来说，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周恩来以他的勤奋和毅力，实现了他入学之初立下的“光阴不虚度”的诺言。

编演新剧

新剧，是有别于旧戏而言的，就是现在的话剧，它兴起于辛亥革命前夕。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是一个热心提倡新剧的人，在他的倡导下，南开等校成立了新剧团，其最早上演的新剧，就是由张伯苓亲自编剧并导演的《用非所学》。周恩来是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入学不久就报名参加了新剧团，并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

周恩来对新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新剧是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一些重要工具。他在一篇题为《吾校新剧观》的文章中写道：“夫中国今日所急者，人民之贫极矣，智陋矣，衣食所迫，大都不是力求学之需。而家室殷富者，又复居气养体，坐令子孙之作牛马，不为丝毫学识计。”面对这贫富不当的昏聩局面，周恩来提出，化此愚顽的有效办法是对国民进行通俗教育。“夫通俗教育之组织，大都不外演讲事理、出版书说等事，然演讲则失之枯寂，书说则失之高深。即有以演讲中而加入兴趣小说，书报取其平易近人者，而对于浮躁子弟，又何能使其静心不厌，目不识丁者，又何能使其翻卷阅诵？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借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

在新剧团里，周恩来参加编写和演出了不少新剧，如《一念差》、《新少年》、《一元钱》、《五更钟》、《华娥传》、《醒》等等。这些新剧的内容大部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或是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反对男尊女卑；或是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提倡科学与民主，号召人们走向光明与进步。当时社会风气没有大开，同时也因为南开学校只有男生，没有女生，周恩来便常在一些剧目中扮演女主角。他在表演中显示了上乘的艺术天赋和技巧，使他的名声轰动校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周恩来扮演女主角的新剧《一元钱》。该剧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动人故事，在南开演出后受到好评，并应北京文艺界之邀，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解放后，当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再次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往事。周恩来说：“三十多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周恩来除了参加新剧的演出，还要领导布景部的工作，并且亲自设计和制作布景。南开学校新剧团的布景是很有特色的，采取虚实结合的形式，既精巧逼真，切合剧情，又易于安装，节省开支。在演出过程中，周恩来只要

不上台演出，就参加幕间调换新布景的工作。从编剧到导演，从做演员到当美工，他几乎无所不能，成了新剧团的多面手，毕业时，同学们在《同学录》中给他写了这样一段评语：“君于新剧尤具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闻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尤极赞助之功。”

注重体育

上中学以后，周恩来更加自觉地参加体育活动。他认为“国民疾病之多寡，足以证明其国势之强弱”，而国民教育“莫不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智识以启发尚次之”，“根基固于先，智识诱于后。”[①]当时南开有两位同学临毕业时，因积劳成疾，不幸夭亡。周恩来感触甚深，他把这件事写成纪事，刊登在《校风》上，他写道，这两位同学正当“英年勃发，学业日增之际，竟遭不幸，我同学诸君痛悼之余，尚望时深警惕，注重体育，以二君为殷鉴，保千金之躯于永久”。

南开学校注重学生的体育活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学生的体育课考试要测五个项目，其及格成绩是：百米短跑十五秒，铅球（十二磅）六米，跳远三米三，跳高一米二，四百四十米跑一分三十五秒。学校还规定，体育考试不及格的要把名字公布在校门前。严厉的措施使得南开学生的体育活动蔚然成风。周恩来曾在《校风》上专文记述了这种情况：“本岁运动，吾校连捷于天津、华北，锦标夺得，银杯归来，欢欣鼓舞。观感所及，于是一校之内，运动会团体之发生不可胜数。各班有各班运动会，各会有各会运动会。析而小之，有所谓各寝室运动会，私人运动会；广而大之，则有所谓全级联合、各寝室联合、各会联合诸运动会。诚所谓一日之内，一场之中，而种类各殊。不仅此也，每届课余，三五成群，齐趋操场，非竞走即踊跃或掷抛。而夜间自修班后，昏黑广场，接踵相跑者，尤不可胜数。”周恩来和他所在的丁二班，在体育方面是很突出的。周恩来每天早上坚持跑步、做操。在班级运动会上，他获得跳高第三名，他和几位同学组成的篮球队、排球队都是班上的优胜队。此外，他还喜欢打网球，打乒乓球。对乒乓球的爱好，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他所在的丁二班曾获全校越野跑比赛第二名，足球比赛第一名，全校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二名。

除了自己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之外，周恩来还热心于学校和班级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宣传鼓动。每年春、秋两季运动会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繁忙的身影。他一会儿到比赛场地了解比赛成绩，一会儿又到运动员休息的地方采访运动员，及时写成报道在校报上发表。他还抽空在同学中组织“啦啦队”，为正在进行激烈比赛的运动员加油助兴。有一次南开足球队赴北京与清华足球队比赛，周恩来随队前往，一方面采访比赛情况，一方面热心为队员服务，给足球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周恩来当选为“敬业乐群会”会长之后，他积极安排体育活动，尤其在寒暑假，他组织留校同学坚持锻炼，开展爬山、旅行等活动。他还热心辅导“敬业乐群会”童子部篮球队，使其技术不断提高，在学校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并经常代表学校到校外比赛。1917 年 5 月，正值周恩来毕业考试的紧张时期，他还抽空组织了一次童子部体育运动会，

[①] 《校风》第 65 期，1917 年 5 月。

他与童子部三十三名小会员在运动场上的亲切合影，至今还保存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内。这一年的 6 月，南开学校去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的体育代表队归来，作为“敬业乐群会”会长的周恩来，还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欢迎中学四年，周恩来保持了在东北时期坚持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身体素质进一步增强，从而为他后来能够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和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惜别南开学校

1917 年 6 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在南开学校毕业。6 月 26 日晚，在学校礼堂举行了毕业典礼，陈独秀等来宾出席。校长张伯苓致开会词并颁发证书。周恩来以“国文最佳者”获得学校特别奖，并代表毕业生致答词。他表示感谢南开学校和老师的栽培，决心不负众望，继续努力，为国献身。周恩来的毕业证书上写着：“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十九岁，浙江省绍（兴）县人，于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 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①]

周恩来的中学时代结束了。这四年是周恩来生活中一个比较充实、丰富、稳定和顺利发展的阶段，他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应当感谢南开学校，在那种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下，为学生们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学术上比较进步，思想上比较宽松，管理上比较严格，气氛上比较祥和的客观环境。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南开学校的教育之恩，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他与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和一些南开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多年，有的甚至伴随了周恩来一生。周恩来回顾往事时，曾感慨地说，天津是我青年时代的故乡，“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的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它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1951 年 2 月 24 日，周恩来重返阔别多年的南开学校，他满怀喜悦之情走上礼堂讲台，亲切地对师生们说：“这是我的母校，没有疑问，那时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我也学了一些知识，锻炼了办事能力。以后我参加了革命，思想认识提高了，工作能力增强了，这是共产党经常教育的结果，也是和我在火热的斗争中得到多年艰苦锻炼分不开的。”

中学毕业，意味着人生中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周恩来和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经过一番思考，一个念头逐渐在周恩来的脑海中明晰起来——“去日本留学”，这个勇敢的选择，掀开了周恩来生活中新的一页。

[①] 周恩来毕业证书存根，1917 年 6 月 26 日。

四 东渡日本

大江歌罢掉头东

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作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选择。他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想到日本学习救国的道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蒙受过外国列强的欺凌，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学习资本主义，改革封建社会，一天天走上兴盛之路。周恩来很想从日本的变化中得到一些启示，从而思考如何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为此，他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政治系。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贫寒的家境，难以支持他在国内继续求学深造，而当时按中日两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一所这样的学校。

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周恩来筹措了一笔路费。出国前，他先北上奉天探望大伯父周贻赓，并回奉天母校向师生辞行。他给一位小学同学写下了这样的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1917 年 9 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东渡，慷慨辞国，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初到日本

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像一个戴着白帽的少女；朝霞一样灿烂的樱花，遍地开放。年轻的周恩来初次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感到格外兴奋。南开学校的一些同学已先期到达东京，还组成了南开同学会，周恩来得到他们不少帮助和照顾。

初到日本，周恩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这不仅因为日文是他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而且还因为他在南开学校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使用的教材和词汇都是英文的，如果日文不过关，对其他科目的考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到日本不久，他就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并复习有关考试课程。

周恩来深知日本求学之不易，他制订了紧张、周密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时时刻刻去用功。”为了闯过语言关，同时也对日本社会有所了解，他坚持阅读日文报刊，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问？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①]

来日本之前，周恩来曾对日本寄以很大希望，他认为中国太弱了，像日本一样走“军国”的路未必不是一种救国的方法。到日本后他专门考察了这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2 月 4 日，手稿。

个问题，经过实地观察，他很快就失望了，在日记中他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中如不实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②]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周恩来艰难地行进着，当他发现自己信仰中的某些东西是一种谬误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这种严以律己、知错就改的精神是他道德品质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他不断求新进步的一种人格力量。

1917 年底到 1918 年初，刚到日本不久的周恩来，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心理危机，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至，使他的苦闷几乎达到极点。首先是学业上的不顺，由于方法不当，他的日文进展缓慢，考期日益临近，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官费考试临近，届时背城之战，十有九必败”[①]。正当他为日文问题焦虑万分之时，又接到堂弟的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三叔父贻奎去世的消息。那些天，周恩来的情绪低落至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里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会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他又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学业上的挫折，失去亲人的痛苦，初到异国的孤寂，使周恩来苦苦思索解脱之路，他一度考虑能否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主义”来摆脱世间的凡事。然而，对于他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亲人怀有深挚感情，把为人类服役作为最大乐趣的人，又怎么可能从“涅槃”之说中得以解脱呢？这个自欺欺人的想法，很快就被抛弃了。对人类、对祖国的强烈使命感终于使周恩来战胜了这场心理危机，继续踏上了前进的道路。在他稍后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少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

[②]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2 月 20 日，手稿。

[①] 周恩来给陈颂善的信，1917 年 12 月 22 日，手稿。

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的打消了。”[①]

战胜了这场心理危机，周恩来悟出了一些新的道理，“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拚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②]

2 月 11 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中国有一句俗话：“一年之计在于春。”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他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的打算：“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在那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集中力量投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准备。3 月 4 日至 6 日参加了考试，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订了计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小时。

读《新青年》

思想上的巨大波澜，使周恩来觉察到自己意志上的懦弱和精神上的缺憾，他深刻地反省自己，并且开始寻找新的更充实的精神寄托。正是在他情绪波动最厉害的日子里，他读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这里面的文章，不少以前他都读过，然而此时重读，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请主义极端的赞成。”“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以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新青年》给周恩来带来了新的希望，使眼前沉闷的世界豁然开朗，他感到一种挣脱锁链后的巨大欢欣，他在日记中连续地写道：“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时期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2 月 15 日，手稿。

[②]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2 月 6 日，手稿。

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可取。”“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他还兴奋地写下两句诗，记述他思想上的这次突变：“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周恩来开始认识到，世上万物都在合乎自然地、永不停息地进化演变，每一个人都不能在奔腾而去的历史长河中依然故我，只有否定自我，才能解放自我，开拓自我，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周恩来为自己得到的这个新认识感到振奋，尽管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有些绝对，对“新”的内涵朦朦胧胧，但是他毕竟开启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他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

1918 年四五月间，正当周恩来按照既定计划，废寝忘食，埋头苦读，准备迎接 7 月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潮发生了，它一下子打破并完全改变了周恩来在日本的全部生活。

大约是在 4 月初，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提出了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协定规定，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个消息在报上披露之后，给留日的中国学生以很大的震动。周恩来马上注意到这件事，他在 4 月 3 日的日记中写道：“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在 5 月 2 日的日记中又写道：“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

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东京等处的中国留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派代表四处串联游说，号召全体留学生罢学回国，以示抗议。5 月 5 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为宗旨，成立了“大中华民国救国团”。第二天，正当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举行秘密会议时，突然遭到日本警官和侦探的袭击，与会的学生代表全部被双手反缚，押解到西神田警署。留学生们得知会议代表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结果被日本军警以武力驱散。5 月 10 日，报上登出了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本月 2 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的消息，他的绝命诗中有这样一句：“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周恩来从中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录下了这句诗。5 月 16 日，段祺瑞反动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这个协定。这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人罢学归国。在国内，北京也发生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

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周恩来无法再静下心来埋头复习。尽管考试日子一天天临近，原订的学习计划一天天落空，周恩来还是全然不顾地自觉地投入了这场爱国斗争。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5 月间，他的日记内容几乎全是这次留日爱国学生运动的记载。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深深地为祖国多饵的命运忧虑，为寻找救国之路苦苦思索。5 月 19 日，他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在入会仪式上，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其中讲道：“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

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了，他把两句话作为给其他会员的赠言：“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①]

“新中学会”是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组成的团体，其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参加“新中学会”后，周恩来积极参加了其中的活动。每星期天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周恩来和会员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如凡尔赛会议上有关中国问题的决定等。他们还以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侵略中国的罪恶企图，谴责国内军阀政客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探索拯救民族危机的救国方案。从保存下来的周恩来留日日记中可以看出，“新中学会”对周恩来的思想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

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由于周恩来积极投入爱国运动和参加“新中学会”活动占用了不少时间，使得用来复习课程的时间减少了，尽管周恩来在学运结束后从 6 月初开始全力以赴地补习课程，然而在 7 月 2 日至 3 日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考试中，还是因日文、日语的成绩不够好而未被录取。此刻，周恩来的心情很懊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在痛苦中他下定决心，积极准备明年再考，“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这时正在暑假中，7 月 28 日他离开东京，经朝鲜釜山回国探亲，于 8 月 1 日回到天津。归国期间，他曾去南开母校探望，并去北京看望了正在那里做事的父亲。9 月 4 日，周恩来重新回到东京。

在周恩来回国探亲这段日子里，日本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事件。这个事件是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引起米价暴涨造成的。米价的暴涨，直接影响到人民生计。为了维持生存，一些贫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农民开始袭击米店抢走粮食。这个风潮迅速波及全国，五十七天内，全国共有三十三个县，四分之一的人口卷入了这个事件。最后，日本政府出动军队才得以平息事件。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骚动，使日本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周恩来重返东京后马上感到了空前紧张的社会气氛，他为日本突然发生的巨大事变感到震惊，当年赴日时对日本抱有的种种美好印象和幻想已经荡然无存。周恩来对由于米骚动事件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对俄国十月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那之前 4 月份参加爱国运动时，他曾看过一篇介绍俄国革命和党派问题的文章，并在日记中做了八百多字的详细摘要，这次他又重读了这些摘要，从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这些被周恩来给予高度评价的摘要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5 月 19 日，手稿。

“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

“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做两派，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按：即列宁）。还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

“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①]

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使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各种社会学说及其理论著作十分流行。在此期间，周恩来读了约翰·里德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震动环球的十月》，还读了对当时日本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三部著作：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这些著作从社会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角度；进行社会主义的启蒙宣传，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那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也很流行，东京的书店里公开出售英文版和日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为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周恩来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1919 年 1 月，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创刊，周恩来立刻成为这个刊物的忠实读者。在该刊第一册到第三册中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介绍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写道：“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此三大原理密不可分，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在第四册上刊载了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全文。周恩来孜孜不倦地阅读这些文章，苦苦地思考着其中的道理，并将其与各种主义进行“推求比较”。从这时起，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对周恩来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中寄庐”

周恩来旅日期间，生活是很艰苦的，很少吃肉，常常只吃些青菜、土豆、豆腐之类的家常小菜。刚到日本时，他和一位姓陈的中国留学生住在神田区一家家具店二楼的一个“贷间”（即租赁的房间）里，由房东长岛善雄的母亲照料他们的生活。后来为了寻找房租最便宜的地方，他又几次迁居。在他加入“新中学会”后，搬入“新中寄庐”居住。“新中寄庐”是“新中学会”在东京早稻田地区租定的一处会馆，有十七八间房子。“新中学会”会员除确有困难者外，都搬到这里的宿舍中集体居住。所有烧饭、洗碗、看门、清洁卫生等工作，均不雇人，全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的现款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支用，不许浪费。经济比较宽裕的会员还一次或分次缴付互济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4 月 23 日，手稿。

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1918 年 12 月，南开学校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以及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等去北美考察教育回国路过东京时，曾到“新中寄庐”参观、聚餐并合影留念。这顿午餐，便是由周恩来和会员马洗凡、李峰等做的。严修、张伯苓等很称赞这种“炊爨洒扫皆自为之”的集体生活，认为这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

一张名片

周恩来在旅日期间，十分重视与日本人民的交往，他认为，“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 1918 年 7 月 29 日，在东京函馆商业学校任教的元木省吾，因事从东京下关乘车去香川县，上车后遇到了正在归国探亲途中的周恩来，他们之间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元木省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和坐在对面的那个留学生周恩来叙谈了日本文学和支那文学的情况，他是来日本留学的青年，他日语讲得很好，也有不懂的地方。他问我能用英文谈吗？我想这也是测度自己英语讲到什么程度的好机会，就同意了。使我吃惊的是，自己连一些日常用的单词都忘了，成了不会语法的英语。后来我们终于在纸上用写汉字的方法，进行了交谈。他很能讲，虽然是浙江人。我们交谈的面很广，有几段是谈天津学习的事情，中国有名的作品，中国的字典，以及日中友好等等。尤其是我称赞了中国之后，他显得非常自豪。最后他给我留下了姓名，并希望经常给他写信，我也把自己的姓名留给了他。”分手时，他们交换了名片，互相道别。周恩来的名片上面有石印楷书“周恩来”三个字，名片下角有“翔宇”两个字。名片上还有周恩来亲手用钢笔写上的校名“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元木省吾把这张名片珍藏了五十多年， 1972 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后，元木省吾和夫人芳子非常高兴，他们望着这张珍贵的名片，多么想到北京看看这位已经成了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呀。可是元木省吾不久病重，不能成行了，他在逝世之前多次嘱咐夫人芳子，一定要保存好这张名片，“将来有机会务必交给周恩来”。

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也长久地留在周恩来的心中，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转达田中角荣首相邀请周恩来访日的意愿，周恩来回答说：“我自己是很想再去的，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腾出时间。”

雨中游岚山

1919 年 3 月间，周恩来得知他的母校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毅然放弃在日本留学深造的打算，决定回国学习。

回国前夕，周恩来的好友张鸿诰、王嘉良、穆慕天三人为他设宴饯行。他们是南开学校的同学，到日本后仍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张鸿诰等人对周恩来的远大抱负、高尚品德、广博知识和对事物的洞察力十分叹服。在这行将分别的时候，他们请周恩来题诗留念。周恩来欣然挥笔，写下了《大江歌罢掉头东》这首七言律诗，并在诗后落款道：“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慕天，醉罢此书，留为再别纪念”。临行前，周恩来还书写了梁启

超《自励》一诗，赠给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恩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1919 年 3 月，周恩来离开东京，准备从神户乘船回国，路过京都时，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拜访在那里读书的南开同学。在此期间，他多次游览了京都著名的风景区——岚山和圆山公园。置身于秀丽的湖光山色之中，周恩来沉思冥想，就要离开日本返回祖国，一年多的旅日生活犹如电影一样从脑海中闪过。他觉得这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色中，也包含着某种哲理。朦胧的雨雾正像纷乱的世界，让人感到渺茫，感到失落，而那穿云透雾的阳光，正像科学的真理，催人猛醒，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他思索着，回味着，浏览着，一股不可遏止的诗情袭上心头。他接连写下了四首诗，来描述自己的心境，这些诗后来发表在 1920 年 1 月 20 日出版的《觉悟》创刊号上。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1919 年 4 月 5 日）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雨后岚山

（1919 年 4 月 5 日）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博？”

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

（1919 年 4 月 5 日）

满园樱花灿烂；
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
樱花杨柳，那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他。

四次游圆山公园

（1919 年 4 月 9 日）

四次来游，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枝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灯光熄，游人渐渐稀，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一年半的旅日生活，是周恩来人生旅途上的重要阶段。正如晚年周恩来所讲：“我去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我回到中国不久，就爆发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运动。正好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中间，我在日本。”在日期间，周恩来经历了失去亲人和高考落榜的感情波澜，日本国内阶级压迫的严酷现实也使得他效日本之法拯救中华的幻想破灭，然而，他没有在悲伤和失望中沉沦，他很快地挣脱了感情的锁链，并且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振作起来。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二十年华识真理”，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还在对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中寻求它的真正价值，但是一线希望毕竟已穿云而出，这为他今后的主义选择，为他回国后投身五四斗争铺垫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怀着欣喜的心情，周恩来四月间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返回祖国。在他随身的行李中，带着河上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五 投身五四

风暴前归来

1919 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在掀开新的一页。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日子里，周恩来回到了祖国。他在大连上岸，先去奉天看望伯父，接着又去哈尔滨东华学校看望南开校友。4 月底，他回到了天津。据 1919 年 4 月 30 日出版的《校风》第一百二十三期报道：“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津。”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周恩来全力注视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的动向以及国内有关山东问题的舆论和人民的各种爱国活动。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被占的山东领土等要求。但是，会议不仅悍然拒绝这些合理要求，而且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原在我国山东的全部权益。媚外卖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长期郁积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卖国政府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青年学生。5 月 4 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喊出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在赵家楼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宅邸，痛打了亲日派官僚章宗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学生运动，拘捕了三十多人。北京学生的英勇行动，立即震动了全国，很快，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处于被统治状态的民众，以如此广泛的群众规模行动起来，直接干预政治，还是第一次，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鼓舞了刚刚回到祖国的周恩来，虽然他还没有办理南开学校大学部的入学手续，但对于这样一场热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他难以置身事外。他天天去南开学校，与学生领袖马骏等人共同筹划救国大事，自觉地投身这场伟大斗争之中。

挫败曹汝霖的阴谋

正在这时，卖国贼曹汝霖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并躲进了天津的租界。曹汝霖到天津后，装出一副关心教育的虚伪面孔，表示愿意拿出一笔巨款“捐献”给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正为此事筹措经费，见曹汝霖如此慷慨，遂准备接受其捐款并聘其为南开学校校董。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立刻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揭露曹汝霖的阴谋，维护母校的声誉，周恩来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南开同学掀起拒绝曹汝霖捐款、反对让曹汝霖当校董的运动。他还广泛联络已经毕业的南开同学，包括出国留学的南开毕业生参加斗争。他在给“留日南开同学会”的信中写道：“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方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的很。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

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至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南开校内的学生都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校中却不拿真学问教他，弄的一个个都是空的。并且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 Democracy（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①]“留日南开同学会”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于 5 月 21 日将信节录稿寄“留美南开同学会”，并云：“顷得同学周恩来自津来信，节录于后，亦可见南开现状的一斑了……。”

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南开学校的毕业同学一致议决，如果张伯苓执迷不悟，就全体宣布与南开学校、与校长断绝关系。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经过爱国师生的斗争，最后，张伯苓宣布拒绝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南开学校终于站到了人民一边，从而使它的光荣历史免遭了卖国贼的玷污。而这一切又怎么能与周恩来所做的重大努力相分开呢？！

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6 月下旬，从北京传来令人气愤的消息，北洋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决定日内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北洋政府的可耻态度，再一次激起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潮。天津学联立即派出代表马骏、刘清扬等人赴京请愿，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周恩来前往车站为代表们送行，他跟大家一起吟诵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诗句，互相激励，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决心“坚持到底，拚死力争”。6 月 28 日，是巴黎和约签字之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住所为愤怒的留法中国工人和学生所包围，因此被迫拒绝赴会签字。以五四为发端的全国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这个胜利中，周恩来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南开学校为庆祝胜利而召开的“奋兴大会”上，周恩来和同学们畅谈两个月来的斗争体会，更加感受到了肩负使命的任重道远，他们决心“再接再厉，牺牲一切，日日奋兴”，以达救国目的。周恩来对下一步斗争提出了重要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①]

7 月初，政府当局决定各学校提前放暑假，推迟开学，以分散学生的力量。放假后，学生纷纷离校。不少人看到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已被免职，巴黎和约也已拒签，于是斗争情绪开始松懈。为了把运动坚持下去并引向深入，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鼓励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搬进南开学校居住，集中办公，开展活动。鉴于周恩来在主办《敬业》和《校风》期间表现出的卓越的办报才能，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和副会长马骏专程去看他，邀请他出来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他们，他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我之所以回国，就是为了参加救国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3 页。

[①] 载 1919 年 7 月 7 日《南开日刊》。

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随后，他也搬进南开学校和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一起居住。

要创办这样一份报纸是不容易的，没有经费，没有印刷厂，没有纸张，尤其还要向警察厅立案。为了筹办这张报纸，周恩来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毅力，四处奔走，精心筹划，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组织南开学校话剧团对外义务演出，募集办报经费；他机智勇敢地应付反动当局的刁难和阻挠；他亲自到协成印刷局协商，向印刷厂的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争取他们的支持。经过周恩来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做好了《会报》出版的全部准备工作。

为了扩大宣传，在《会报》发刊前，周恩来写了一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刊登在 7 月 12 日的《南开日刊》上。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精辟地论述了《会报》的办报方针，他写道：“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可以说很不希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与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该文具体列出了二十条办报宗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等等。这篇文章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到《会报》创刊前一天，订户已近两万户，除了天津，还有北京、保定、南京、上海等地的订户。

7 月 21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报名下方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会报》先后共出了一百多期，最初为日报，对开四版一大张，9 月 22 日受警方干涉被迫休刊， 10 月 7 日复刊为二日报，对开一张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报。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等栏目，其中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上海《新人》杂志曾发文认为：《会报》的这两个专栏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会报》凝聚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也凝聚着他的闪光的思想。《会报》的社论和主要文章，大都由周恩来主笔，他以“飞飞”、“翔宇”等笔名发表大量文章，通俗地解释社会新思潮，报道国内外时事及各地爱国运动的消息，抨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还翻译外国进步理论家、作家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的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会报》没有编辑室，周恩来经常在承印该报的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里做编辑工作。由于人少，《会报》也没有记者、编辑、发行之类的分工，从收集新闻到撰写稿件，从编排版面到校对审核，从印刷到发行，都由周恩来主持。他还经常到印刷所与工人一起研究白话文、新式标点的拼字、排版问题，帮助工人搬运纸张，折叠报纸和操作印刷机。

《会报》根据天津爱国运动和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提出斗争口号，确定斗争内容和斗争形式，引导人们关心、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指导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在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推动进步青年同工人

运动相结合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以对祖国安危、人民利益的关切，对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政府的深刻揭露和抨击，对时局发展的精辟见解和对真理的忠诚，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它犹如一朵朵浪花，闪烁在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中，为其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8 月初，山东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会报》报道和评论的中心内容。由于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山东主权的阴谋破产，但它野心不死，7 月下旬，住在山东坊子城的日本人挑起事端，他们提出了九条议案，声称要保持日本在山东铁路及政治、军事、经济、警察等方面的特权。日本宪兵还在济南、青岛等地擅自逮捕中国人。山东人民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山东学、商各界数千人到省公署请愿示威，要求向日领事馆交涉放人，拒绝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反动的北洋政府急调马良任济南镇守使，并宣布山东全省实行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的爱国运动。8 月 5 日，马良下令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授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济南的枪声，震动了全国。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8 月 6 日，《会报》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日本人对山东的九条决议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国民啊！黑暗势力，越来越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两天后，该报又以《速逐残害回教徒的马良，速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戒严令》为题，系统揭露了马良媚日卖国、充当日本军国主义和安福派军阀鹰犬的狰狞面目，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对马良实行“国民公判”。8 月 9 日，《会报》发表《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写道：单靠打电报、发宣言、上请愿书，是不能去掉安福派的。“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且响亮地提出：“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在同日发表的《敬告男女学生》一文中，周恩来写道：“现在社会是渐渐的入于消沉，要再不想法子振作起来，恐怕‘江湖日下’没有再动的机会。”“女学生！男学生！我们现在不是憩着的时候，我们应当每天实行警醒社会的事业。”

8 月 23 日，天津各界代表会同北京、山东代表，到北京总统府请愿示威，要求对山东解除戒严，严惩马良以平民愤。代表们在总统府守候了一天，北洋政府却出动军警，将代表全部逮捕。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却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接着，周恩来奋笔疾书，拟定文稿，交付排印。深夜，《会报》的号外出来了，人们奔走相告，把反动政府逮捕学生代表的消息传遍了海河两岸。从 26 日到 28 日，天津各界又派出三批代表赴京，马骏、周恩来等人都参加了，他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全国各地也纷纷声援。在全国人民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在 8 月 30 日释放全部被捕代表。9 月 2 日，周恩来陪同部分获释代表返津，天津人民举行了盛大欢迎会，迎接代表归来。《会报》报道，当获释代表到达天津车站时，“各界往车站欢迎者，途为之塞，游行街市，直拥商会开欢迎会。”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周恩来主编的《会报》成为斗争的有力武器，它用鲜明的标题和生动的文字，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声援爱国学生运动，它发表大量评论文章和报道，提出斗争的基本要求和口号，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各界群众联接起来，显示了巨大的声威和力量。

《会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恐惧和仇视。8 月底，北洋政府内务部下达了查禁《会报》的密令。密令说：“ 兹查阅 8 月 25 日、28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载有让各省速派各界公民代表来京请愿及去做群众运动的事，罢工，罢市，不纳税，不当兵。又载有联合会致各处电文，望全国一致，互做声援等话。核其文字语意，实于公共安全秩序显有妨害。应请查照本部通咨转饬警察厅，依法办理。 ”直隶省公署和天津警察厅得此密令后，多次派军警恫吓印刷局，不准再承印《会报》，还派出密探，寻找办报人。周恩来机智地同警察当局展开了周旋战，多次变更印刷地点，在工人们的巧妙掩护下，使得《会报》继续得以印刷发行。反动当局恼羞成怒，9 月 22 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出大批军警，武力逼迫协成印刷局不再承印《会报》。

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没有表示丝毫的怯懦。他到别的印刷单位联系，讲解救国道理，使许多人为之感动，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10 月 7 日，仅停刊半个月的《会报》又复刊了。在复刊当日的《会报》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该文写道：“ 本报是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的，又岂能因为杨以德的干涉印刷局，因为杨以德不予立案，我们就不去同他奋斗。我们办事是秉着良心去做，光明正大，没有一点退缩的。现在学生的奋斗是一天急似一天，我们靠着传布消息的会报，是断断不能再‘噤若寒蝉’的歇着，不去尽它的责任。 ”“ 总之，我们必定拿我们的全力去同他奋斗。他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我们必定想法尽我们的责任。 ”

《会报》的遭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会报》的斗争精神深为钦佩。南京《少年世界》撰文指出：天津学生办的报纸中，最有价值的“ 自然要算这报了。这报现已经出到一百几十期了，中间被杨以德的压迫，曾经停了一回版，后来又复活了。到一百期那一号，出了一个‘ 奋斗号 ’。可以说日日在奋斗中讨生活。这报以革新的同革心的精神为主旨！本民主主义发表一切主张 ”。“ 一个麻木不仁的天津，现在居然有这种新曙光，令人十分快乐。记者敢望把这种的光照遍了全中国各处，群起效法。记者敢说将来的新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了；还盼望天津学生努力前进！ ”[①]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不久，周恩来根据斗争需要，倡议把当时各校的报刊，如天津《醒世周刊》、《南开日刊》、《北洋日刊》、《师范日刊》等联合起来。他的倡议得到了各报刊的积极响应。8 月 9 日成立了“ 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 ”，周恩来被推选为该会主要负责人。该会以“ 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造成强有力的言论，以指导社会、监督政府及会外各言论机关 ”为宗旨，每月定期开会，研究形势，商讨共同斗争方案。学生报社联合会对于宣传“ 革新 ”和“ 革心 ”精神，协调宣传要点和中心，对于揭露反动当局的卖国罪行，唤起人民觉醒，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①] 《少年世界》第 1 卷第 1 期，1920 年 1 月。

创建觉悟社

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他们志同道合为着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而奋力拚博，历史忠实地记下了他们的光荣业绩。 1919 年 9 月 2 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患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兴奋不已，热烈地交谈着。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两大团体的联合已是势在必行。在急驰的列车上，几位学生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酝酿和讨论。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茗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进行筹备工作，他奔走于两个组织之间，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最初由二十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觉悟社”成员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学生领袖，有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理论家、宣传家，有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流血负伤的中帼豪杰，实际上，觉悟社已经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9 月 16 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会议决定出版一本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觉悟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这便是周恩来“伍豪”（五号）、邓颖超“逸豪”（一号）笔名的由来。

周恩来为觉悟社起草了《觉悟的宣言》，阐述了觉悟社的宗旨和任务，其中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他还写道：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

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周恩来提出，发扬宗旨的办法有四种：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①]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请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觉悟社讲话。那是 9 月 21 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来到觉悟社，和社员们亲切交谈。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李大钊和周恩来等谈了很久，才依依惜别。除李大钊外，觉悟社还请了许多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其中有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入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

觉悟社还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也有“忏悔”（就是自我批评）。当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中国还没有出版，只有《新青年》等刊物登载过一些介绍文章。觉悟社的社员虽然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少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邓颖超后来生动地描述到这种情况，她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①]“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②]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寻找科学的真理。据有人回忆，由于周恩来敏锐的思想、深邃的观察力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使觉悟社的讨论会总是风趣盎然，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于 1920 年 1 月 20 日出版第一期。这本杂志大三十二开，一百余页，将近十万字。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和五首白话诗。其中《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仅六百余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周恩来认为，觉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觉悟的人，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往前走，去求

[①] 《觉悟》创刊号，1920 年 1 月 20 日。

[①] 邓颖超在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9 年 5 月 4 日，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第 10 页。

[②] 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1957 年 5 月。

无穷的进化。

在《死人的享福》一诗中，周恩来用质朴的语言抒发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全文如下：

死人的享福

（1919 年 12 月）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觉悟》出刊后，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上海《新人》杂志评价道："《觉悟》内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觉悟》第二期准备了四十余篇稿件，内容更加丰富，本拟 2 月 20 日出版，但由于"一·二九"事件发生，周恩来被捕入狱，因而未能付印。

觉悟社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称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会员是天津学生界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他们抱定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取名叫觉悟社。"1920 年 1 月，觉悟社发动青年学生开展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周恩来、郭隆真等遭反动当局逮捕，同年 7 月，周恩来等人出狱。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觉悟社一部分成员于 8 月间赴法国勤工俭学，觉悟社的主要成员以后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等人创建的觉悟社，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冲锋陷阵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它犹如一道闪电，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希望之光，它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五四运动的史册。它的战斗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青年奋勇前行，正如《觉悟社社员歌》所唱的那样："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砥柱中流

1919 年 9 月 25 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周恩来办好注册入学手续，进入该校文科学习。后来大学部改名南开大学，并在 11 月 25 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

周恩来的大学生活是在反帝爱国斗争的急风暴雨中开始的。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为着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黄正品、关锡斌等同山东、河南、上海等

省、市代表于 10 月 1 日再度前往北京，到总统府请愿，当晚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到北京，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在代表被捕后，他积极组织营救工作，并与全国学联和各省市学联负责人商定，在“双十节”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随后周恩来赶回天津具体组织实施。

10 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学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纪念会，周恩来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与主持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行径。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大会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并不准上街游行。邓颖超等带领女学生首先冲破警察的包围，走上街头，和陆续冲出包围的队伍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途中遭到保安队和警察的拦阻和殴击，邓颖超等十一人受伤。游行队伍最后行进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

为抗议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无耻行径， 13 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17 日又继续罢课两天。周恩来起草了《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发表在当天的《益世报》上。宣言书揭露了北洋政府和杨以德之流“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公民宣战”的罪行，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奋起反抗。其中写道：“此次天津庆祝国庆，由各界联合会发起，通知各界人民赴会。……然而杨以德终不死心，派大队警察拦阻我们出发。我们大家同他论理，他却向我们威吓，我们各界人是赤手空拳，秉着爱中华民国的心，去庆祝国庆，我们还有什么惧怕么？一往直前，是我们当然的办法。我们是‘结队成群’，是极有秩序的团体行动。他们不但阻挡，并且还用枪刺枪托伤人，野蛮黑暗，那时的情景，已经达到极点，稍有人心的人，没有不感动的，加上他们所伤的，全是我们有团体的男女两界学生，公民是有目共睹，人人都‘怒不可遏’，……主使巡警殴人，他的罪是主使罪，更没有再为警察厅长的道理。……我们因此议决短期停课，表示我们促社会觉悟的决心，一致进行，‘救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救国’。”

反动军阀的暴行，激怒了社会各界。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生，纷纷致电声援天津人民的斗争。北京二十八所学校学生联合举行游行、讲演。上海各界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集会，商店停业一天，晚间还举行了提灯游行，声援天津人民。直隶省署和天津警察厅，一连数天被示威的人潮所冲击。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和直隶省署不得不于 11 月 7 日全部释放 10 月 1 日在北京示威请愿活动中被捕的各地代表。

一彼未平，一波又起。11 月 16 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福州打伤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并打死一名警察，造成“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福建学生首先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25 日，以觉悟社社员为骨干，天津学生一千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的爱国斗争。12 月 10 日，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新学联号召抵制日货，声援福建学生。15 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代表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18 日和 19 日，天津爱国学生开展了对各商号卖日货情况的检查。20 日，在南开大学操场召开有十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场焚烧了在街市检查中没收的十多卡车日货。“烈焰飞腾，烟冲霄汉，人心为此大振。”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1920 年 1 月初，传来消息，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同意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

出的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要求。此事无异于火上浇油，更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形成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反动当局又使出惯用伎俩，直隶省长曹锐下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企图釜底抽薪，瓦解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主持觉悟社会议，作了研究和部署。提出“反对直接交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提前放假”等口号，由学联组织学生广为宣传，并组织日货调查团，深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国难当头，经过学联等爱国团体的工作，天津各界人民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不买仇货、提倡国货”的口号深入人心，海关工人拒绝给日本商船卸货，各商号在学生的影响下，把日货一律封存，不再售卖。这些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以沉重的打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贯卖国求荣的北洋政府不惜与人民为敌，下令对各界人民的爱国运动进行镇压。

1 月 23 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查出未经呈报的日货灯罩，按规定应全部没收。这时，突然闯进三个日本浪人，残酷地殴打检查日货的爱国学生，并抢走了检查证。这一暴行，激起社会公愤。第二天，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推选马骏、马千里等为代表，前往省公署请愿，提出抗议。反动当局出动军警殴打学生，并将各界代表全部逮捕。25 日，当局将天津学联、天津各界联合会等的办事机构一律查封，宣布解散一切爱国团体，禁止检查日货，当局的布告称：“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学联骨干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各界群众领袖不少人被捕，周恩来担起了更加沉重的担子。他住在刘清扬家里，和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人继续组织群众，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1 月 27 日，他们组织五千多人集合于南开操场，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大会，发出了“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战斗呼声。愤怒声讨反动当局的卖国和镇压群众的罪行。大会向社会宣布：“开会言论，已失自由，困苦颠连，达于极点，唯一息尚存，誓抱初衷，力谋进行。”28 日晚，周恩来主持在法租界维斯理堂地下室召开的觉悟社秘密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议认为，北洋军阀政府企图通过暴力把爱国运动镇压下去，从而为所欲为地出卖中国领土，听任“福州事件”横生。局势险恶，千钧一发。民气绝不能因强权而稍馁，民意绝不能因暴力而稍变。必须奋起抗争。会议决定在 1 月 29 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请愿，进一步唤醒国民，同恶势力斗争到底。这次活动由周恩来、郭隆真等出面领导，邓颖超留守接应，刘清扬负责宣传工作，一旦发生意外，迅速通告全国。

1 月 29 日，灰蒙蒙的乌云笼罩着大地，冷风卷起残雪，抽打着城市和行人。各校学生五六千人冒着寒风，冲破军警的阻拦，在东马路集合。下午二时，总指挥周恩来宣布请愿活动开始，并宣读了向北洋政府和直隶省公署提出的四项要求：1.驳回日本通牒；2.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催办福州惨案的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3.恢复天津学联原状；4.释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然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省公署进发，一路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不少市民、工人、店员也汇入了这股洪流。到达省公署后，群众推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人为代表进去见省长曹锐。四人全部遭到逮捕。军警随着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中，用

枪托刺刀横击直刺，学生们有的头被打伤，有的腿被打折，鲜血染红了省公署门前的土地，有五十余人被殴受重伤，造成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当晚，周恩来等四名代表被押往营务处，这是关押死刑犯人的地方，由捕盗营严密看管，条件极其恶劣。由此开始了周恩来长达半年之久的铁窗生涯。

周恩来等人被捕后，白色恐怖笼罩了天津，然而，爱国青年没有被吓倒，反抗仍在进行。1 月 30 日，北洋大学约集各校代表到英租界伦敦会教堂秘密集会，商讨对策，号召人民不畏强暴，与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31 日，学联召集各校负责人在法租界教堂开会，推选临时负责人，并决定组织飞行讲演队，发动民众，起来营救代表，向全国通电，呼吁共讨国贼。并派刘清扬南下上海、南京等地，向社会各界说明事实真相，争取全国爱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2 月 1 日，省一师、官立中学、法政学校等校学生宣布罢课。与此同时，北京三十九所学校一万余人冒雪上街游行，抗议反动政府的暴行。上海三万多群众在跑马场举行集会，大会决议，通电全国，声援天津学生的正义斗争。会后在龙华外交使署举行了抗议示威。紧接着各省、市纷纷集会，致电声援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反日浪潮日益高涨十分恐惧。2 月 2 日，日本驻华公使到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从严取缔学潮，并扬言如此种情况不立即“改善”，日本就将“自筹”对付之策。4 日，在安福系阁员把持下的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通过了“从严处理学潮”的决议。6 日，北京政府颁布取缔学潮和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斥责学生“扰乱秩序”，“显干法纪”，并要采取措施，“轻者查明斥革，重者依法惩办”。形势的恶化，预示着周恩来等被捕代表的狱中生活将经历艰难的历程。

铁窗生活

周恩来于 1 月 29 日被捕，至 7 月 17 日出狱，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半年的时光。其中了月 29 日至 4 月 7 日，被关押在天津警察厅，4 月 7 日至 7 月 17 日被关押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出狱后，周恩来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个人日记，整理写出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本小册子，真实地记录了被捕代表在狱中的生活和斗争情况，记载了各界群众对被捕代表的关心和支持，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残酷镇压爱国运动的罪行。这两本小册子和当事人的回忆，为了解周恩来的狱中生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周恩来等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九天后被转移到警察厅的监狱，在那里关押了两个多月。据与周恩来同时被关押的群众代表、南开大学庶务主任马千里的记载：“同人被拘在警察厅里，是隔绝交通，是一个人拘在一个地方，也有两个拘在一屋的，大家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会谈，不但对于外边的情形全不知道，就是警察厅里边的一同被拘的一共有多少人，都是姓甚名谁，也全不知道；直到临送检察厅的前一两天，才稍稍放松，大家可以晤谈。”[①]《警厅拘留记》中写道：周恩来和于方舟从营务处被押解到警察厅监狱后，要求面见司法科长，而警察不允，双方发生争执。这时，杨以德到了，他说：“我是警务处长，你们有什么意见，只管写出来。”周恩来从容镇定地说：“很好！我们正不明拘禁我们是什么理由呢！”当天下

[①] 马千里：《警厅拘留记叙》，1920 年 12 月 4 日。

午周恩来就写了一份质问拘捕的理由书给杨以德，于方舟也写了一份同样内容的质问书。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杨以德不时来到狱中，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想诱使代表们说出学生运动的主使者、学联会报的主编等情况，但都遭到了代表们的严词拒绝。杨以德黔驴技穷，最后使出无限期拖延处置的伎俩，既不公开审讯，又不释放，妄图以此消磨代表们的意志和锐气，平息反日爱国风潮。为了抗议反动当局的拖延政策，代表们于 3 月 7 日致函杨以德，向他提出三项质问：1.按约法非依法不能逮捕，吾等究犯何法？违何项警章规定？2.望速公开审判；3.处长曾说：“学校先生误人家子弟，当入十八层地狱；为官的要误人家子弟，当入三十六层地狱。”今拘吾等四十余日，学校已经开学，既不能往学校上课，是学生自误耶？先生误之耶？抑为官者误之耶？这封质问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而反动当局却变本加厉迫害被捕代表，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王墨林患便血症已经一个多月，厅中总没有替他请合适医生调治；杨晓林吐血请过几次医生，总没见请到；并且李权的病重，也是因为医生平常不能仔细诊察的缘故。”[①]难友们健康情况的恶化，使周恩来等人心急如焚，他们经过商议，决定采取行动给当局的非人道行为以反击。4 月 2 日，司法科传达杨以德的命令，要各队警察对被捕代表严加看管，不准互相来往。这个消息更加激怒了被捕代表，按照商定的计划，周恩来等人向监狱当局发出最后通告。通告中说，民国约法新刑律，全载有人民身体自由，无故不得受逮捕拘禁的干涉。代表们被捕七十多天，没受正式审判，这种非法对待，众人为尊重人权国法起见，限警厅三日内公审。要是做不到，3 日后全体绝食。4 月 3 日，当周恩来得知两名被捕同学被关进刑事犯拘留所的消息，立即发动全体代表闯进拘留所，与杨以德当面进行说理斗争，迫使他答应放回这两名同学。为了配合狱中斗争，4 月 5 日，天津学联会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人，来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拘代表，他们说：“我们的代表在此关押了七十多天，我们心里实在不安。现在我们来要求替代他们，请厅长把我们二十四人留下，把他们二十四人放出去。”杨以德惊慌失措地回答：“我没有这个权力，请诸位暂且回去，我一定禀明省长。我要不禀明省长，我是禽兽。”他还被迫允许谌志笃、邓颖超等人同周恩来等被捕代表见面交谈。

由于被捕代表中有学生、教员、商人，他们的绝食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与此同时，天津各界爱国人士正冒着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以营救被捕代表。反动当局害怕事情越闹越大，不好收拾，只好宣布：答应代表们提出的条件，保证一二日内将被捕代表送往检察厅。这样，狱中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4 月 7 日，除因病和未成年的代表提前释放外，其余二十一名代表分乘六辆汽车，被转押到天津地方检察厅。到检察厅后，拘留条件得到一些改善。被捕代表向检察厅提出一系列要求，如：准许大家自由往来；准许购买书报杂志；增加探监次数；代表住室要与民事羁押人住室隔开；晚上房间不准上锁；立即着手案情调查，不能拖延时日，等等。经过代表们坚持斗争，当局被迫答应了上述要求。从此，学联和各界联合会的同志们不断地前来慰问探

[①] 周恩来《警厅拘留记》，1920 年 6 月 5 日。

视，内外取得了联系。

在检察厅关押的日子里，被捕代表开始了有规律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开展娱乐活动，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种特殊条件的“监狱大学”的学习。他们开设了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法律、英文、日文等课程，在代表中公推教师辅导，每半月考试一次。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讨论会，讲演会等。被捕代表来自教育、新闻、工商等各界，受过不同程度教育，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互帮互学。

在南开学校教员时子周讲完世界工业革命史之后，周恩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讲演的题目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价说（即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这样系统他讲演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多的，这自然与周恩来在日本时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这段在反动派的监狱里担任马克思主义教员的经历，足以说明周恩来是五四时期较早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在狱中，周恩来还以满腔热情主持和参加了被捕代表们搞的一系列活动。4 月 28 日，是巴黎和会强行通过把山东权利和青岛归于日本一周年。“这种可耻的纪念日，很能让我们在狱里的人，生出许多感想。”[①]当天晚上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山东问题的始末，题目有德国占据青岛的情形；青岛被日占据；日人处置山东的横蛮；中国参战的波折；中国失去山东的自认；和会处置山东的经过；拒签的情形。会后，周恩来还专门写了新闻稿送到报社登载。“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代表们彻底清扫了房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他们用三扇铺板搭成了一个舞台，用几条夹被挂起来作幕布，举行庆祝文艺演出。周恩来和马骏一起演出在南开学校时编演的话剧《一元钱》、《新村正》等，其他代表也高兴地演出了节目。5 月 4 日是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又是大家被捕百日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的。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②]当天下午和晚上，代表们举行集会，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周恩来担任会议主席，由马骏报告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各方面斗争经过，师士范报告五四运动中北京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的情形。报告后举行了文艺演出。通过这些活动，以丰富的精神食粮弥补了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这些年龄不同，出身经历各异的代表，紧密团结在一起，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向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5 月 17 日，他们召开了特别讨论会，讨论社会服务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和对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他们一致认为，出狱后要建立新的组织，发动群众，同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其中主要措施有：商界应由商会组织商业研究所；社会应组织灌输平民知识的小报，或由学生办，或者有这项志愿的人办；学生应成立讲演团，各校分组担任，轮流向城市或乡间出发，演讲合于平民的、有系统的知识；学生应组织平民教育团，单独进行，不与别的团体发生关系，发生影响；学生应该利用课余暇时，加入各界的组织，灌输

[①] 周恩来：《检厅日录》，1920 年 11 月 24 日。

[②] 周恩来：《检厅日录》，1920 年 11 月 24 日。

各种知识，等等。

在此期间，周恩来根据狱中被捕代表的回忆和个人日记等，从 5 月开始撰写《警厅拘留记》，于 6 月 5 日完成。对那段历史做了真实的记录。

6 月 8 日，第一女子师范的李愚如到监狱看望周恩来，带来了她和潘世纶（字述弟）即将赴法国和美国勤工俭学的消息。潘世纶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班同学，并参加了学生会报的编辑工作。看到自己的战友马上就要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去寻找真理，周恩来兴奋不已，他用了两个半小时，写作了一首抒情诗，赠给了李、潘二人。全文如下：

别李愚如并示述弟

（1920 年 6 月 8 日）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
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又来说，
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那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
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述弟来信告诉我，
说你给他去的信道：
“……况且我是个人，
可以做工自给的；
无论如何，
总不至饿死他乡！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没有得到一日的。……”
你别时也同我说。
“……买四等票，
坐三等舱。……
……勤工俭学去
念一年书后，
工读自助。
……研究实用理论；
本我的志趣，
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
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勃勃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过南京！
见着述弟；
想象中下关车站。
黄浦江畔，
一刹那的别离难。
同在世界上，
说什么分散。
何况情景绵绵，
“藕断丝不断”。
两月后，
新大陆又见述弟的足迹。
大西洋的波澜，
流不断你们的书翰；
两个无线电杆，
矗立在东西两岸，
气通霄汉。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周恩来对战友远行的美好祝愿，也流露了他打算出狱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想法。周恩来对这首即兴之作，很是满意，他在诗后注道：“今天我从下午四点钟做起，做到六点半钟。居然成功了。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总要算是‘上中’了。”

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后，觉悟社并没有停止活动，谌志笃、邓颖超等人继4月5日发动替代代表入狱的行动之后，又加紧采取各种措施，设法营救代表。他们一面广泛发动天津及全国广大爱国人士用社会舆论向反动当局施加压力，一面聘请著名律师刘崇佑先生为被捕代表辩护，进行合法斗争。反动当局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在近期内对被捕代表开庭审判。

法庭斗争

7月6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罪名是“骚扰罪”。7日，在法庭调查中，周恩来等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检察官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并且质问法官：“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刑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扰罪名，或可有之。”[①]8日，是法庭公开审理的最后一天，觉悟社成员以及爱国学生、各界群众都列席旁听，“旁听人较前两日增加一倍之多，伫立门外，不得进厅，立候消息者，亦有数百人。”刘崇佑律师在为被捕代表的辩护中说：查国民力争外交，是人民应有心理，应有责任，亦系民主国自卫天职。御外侮，避危险，系人民应作之事。当局不但不加保护，反来摧残蹂躏，未免贻笑日人。天津当局以捕捉拘留为能事，实含有意气作用，蹂躏人权，大杀民气。逮捕数十人之多，种种拘束羁押，数月之久，欲求正式裁判而不得，故有绝食之举，可想待遇之如何状态矣。国家所设刑律，非为行政长官立威而设。法庭审理案件，宜详查事实原因，与其心理作用，再证之以真正确据，按之种种情形，为定罪之标准。岂得以不确证据依行政官之意见，不加考察，遽尔起诉。不敢讳言，真系遗憾之事。故对于起诉之处，真不敢赞成。周恩来等人在答辩中说：“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一百六十四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去岁各省代表请愿总统数次，亦未闻有加以刑事处分者。以总统之尊严尚且如此，况一行政官吏乎。”律师的有力辩护和周恩来等人的答辩，使得参加旁听的群众异常兴奋，情绪热烈，他们不时报以掌声和喝彩声。而对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官的提问，时而发出“嘘”、“嘘”的嘲笑和讽刺。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自知理亏，内心空虚，如坐针毡，只得草草收场，宣布闭庭。7月15日，刘崇佑律师向法庭递交了《辩护意旨书》，其中写道：“本案事件，由于力争外交，抵制日货而起。此项心理，此项举动，实吾全国人民所同情，而为民族自卫之天职也。国势危殆，因于内争，遂召外侮。今日幸而有一致蓬勃对外之民气，一伸于

[①] 周恩来：《检厅日录》，1920年11月24日。

其间。行政当局不能善为调护，使之顺轨而趋，以收后盾之效，乃一激再激，枝节横生，继酿大狱。始则以军警强压制之威，继则以囚辱吐意气之愤，义烈争公之士相继被捕。按起诉文所列事实之总纲，首称交涉日亟，学生抵制日货，以为后援。全国风靡，津府亦然。是则抵货风潮，为吾国人对外感愤之公意，并非触犯刑章，固检厅所明认也。”“本案起诉文所载各项，头绪虽繁，而事实则甚简。分类罗列，一若在法莫不可诛，而一按真实情形，则殊不值一击，事实俱在，法文俱在，万象所瞻，非辩护入一人之私言也。惟望贵厅一振法权，伸以英断，实为幸甚。”

7 月 17 日开庭宣判，前来为代表们助威的人更多了。法庭上挤满了旁听的人们，天津河北三马路上的地方审判厅的外面，站立着伫候消息、声援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的浩大队伍。开庭后，审判长理屈气虚，含糊不清地宣读了所谓的“判决书”。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以羁押日期折抵，在押两日抵一日。宣判结束后，全体被捕代表当庭释放。“代表们胜利了！”法庭上立即沸腾起来，人们欢呼着把被捕代表们围住，争相握手祝贺，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以天津市民的名义，向代表们献上大红绸花，并把镌有“为国牺牲”四个金光闪闪大字的纪念章佩戴在周恩来等代表的胸前。几百人一起陪同代表们走出审判厅，并在审判厅前合影留念。然后，他们分别走上插着“欢迎代表出狱”彩旗的九辆汽车，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向欢迎大会会场驶去。在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向到会者报告了代表们的狱中斗争生活，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欢迎词并向获释代表赠送纪念品。老绅士冯骏甫向每位代表赠送一把自书的扇子，扇上书有冯老先生作的诗一首，其文是：“囹圄羁縻半岁余，群公何事掷居诸。多因爱国遭兵警，翻被抛家厄吏胥。志士同心光历史，谳员无法定爰书。愿得民意回天意，瀛海澄清捕鳄鱼。”会后，由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和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在会宾楼举行宴会，慰劳全体出狱代表。

长达半年失去自由的监狱生活，使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更加认清严酷的社会现实。出狱一年多后，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五四运动的暴风骤雨和反动当局的逮捕羁押，使周恩来更加稳重成熟起来，他由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领袖，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聚会陶然亭

出狱后，周恩来稍事休息，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战斗。尽管在被捕期间，他和马骏已被南开大学开除，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情绪，这时的周恩来已不再是两年前在日本考学时的周恩来了。8 月初，周恩来在法租界的一幢小楼上主持召开了觉悟社的年会，出席的社员有十四人。会上，周恩来总结了觉悟社成立近一年来的工作，指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还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斗争。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字。觉悟社社员一致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并议定写信给北京的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讨论会，发起全国范围的大联合。会后，周恩来偕同觉悟社社员十

一人来到北京。

8 月 16 日上午，觉悟社在陶然亭约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进步团体代表二十多人举行茶话会，共商爱国运动大计，并请李大钊到会指导。古老的陶然亭旁，树木高耸，浓荫蔽日。代表们环亭而坐，倾心交谈，深入思考，热烈讨论，使芦荻萧瑟的陶然亭生机盎然。会上，刘清扬报告开会宗旨，邓颖超介绍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做了说明，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李大钊在会上也讲了话，提议各团体育标明主义之必要。他认为，确定共同的、明确的主义，是联合改造的基础。“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李大钊还向青年们提出恳切的希望：今后各团体要进一步加强联系，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 20 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这次会上决定，由到会诸团体各推三名代表继续讨论联络问题。

8 月 18 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五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会议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进行以下工作：“宣传事业之联合；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陶然亭聚会，使周恩来受到新的启发和鼓舞，尤其是李大钊关于必须首先标明主义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赴法求学，到巴黎公社故乡去“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他开始积极为之做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留学的爱国教育家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勤于作工、俭以求学”，到法国去“半工半读”。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国内大批青年受到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的推动，渴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前赴法国求学。1919 年至 1920 年间，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已达一千六百多人，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做出赴法求学的选择的。

周恩来的选择，得到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的全力支持。尽管周恩来已失去南开学校的学籍，但严修对他夙极器重，为继续培养他，特在南开学校设“范孙奖学金”，金额为银洋七千元，提出选派周恩来、李福景出国深造，经与校长张伯苓商量，张亦同意。其后，在南开校董会上研究并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一致认为周、李符合条件，同意派他们出国留学。留学地点，最初考虑去美国。适其时值欧战后美元价高，乃决定去欧洲。这样，已被南开学校开除“学籍”的周恩来，又在南开学校“范孙奖学金”的资助下，开始赴欧求学。据严修日记记载，周恩来、李福景临走时，他又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信。以后，汇给周恩来的资助，按期由严修交李福景之父李琴湘寄李福景代转周恩来。周恩来对严修的培育之恩终生不忘。据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学校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了研究劳工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以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周又对我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严修

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引用中国一句成语‘人各有志’。”

10 月 8 日，周恩来和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证明。周恩来在行前又同天津的《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记者，经常为他们撰写旅欧通讯，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期间的生活费用。10 月 18 日，周恩来等离开天津，去上海候船赴法。

赴欧求学，是周恩来生活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周恩来对此行寄以极大的希望。他在到欧洲后不久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表明了他赴欧求学的主要目的，其中写道：“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此时的周恩来，思想在颤动，革命意识在萌芽，他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之情，要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实地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真实情况，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改造理论，从而经过充分的比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腾飞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六赴欧入党

远涉重洋

1920 年 11 月 7 日清晨，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在迷离的晨雾中鸣起汽笛，起锚离港，沿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这是一艘两万吨级的巨型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住在邮船最底层的统舱里。与周恩来同行的有郭隆真、张若茗、李福景等一百九十七人。昔日同窗好友，今天共赴异邦，他们的心情异常激动。

“波尔多斯”号邮船这次的航程近一万六千公里，历时三十六天，经过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沿途经过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旅途中，周恩来饱览绮丽的海洋风光和异国的奇特情调，感受着世界的壮阔、富饶和美丽。同时，他也亲眼看到，广大的亚非地区，被帝国主义列强鲸吞蚕食、欺压掳掠。那里的人民，在列强的铁蹄践踏下挣扎呻吟，过着苦难的生活。使周恩来感触尤深的是，一出国门，就觉得中华民族处处受人歧视欺侮，国际地位很低，这使他深感愤慨。他常同李福景等交谈，议论着祖国的前途和青年的责任。途中，由于海浪汹涌，轮船震荡得厉害，很多同行者在舱里静卧。周恩来却总在船头甲板上坐着，手不释卷。在轮船航行到印度洋时，周恩来写作了《（检厅日录）的例言》。到法国后，他把《检厅日录》邮寄回天津，托马千里修正、补充，在《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

12 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著名港口马赛。在那里，同学们登岸换乘火车，并于第二天早晨到达巴黎。李愚如等先期到达的南开同学到车站迎接。据李愚如后来回忆，当时，周恩来穿着一件黑领子的旧大衣，手中提着简单的行李，同欢迎的人一一握手，满脸是见到旧友后的喜悦和笑意。周恩来由南开同学带到拉丁街旅馆暂住。他到巴黎后在给严修的信中写道：“留法中国学生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约在两千人以上，与今日留日学生数目差相近矣。南开同学在法者有二十余人，多数居各地，在巴黎不过数人。”

考察英国煤矿工人运动

周恩来因生了点小病，在巴黎住了半个多月。随后，在 1921 年 1 月 5 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准备在英国入学。他在从伦敦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伦敦作为他求学欧洲的第一站，是因为他认为：“伦敦为世界最大部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人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①]

周恩来到达英国时，英国煤矿工人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成为

[①] 《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续编，文物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第 70 页。

社会各界注目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发生这个事件的直接原因，是 1920 年和 1921 年英国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英国矿业资本家为转移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采取降低工资，解雇工人等措施。于是，煤矿工人采取联合罢工的行动，回击资本家。这件事立即吸引了周恩来，他开始对此事进行认真的考察。他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破坏是全局性的，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正是战后欧洲经济危机终不可免的产物。1 月 25 日，他在致严修的信中写道："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瘦"，"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2 月 1 日，他以《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为题，给天津《益世报》写了第一篇旅欧通信。文中劈头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吾人未出国前，虽屡震夫欧战影响巨大之论，然终以为欧洲物质文明发达甚盛，数年来之摧残，特不过数部分耳，何能碍及全体之发展。比以实验证之，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诸梦呓。"周恩来推断道："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4 月以后，英国煤矿工人运动高潮又起，有上百万人参加了罢工。这时，周恩来已离开英国到法国，但他继续对这个运动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先后写出《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九篇通信，约三万五千字，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周恩来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①]

对英国煤矿工人运动的考察和研究，是周恩来赴欧后特别着重做的一件事情，此事对于他对各种主义进行推求比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那之前，他认为拯救中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革方案：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就是英国社会改良的道路。在这两种方案中，哪一种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呢？周恩来还没有做出决断。他当时似乎主张将两个方案结合起来更为有利。他在给陈式周的信中写道："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对英国煤矿工人运动的考察，使周恩来抛弃了将两个方案合二为一的想法。他最终得出结论："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周恩来做出如此正确的选择，得益于他在长期的斗争中养成的思想方法。周恩来从来不是那种单凭主观想象或一时冲动就轻率做出行动的人。他讲求实际，决不盲从，总是在对实际情况做出认真考察之后，经过细心的反复的比较，然后才审慎地、果断地做出自己的抉择。

[①] 载 1921 年 7 月 29 日天津《益世报》。

周恩来在英国居住了五周后，于 2 月上旬又回到法国巴黎。这次迁移主要是由于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语，但考期在 9 月，还要等半年多时间，而当时英国的生活费用在欧洲是最高的。在伦敦生活，每年约需费二百镑，合中国货币在千元以上，比巴黎的生活费用高一倍多。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周恩来来到了巴黎。

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回到法国后，周恩来往在巴黎拉丁区，在巴黎近郊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他除学习之外，还进行社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撰写通信，有时还翻译一些稿子，用稿费来补贴生活和求学的费用。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中，他仍将“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

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1920 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并参加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周恩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进步报刊。他阅读的时候，认真地记笔记，写眉批，在重点内容旁划着重线。一本保存至今的周恩来当年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英文版）书中，在下面一些话下划了着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周恩来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充分的推求比较，他得出结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大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科学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过反复的学习、思索和比较，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1921 年春，周恩来在度过他的二十三岁生日后，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经中央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人党时间。从此，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申府和刘清扬是在 1920 年 12 月 27 日从国内来到法国的。刘清扬是觉悟社的社员，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她同周恩来本来十分熟悉。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也很活跃，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刘清扬同张申府结婚后一同赴法。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二人相遇，自然十分兴奋，时常去他们的住处，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周恩来从他们那里得知，1920 年秋，中国共产党已在国内筹建，北京最早的成员是李大钊和张申府。他们出国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国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

清扬参加。周恩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当即表示要求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刘清扬和张申府对周恩来的情况十分了解，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做了他的介绍人。

选定主义和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使周恩来的心情格外喜悦。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 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①

参与和报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

在对主义进行探索和选择的同时，周恩来积极参与和报道了留法学生，特别是勤工俭学生的斗争，致力于把他们中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那时，在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已形成热潮，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不少人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人在国内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就自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维护勤工俭学生的合法权益。并且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为中心。1920 年到 1921 年，这里的中国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弟、萧子章、向警予、蔡畅等。大多是蒙达尼公学和女校的学生。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在这里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不久改名工学世界社，在社章中规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另一个中心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这里的中国学生都在工厂里做工。其中有赵世炎、李立三、邓小平、刘怕坚、陈公培、鲁易等人，他们成立了劳动学会。赵世炎出国前在上海见过陈独秀，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他同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1 年 2 月中旬，周恩来刚从英国回到法国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正在进入高潮。爆发斗争的原因是：1 月中旬，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这部分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占三分之二以上，一停发维持费，就使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学生顿时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蔡元培等人向北洋政府发出请款救济之电，遭到拒绝。这时，又传出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勤工俭学生的捐款的消息，使学生们更加忍无可忍。2 月 28 日，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领导下，到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示威，高呼争取“生存权”、“求学权”和“工作权”的口号。他们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中国学生自由入校。法国当局派出上百名警察，出动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从英国回到法国后，立刻对这次事件的前后经过进行详细的了解，写出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他对参加斗争的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又对他们的某些要求和做法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

1921 年 6 月至 8 月，周恩来积极参与并报道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斗争，这次斗争是围绕反对北洋政府专使向法国秘密借款而展开的。6

月初，北洋政府派遣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有矛盾，这件事在 16 日的巴黎各大报纸上报道出来。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6 月 30 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当天，周恩来撰写通信《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指出：“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禁死断无予以‘可’字者。”他把这次斗争与“二二八”斗争相比，认为“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在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问题的讨论。

7 月 25 日，法国《巴黎时报》透露，中法借款合同草约于当日草签。旅法华人群情激愤， 25 日和 29 日两次集会，发表通告，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7 月 30 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

8 月 13 日，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不敢出席，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会上，迫使王曾思代表陈箓和使馆全体官员签字声明：反对中法借款；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这一声明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法国外交部一份。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16 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向国内报道了这一情况。

中、法政府当局对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款斗争非常不满，中国驻法公使馆于 8 月 20 日发布布告 :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9 月 12 日，里昂中法大学也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另从国内招收新生。这两件事，实际上把很多勤工俭学生一步步地逼上绝路，由此引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掀起了勤工俭学生斗争的第三个高潮。

9 月 17 日至 19 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接受了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的提议：组织勤工俭学生在国内学生抵达法国之前赶到里昂，占领中法大学。周恩来在讨论中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并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个提醒和建议是十分重要的。

9 月 21 日清晨，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

颜昌颐、罗学瓒等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冲进中法大学校门，由于学校早有准备，所有教室、宿舍的门都已上锁，无法进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与校方交涉，但遭到校方拒绝。校方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出动大队武装警察，把这些“先发队”队员包围起来，押送到一座法国兵营里囚禁。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四处奔走，开展营救活动。但由于中、法两国反动政府互相勾结，坚持其驱逐被捕勤工俭学生的立场，使所有的营救活动未能奏效。

10 月 13 日，法国当局派出武装警察二百多人将这批学生（共一百零四人）押送到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只有赵世炎在同志们帮助下逃了出来。“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篇通信《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分十八天在《益世报》上连续刊出。他在叙述这场斗争的整个过程后，满怀激情地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为了把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押送回国后勤工俭学生中留下的骨干分子团结起来，周恩来、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共商成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事。他们议定：分头进行筹备工作。这样，在周恩来等人的倡导下，历时近一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终于开始走向它的合理的归宿。何长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周恩来不仅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而且表现出对于事变的卓越的观察能力和组织运动的领导才能，成为大家一致公认的‘很重要的人物’。”

伍的誓词

1922 年 3 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搬到德国，住在柏林南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五十四号。去德国的原因是：德国在战后马克贬值，一日几变，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活费比较低廉。在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到柏林不久，周恩来从国内来信中得知觉悟社社员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消息，十分悲痛，写《生别死离》诗，随信寄给国内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以表心志和悼念之情：

生别死离

（1922 年 3 月）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远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正品（即黄爱）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 C.P.坚定的倾向。""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表达了他在成为共产党人后那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周恩来的诗和信，后来以《伍的誓词》为题发表在国内觉悟社主办的《觉邮》上。

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已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周恩来经常奔走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生中作过多次讲演，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到 5 月底，经过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和赵世炎等人的努力，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时机成熟了。

撰写《旅欧通信》

[1]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7 页。

作为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周恩来对工作极端负责，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大都用来写作《旅欧通信》。从 1921 年 3 月至 1922 年 3 月，一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在《益世报》上发表《旅欧通信》五十六篇，共二十多万字。除了对旅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以及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考察报道之外，《旅欧通信》主要介绍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国际新闻和国际工人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等，内容丰富，见解精辟，报道及时。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重大事件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和深邃的观察力。作为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兼职记者，在从事紧张的学习和革命活动之余，能写作出这样多高质量的稿件，确实是件件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啊。当然，写作通信对于周恩来锻炼和培养自己的观察分析能力和写作水平，以及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和地理知识，理解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大有帮助的。从后来周恩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出的炉火纯青的外交风格和迷人魅力中，可以使人们感受到他在旅欧时期写作《旅欧通信》所获得的裨益。下面选择几篇主要的通信作介绍：

1921 年 6 月 16 日，周恩来撰写《近东问题与英法之态度》，详细报道了希腊、土耳其战争经过，指出：列强之间的相互争夺是世界“祸乱之源”，“伏将来无穷大患”，而“俄国则在以世界革命之思想，鼓动其民族之真正独立”。

8 月 24 日，撰写《西俄大旱之惨状》，文中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遇到的困难，深表关切与同情，详细报道了苏俄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救灾的种种措施，对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给予好评，认为“列宁此举，可谓通权达变，以求改造后新俄之渐进的建设，与方革命后之急进步骤，大有分别矣”。

9 月 3 日，撰写《复辟声中之德意志》。文中详述战后德国政治的演变，分析德国复辟势力卷土重来的原因，对此深感不安，认为“两年来之反动，视诸方革命后之急进变乱，真有退步现象”。尤其是德国一部分大学生倡导复辟，出现与工人格斗事件，“为学生界之奇耻”，“此风不单行见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有破裂之虞，门户之见，殊足为改造前途伏无穷隐忧也”。

9 月 14 日，撰写《欧洲之救济事业》，向国内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巨大破坏，“失业工人之多，产业之不发达，商务之停滞，原料之减少，铁煤之不足，金融之紊乱，灾害之丛生，国家之出入不能相抵，何一非此次大战所遗留之祸害耶！”他得出结论：战争之为害与预备战争之为祸，直可以使世界生产为之毁坏，人类为之减少，幸福为之消灭，经济现象为之紊乱。重以言之，即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

11 月 5 日，周恩来撰写《大西洋上之太平洋会议观》（一），8 月续写（二）。文中评述了将于 12 日召开的美、英、法、中等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的实质，他认为，昔日之巴黎和会，是列强分赃之会议。而今日之华盛顿会议，则是一斗争勾心之会议。他着重指出：美、日、英“三国所争所引者，咸以吾国为对象，关系之深，问题之重，实以吾国为首”。事态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 12 月初，华盛顿会议决定将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由美英两国代表作为调停人。周恩来又写了《山东问题最危急时之情状》，向国内民众通报了这一“覆国之危”。

1922 年 2 月 6 日，周恩来撰写《劳动世界之新变动》，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联合

起来，加强团结。他指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这是稍知欧事者皆能相信。什么政府中的劳动政策，社会上的慈善济贫事业，在劳动问题根本解决上，早已失其威灵同效验。最切近而又普遍的，凡是劳动界中人，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应这个需要。这不但欧洲如此，美洲同澳洲的工人也都是这样相信，甚至于现在新潮流方侵入的亚洲，也都发生了一点影响。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己成了必然的趋势。”周恩来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重要性，他指出，劳动阶级的对手，是强大的资本阶级，他们若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斗争，结果只有败退。所以劳动阶级如果认清了敌我两方的情势，则无论各派在将来的改造方法如何，而在现在这种冲锋的阵势上，总应该力求联合，勉图一致，好免掉敌人乘间攻入的危险。他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竭尽全力地促成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

1922 年四五月间，由于筹备组织的工作日益繁重，周恩来不得不停止为《益世报》撰写《旅欧通信》，并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将全部时间放在组织上”。但他的笔并没有搁下，每天晚上，他仍旧通宵达旦地读书、写作，用勤奋的笔起草党的文件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的文稿，这些文件和文稿大都刊登在以后创刊的《少年》、《赤光》以及国内由觉悟社主办的《觉邮》副刊上。《旅欧通信》以及在《少年》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稿，像一条红线，贯穿周恩来旅欧时期斗争生活的全过程，是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历史文献宝库中的光荣篇章，是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的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七旅欧之部

从少共执委到旅欧之部书记

1922 年 6 月，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诞生了。它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是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场上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十八人，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章、刘伯坚、傅钟、余立亚等。一位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妇人租给他们十八把椅子。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久别重逢，有的初次相识，他们热烈地交谈着。在外人看来，这些中国青年仿佛在搞一次郊外野游。周恩来对地点和环境很满意，他对赵世炎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周恩来报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周恩来最初提议的组织名称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在章程草案中，周恩来还提出加入组织时要进行宣誓，也有不赞成的，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对此做了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开了三天，最后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全面开始了它的工作。当时，它的总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小旅馆内。赵世炎就住在这里。经常在那儿工作的还有李维汉和陈延年等。周恩来回到柏林，向旅德党组织汇报会议情况，着手在德国做发展组织的工作。这些少年共产党员们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生活，尤其是赵世炎和周恩来，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领导工作，他们坚定、机智，待人诚恳，富有组织才能，在旅欧青年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不久从国内传来消息， 1922 年 5 月，也就是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10 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会上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工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 11 月 20 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他们筹集了一笔路费，派遣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一个消息：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莫斯科。他们立即去信表示敬意，并声明己向国内提出了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组为青年团旅欧之部的请求。1923 年 1 月，接到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发自莫斯科的复信，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并对他们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了指示。

19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 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

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代表着七十二名少共党员。会议讨论了少共建党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改组案等二十项提案。决定将少共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其中第一条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A、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B、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C、绝对不信奉宗教，不属于任何宗教性质之团体；D、经团员二人之介绍与担保及本团执行委员会之通过。”这时，中共中央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十二人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上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五人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为执行委员会书记。聂荣臻当时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写道：“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①]

会议结束后不久，收到了国内团中央 1 月 29 日的来函，批准他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3 月 13 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介绍了 2 月会议的情况。报告中说：“在我们这封信尚未写完之时，我们竟得着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许可我们加入的公信，我们看着后，真欣喜无量！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3 月 18 日，周恩来陪送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到柏林，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与他们依依惜别。

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后，在这一年夏天从柏林迁回巴黎，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小旅馆三楼第十六号房间，这也是旅欧之部的办公处和《少年》杂志编辑部。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如赵世炎在到达苏联后向中共旅莫支部报告的那样：“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①]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过：“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②]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下设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运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四个组织。其中共产主义研究会负责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学生运动委员会“主张维持勤工学生的总团结，同志们活动须量力而为，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华工运动委员会负责通过我党主持的华工总会以及《华工旬报》对旅法华工进行工作；出版委员会负责出版中文月刊《少年》，“因留法勤工俭学生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是为我们宣传障碍，另一方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

[①]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 页。

[①] 中共旅莫支部会议记录，1923 年 4 月 28 日，手稿。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卷，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 页。

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1]除了主持共青团执委会的常务工作之外，周恩来还经常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巴黎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真面目，并与他们展开辩论。在那间面积仅有五平方米的房间里，他经常是通宵不眠地工作，而在生活上却是异常简朴。聂荣臻说：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少年》撰稿人

《少年》创刊于 1922 年 8 月 1 日。最初是月刊，十六开本，每期三十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二十四开本，四十二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作为旅欧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发表过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以及法共《人道报》上登载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等译文，还刊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消息。

作为少共中央的宣传委员，周恩来为创办《少年》杂志做了大量工作，他还亲自撰稿，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党原则，批判在旅欧学生中很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在 9 月 1 日出版的《少年》第三号上，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思来阐述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真理。他写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周恩来认为，资本主义的祸害的根源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他辛辣地嘲笑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去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既然这样空洞，所以，“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文章结尾写道：“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

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的言论，文章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句话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面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周恩来写道：“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

---

[1] 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 1 号，1923 年 3 月 13 日，手稿。

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

在《告工友》一文中，针对旅法华工在华侨教育经费问题上与勤工俭学生之间的误会，周恩来指出，华工之所以“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原因在于缺乏“声势浩大”的“有团结有组织”。他认为，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华工和勤工同学“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手，不当有丝毫的误会，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

12 月 1 日，周恩来在《少年》第五号上发表《十月革命》一文，他在详细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之后，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还着重指出在工业后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这并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恰恰相反，在发生共产革命的工业后进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因此，不能忽视易于革命和无产阶级易于握得政权的时机，这样才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工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关于十月革命的成功之道，他写道，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

12 月 15 日，在《少年》第六号上，周恩来发表《论工会运动》等三篇文章。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他写道：共产党“只是要做成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来率领劳动群众。他本应除掉工人利益而无其他利益，他的行为如能获得工人的信任，则工会对他自不论政治的经济的策略都能一致接受。”工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取得政权后则是参与社会经济管理，建设新社会。

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工余》杂志上一篇署名“三泊”的人写的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工余》杂志是由旅法中国青年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主办的。三泊认为，俄国施行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在俄国试验失败”的佐证。周恩来驳论道：“这真太背事理。俄国之施行新经济政策，其在事的根据上，实有极重要的来源可说。”新经济政策决非能作“俄国共产主义失败”的佐证，相反它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周恩来认为：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呢！“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我们应知俄国现正在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期中，换言之，便是正处在共产革命期中。”

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的主张。指出：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变为半殖民

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胡适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胡适鼓吹的这种“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文章还强调了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透过周恩来在《少年》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共产主义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与五四时期的文章相比，已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同时，也看出他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的研究。这与他成长经历和所处环境有关，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特点。

介绍朱德入党

1922 年 11 月，周恩来和张申府在柏林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时年三十六岁，四川仪陇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跟随蔡愕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护国战争，担任旅长，后来担任过昆明陆军宪兵司令和警察厅长。当时中国社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使他陷入了重重痛苦和迷茫之中，他在阅读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弃官出走，与孙炳文结伴，到上海、北京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然而，他们的入党要求在上海却遭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陈独秀认为，像朱德这样的旧军人加入共产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和申请。”朱德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1922 年 9 月初，朱德和孙炳文乘“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来到法国。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根据朱德谈话写成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对朱德与周恩来的首次相见及周恩来介绍朱德入党的情况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

“这两个人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了下来，他们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朱德连忙向主人打听。这批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据说是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就是后来和他的战友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和蔡畅（李的妻子）回国创造中国历史的那个人。主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批人，可是有人告诉他们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他已到德国去组织另外的支部了。

“他们两个人坐火车于 1922 年 10 月底到达柏林，立即去周恩来的住处。这个人会不会像同胞手足一样接待他们呢？会不会疑虑重重，详细询问他们在军阀时代的经历呢？朱德想起自己的年龄，他已三十六岁，青春像一路鸣叫的鹰，早已一闪而逝，留给他的是衰老和幻灭。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周恩来举止优雅，待人体贴，在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

甚至还有些腼腆。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他娓娓而谈，周恩来就站在他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把话说完，才提出问题。”

朱德将自己的身世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并告诉他，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月，回信来了，两人都被吸收为正式党员，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保持秘密。”

朱德曾极其兴奋地回忆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

周恩来与朱德的柏林相识，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重大事件之一，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们风风雨雨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肩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创造了辉煌的事业。然而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朱德，他们始终都牢记着 1922 年那个金色的晚秋。当 1976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时，年逾九旬的朱德心情异常悲痛，他仁立在周恩来遗体前，行军礼致敬。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周恩来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①]。

参与国共合作

1922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这个精神很快传到了旅欧之部。9 月 1 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1923 年初，孙中山派王京歧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歧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曾经作为先发队员积极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联系。3 月 10 日，周恩来主持旅欧共青团常务会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

6 月 16 日，周恩来与尹宽、林蔚一起到里昂与王京歧商谈合作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八十余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与此同时，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全体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8 月，周恩来在给王京歧的一封信中阐述了旅欧共青团对国共合作的主

[①]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4 页。

张，他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对如何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由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员扩及到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本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11 月 25 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王京歧回国述职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族欧支部的工作。在会上的发言中，周恩来批评了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①]。

1924 年 1 月，在孙中山主持下，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消息传来，2 月 15 日，周恩来写作了《革命救国论》，指出：“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中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他认为，过去国民党“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十二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至大的失计”。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论述，表达了周恩来对国民党改组所寄以的热望。

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但为什么又要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人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呢？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恶意攻击，6 月 1 日，周恩来写作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文中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都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以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周恩来认为：“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能得到真正生活。”这里，周恩来以明确的语言，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在建党初期的 1924 年，对这个重大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做出如此深刻和准确的表述，标志着周恩来已经具备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旅欧中国共青团的负责人和国民党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周恩来以卓越的工作在旅欧学生和华工中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国共合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在 1924 年 7 月下旬，他启程归国的前夕，还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会议，对国共合作的不断发展表示满意，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2 页。

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

1923 年 7 月，在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人领导下，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开展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

那一年的 5 月 5 日，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山东临城被武装土匪劫持。三十多名英、法、美、意等国旅客和两百多名中国旅客被土匪绑架，作为进行要挟的人质。事情发生后，北洋政府交通部连夜开会商讨，交通总长吴毓麟亲赴临城与土匪交涉。至 6 月 12 日，被劫持的三十多名西方人质全部获释。而帝国主义列强却抓住此事不放，大做文章，提出了由列强国家“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无理要求。

7 月 2 日，法国《巴黎时报》刊载消息：列强鉴于中国 5 月间发生外国旅客被劫持的山东省临城劫车事件，准备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旅法华人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痛恨不已。第二天，周恩来以《少年》杂志社代表身份，发起并出席旅法各团体代表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的集会。会议决定开展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8 日，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代表二十二个旅法团体在巴黎中华饭店集会，通过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具体办法，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周恩来被推选为中文书记。当晚十二时，周恩来以临时委员会的名义向上海《申报》、北京《晨报》拍发了“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次日，又连续发出“致中国旅欧、日、美、南洋工商学各界电”、“致中国驻外各公使函”，大声疾呼：“交通命脉，落入人手，民族一线生机，势将断绝，此而不争，何以图存？”“念我族欧、日、美及旅南洋工商学各界，爱国热忱，定不我后，尚望本此同感，一致进行。”这些充满民族危亡感的火一样的电文，激励着国内人民及海外华人投入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

7 月 15 日，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举行，到会的有六百多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讲：“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散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对这次事件的原因和将会产生的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中写道：铁路共管的借口之资，是说中国的土匪猖獗，政府无能。然在事实上，土匪的来源，实由于变兵和游民之增多。军阀的互相争霸，虽足以直接造成变兵和游民，但间接的责任，却应落在勾结军阀榨压中国人民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身上。操纵指使者一日不死心，中国军阀的祸乱，将永无已时，全中国人民，也将永沦为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至于穷困以死而后已！“我们认清了这次外交事变的对象，明白了他的来源和将生的祸害，我们便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这妨碍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周恩来号召各界民众联合起来，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的钢铁洪流，他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啊！国民革命的热潮在中国各地，至少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已涨得那般高了。我们现在立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运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

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啊！”[1]当晚，各团体代表三十多人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经过投票选举，周恩来、徐特立、郭隆真、许德珩、袁子贞等当选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仍被选为中文书记。经过一番筹备，7 月 31 日，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巴黎二十四家报馆记者和一些法国进步入士出席。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代表用法语宣读了演说辞，介绍了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起因、真相、危害和中国人民反对共管的决心，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第二天，法国各报纷纷发表评论和报道，表示同情和支持旅法华人的爱国行动。

与此同时，国内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高潮。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人的文章，深刻揭露帝国主义者在处理临城劫车案上的卑劣用心，号召各阶层人民召开劳动大会、国民会议，进行有组织的强有力的抗争。工商学界也行动起来，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誓死保卫国家主权。

在中国人民的誓死抵制和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帝国主义者被迫退却了。8 月 10 日，在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十六国外交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的照会中，没有提出由列强各国共管中国铁路的要求。这场斗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旅法华人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周恩来始终站在第一线，他不仅是斗争的发起者，而且参加了斗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亲自撰写了大量的函电和文稿，表现了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深刻认识。通过这场斗争，周恩来和旅欧中国共青团的威望得到进一步增强，他们所团结的爱国民主力量更为广泛了。

主编《赤光》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在 1924 年 2 月改组为《赤光》，由周恩来负责主编，邓小平等参加编辑和刻印。

《赤光》同《少年》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办刊的重点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规律和方针的探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这反映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的进展。《赤光》为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十二页左右，出版起来比较迅速而灵活。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赤光》虽为油印，但刻印质量好，字迹秀丽清晰，尤其是装帧特别典雅，受到读者好评，这要归功于刻印者邓小平的创造性劳动，周恩来等人高兴地称他为“油印博士”。

《赤光》的发刊词刊登在 2 月 1 日出版的创刊号上，题为《赤光的宣言》，未署作者名。根据周恩来主持旅欧之部工作和主编《赤光》的情况，以及发刊词的内容和风格，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篇发刊词是周恩来所作。《赤光的宣言》以一首激昂的新诗作为开头，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印象：

赤光的宣言

（1924 年 2 月 1 日）

---

[1] 周恩来：《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少年中国》第 4 卷第 8 期，1923 年 12 月。

革命的赤光，
从北俄腾起，
惊醒了
冬虫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
震动了
春蚕般茧缚的世界殖民地，
封建余孽，
国际的强盗，
更被他照的原形毕露。
夜已阑，
天将晓，
赤色之光，
早在东方闪动了。
休忘记——
远的土耳其，
近的印度。
是呵！
要寻求
自由，
独立，
原只有接近赤光，
走向世界革命的大道。
起，起，起，
我们的朋友！

接着，文章阐述了《赤光》的办刊宗旨：“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

在《赤光》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文章分析了国内军阀混战的情况，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而指出，新旧军阀都不足恃，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周恩来与王若飞合写的文章《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严厉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文章指出，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盐税共管之后，有铁路共管、江河共管，不久将有无线电共管，最后财政共管一出，列强共管中国的阴谋便完全成功了。“到那时共管中国的事实便由这先画龙后点睛的手法中完全实现了。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啊！”

在《赤光》第二期发表的《革命救国论》中，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他写道，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

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灭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间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他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而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官僚买办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3 月 1 日出版的《赤光》第三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文章批驳了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诬为“排外举动极盛”、“拳祸将再发生”的种种谰言，论述了爱国、救国运动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系。文章强调指出，我们倡言救国运动“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为救国而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要想将军阀打倒，将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

《赤光》第八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的《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在分析了各派军阀之间内哄不已的历史和现状之后，他提出，结束军阀内哄，拯救国家的希望在于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内哄亦不过证明此混乱之局，军阀自身决无能力整治，尤其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煽动勾结的军阀，更无能力整治，代之兴的，只有国民革命派。他提醒道：“只是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本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国民革命派在北洋军阀的内哄的混战中，需要严密的战线，严防其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才不致为敌所乘而打散革命派的集中势力。

6 月 15 日，周恩来在《赤光》第十期上发表《太平洋上的新风云》的文章。他在分析了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之后，阐述了战争必将引起革命的观点，指出：“太平洋上的风云已密布了。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谋中国独立的战士，当兹风云起后，波涛涌起，切不要如欧洲大战时一般地逃避港中，希图幸免。”文章号召，革命者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做弄潮儿！“起！起！起！勇敢的国民革命之战士，请从今日预备起！”

从 2 月 1 日到 6 月 15 日，在《赤光》第一期至第十期上，周恩来共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认识分析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比起他在《少年》上发表的文章，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大大跨前了一步。

鸿雁传深情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 年春，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员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取“觉悟社邮箱”之意，定名为《觉邮》。那一年的 4 月 6 日出版第一期，上面发表了周恩来致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在《德法问题与革命》文章中，周恩来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苏维埃俄国，他痛斥了当时英、法等国工党、社会党的领导人叛变劳动阶级的可耻行为。他写道：“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各国劳动阶级如肯一致起来革命，赤军必可西出南下为援。所可惜的，现时英法的劳动界中有许多叛变劳动阶级的工党、社会党领袖，欺骗着工人，阻挠着革命。以致第三国际前敌一致的号召，到现今还未见效。”他引证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卢森堡所说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一语，认为这是“见到之语”。在 4 月 15 日出版的《觉邮》第二期上，又发表了周恩来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觉悟社社员谌小岑为此写了编者按：“伍这封信同下一封信是去年三月写的，两星期前才得收到。伍君到德后，对于主义的宣传，甚为尽力，除组织旅欧东方少年 C.P.外，又出版《少年》半月刊，成绩很好。”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周恩来又一次表述了他对革命领袖列宁大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敬重之情，他写道：“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共产党的步骤已变，连列宁自己也承认的。老实说，俄罗斯要没列宁、托洛斯基（现译：托洛茨基）、金诺维夫（现译：季诺维也夫）等几个人， 1917 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

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感情交流中，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在五四运动中结成的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的发展，使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 1904 年 2 月 4 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1913 年至 1920 年在北京、天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她和周恩来相识是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他们都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又一同创立了觉悟社。邓颖超在运动中表现得那样热情、勇敢、坚韧不拔，在生活中又那样淳朴、端庄、待人之诚，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周恩来的智慧、坚定和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也深深地打动了邓颖超的心。

三十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女朋友，那是个美丽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①]

从这时起，他和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里，他们相亲相爱，风雨同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永远传诵的佳话。

[①] 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的谈话记录，1956 年。

奉命回国

1924 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7 月 13 日至 15 日旅欧共青团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由林蔚担任书记，20 日，新选出的执委会委任即将奉命回国的周恩来、刘伯庄为其代表，向国内团中央报告工作，并代表旅欧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这次选送回国的干部，大多是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他们中有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博钟等；由于国内车争的迫切需要，周恩来没有去莫斯科，他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于 7 月下旬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在周恩来的身上，带着一份旅欧共青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生活了将近四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再见了，美丽的法兰西！四年前，他来到这里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和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今天，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

现在，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是历史赋予他的艰巨繁重的伟大使命！

八 黄埔军校

归国之初

1924 年 9 月，在秋天的骄阳下，周恩来踏上了阔别四年之久的祖国土地。他先到香港，9 月初乘佛山号轮船到达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阮啸仙、彭湃到长堤码头迎接，把他们迎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此时的广州，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高高的棕榈树下，火红的木棉花前，经常可以看到红色的革命标语牌和高呼革命口号行进的游行群众。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为事实上的革命政府。各地的革命青年从全国纷纷涌向广州。中共党员彭湃等人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革命骨干。工农运动如星火燎原，蓬蓬勃勃向前发展，这一切，使初到广州的人感受到浓郁的革命气氛。

然而，在火红的革命大潮中潜伏着一股危险的暗流，这就是蠢蠢欲动的商团武装问题，周恩来一到广州，就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觉察到这一点。商团是民国初年因地方混乱、当局允许商人置械自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广州有十个商团四千人，连同后备力量约达六千人，其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商团阴谋暴动，企图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年 8 月下旬，商团从香港等地偷运大批军火入穗，被广东革命政府查获，孙中山电令将其全部扣留。商团立即宣布罢市，英国总领事也声言，如果广东政府进攻商团，他们便要炮击广州。而这时，孙中山所能指挥的主力部队已开往粤北，分路向江西、湖南推进，进行反对当时统治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的北伐战争。广州城内的革命武装力量薄弱。在短短的时间内，形势已变得异常险恶。国民党内部不少人主张退还商团军火，企图与商团实行和缓与妥协。

在这种形势下，刚刚到达广州的周恩来，9 月 7 日写作了《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强调对于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不能有丝毫的妥协。他认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誓不两立，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和平妥协的方法，不能谋中国民族解放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御用人（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等）。这是‘九七’纪念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义。”[①]

10 月 10 日，在中共两广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下，广州人民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和警告反动商团大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鉴于广州的严峻形势，我们将“双十节”改为“双十警告节”，来警告一切破坏革命的反动派。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

[①]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 页。

我们只要下定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他在讲演结束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来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作示威运动！

下午三时，参加大会的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的时候，遭到商团的武装拦阻，商团向队伍射击，当场打死十二人，打伤十一人，有一百五十多人被商团抓走。商团还到处张贴布告，公然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广州主政。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羊城。

“双十”惨案发生后，共产党人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革命军人及广大工农群众，强烈要求孙中山采取措施镇压商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因为广州既为反革命势力所笼罩，号称革命的政府若再希图妥协苟安下去，不但所有的设施将益较从前为反动，国民革命亦将在广东完全破产，工农阶级的解放运动更会被摧残到底”[①]。远在广东北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在工农群众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指挥平叛，他亲自担任会长，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命令广东省长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同时，令调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勘乱。周恩来、杨匏安等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10 月 15 日，从粤北回师的北代军和黄埔学生军把商团麇集的西关区团团包围起来，经过几小时的战斗，终于把商团的叛乱活动全部镇压下去。

平息商团叛乱，解除了广东革命政府的一个“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军阀、右派势力，使革命策源地得到巩固。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的危机仍然是严重的。10 月 30 日，他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广东政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阀挟持，向帝国主义英吉利、洋行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并且时时有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事实出现。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从广东政治现象中，周恩来得出如下结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而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我们希望明达而革命的国民党人都要认定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周恩来认为，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免除不革命的耻辱和妥协的色彩，实行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广东政府从军阀挟持中解放出来。

19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两个区委。作为这样一个广泛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更注意从全局上分析国内政治形势，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11 月 8 日，他撰写《中国底政治现状》的文章，对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和演变趋向作了透彻的分析。他写道：“中国底政治现状，是处在一个

[①] 周恩来：《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向导》第 92 期，1922 年 11 月 19 日。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底共同宰割局面之下，一时是不会变更的。”他认为，革命势力“薄弱得很”的原因是国民党“不知向群众中间努力宣传，取得群众信用”，而当群众运动发生时，他们又“多是责备群众”，“袖手旁观”，他们“不知要为群众利害奋斗底党，才能取得群众信用，才能使群众相从底重要原则”。周恩来根据当时中国政治状况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欧洲需要的口号是，“变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在中国需要的口号是，“变国内战争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策略思想，表现出周恩来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出发制定革命方针的独创精神，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共有三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周恩来领导广东区委主要做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项是支持孙中山北上。这年10月下旬，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北洋政府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此后，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而又互相猜忌和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认为“北京发生的一切实质上并无特别意义”，孙中山没有必要去自投陷阱。而周恩来主持的广东区委则从全国革命形势出发，认为孙中山北上可以将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赞成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扩大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粤北上。广东区委做的第二项工作，是在11月初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由徐成章、周士第担任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赵自选为军事教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他们都是中共党员。铁甲车队下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由广东区委决定。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加入铁甲车队，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后来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孙中山离粤北上后，留守广东的代帅兼省长胡汉民，借着民选广州市长之机，营私舞弊，欲将其堂弟胡毅生推上市长宝座。国民党右派伍朝枢、谢英伯等人也为争夺市长之席明争暗斗。在政府公布的市选条件中，公然将广州市郊二十多万农民列为“在外之民”，剥夺其选举权。市长选举采取复选制。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郊区农民举行请愿游行，工界前往司法机关控告选举委员会的舞弊行为，广东民族解放协会发表宣言，强烈要求：“市选要加入农民；反对包办；市民要直接选举；反对收买；主张自由投票。”周恩来领导下的广东区委因势利导，积极领导了争民权、反舞弊的斗争。他先后撰写《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和《中山北上后之广东》，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北上后，“群起攘夺广东的权利地位”的卑鄙行为，对胡汉民等人操纵广州市长选举，将市郊农民排斥在外的做法提出质问，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固国民党宣言所郑重承认者也。”目前政府作法与孙中山“市政还诸市民的主张愈趋愈远”，实力“违党义破坏民治也”。他指出，工农阶级应通过这次广州市选觉悟起来。要认识到，革命未成功，一切民选自治必皆为不革命之人假借而去。革命之国民党中确有一大部分不革命，违党义而做官发财人物。“现今之党政府既建基于此等做官发财之党员基础上，其于革命运动之扩大，工农利益之拥护，漠视乃属必然之势。吾革命之工农阶级乎，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

当时正在天津的孙中山得知广州市选中出现的腐败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电命廖仲恺等人查办。胡汉民被迫暂时中止市长复选活动。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4 年 11 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亲自迎接他到校。在那之前，他曾兼任该校的政治教官，给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

黄埔军官学校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于 1924 年 6 月创办的。他亲任学校的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在 6 月 16 日举行的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发表演讲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

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现在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六百四十五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五十多人，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弟、蔡升熙、宣侠父等都是黄埔一期学生。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对二十六岁的周恩来说来，是一项繁重而陌生的工作。但他一到任，立刻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才能，开创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崭新局面。

他首先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在他主持下，制订了《政治教育大纲》，不仅规定军校政治课程与军事课程并重，还规定进行有关“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等内容的正式考试。这样就为军校政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了搞好政治教育，周恩来先后请萧楚女、张秋人等担任军校政治教官，还请毛泽东、张太雷、苏兆征等人来校作专题报告。

周恩来还直接领导着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他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指导建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蒋先云为负责人，出版机关刊物《中国军人》，其会员遍布广州各军校，发展到两千多人。

经过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常轨道，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①]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表面上假装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骨子里却极端仇视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他在军校里安插亲信，结党营私，企图把军校变成他培植个人势力的场所。为了排斥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他指使王柏龄、何应钦等人在 1925 年初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王柏龄当时任军校教授部主任，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号称是蒋介石的“第一只手”。

[①] 王逸常：《周恩来与军校政治部》，《黄埔军校史料》，第 181 页。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经常故意挑起事端，向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发难。有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公然纠集了一伙人，无理殴打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全校师生的极大义愤，纷纷要求惩办凶手。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下令将林振雄撤职查办。

王柏龄对周恩来的决定又气又恼，他依仗蒋介石的势力，派人监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为了打击王柏龄一伙的反动气焰，周恩来指示蒋先云等人，把王柏龄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罪行一条条详细开列出来，在全校公布。当时，反对国共合作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情，连国民党左派都不能容忍。因此，告示一出，全校师生同声谴责。王柏龄气急败坏地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虽然心急如火，但慑于众怒难犯，也无可奈何，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第一只手”被周恩来砍掉。通过这一事件，使王柏龄威信扫地，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组织也元气大伤，再也不敢为所欲为地胡闹了。

出席中共四大

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留法组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了一年多、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九十四人。大会重点讨论了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高潮的问题。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总结国共合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会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见到了中共北方区代表高君宇。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是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周恩来与他“欢谈甚深”，向他了解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形势，并委托他给远在天津的邓颖超带了信。

就在周恩来赴沪参加中共四大期间,广东革命政府于 1 月 15 日发布了东征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的命令。所以，中共四大一结束，周恩来就星夜兼程赶回广州，他将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同校长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亲率黄埔军校校军，作为右翼军的一部，参加东征。一场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在等待着他。

第一次东征

孙中山北上后，病倒在津京，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这时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矛盾四起，陷于混乱。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的怂恿和支持下，盘踞在东江流域的陈炯明乘机反扑，他自称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犯广州。广东革命政府在 1925 年 1 月 15 日发表《东征宣言》，决定讨伐陈炯明。

周恩来赶回广州后，立即投入了东征的准备工作。他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需要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因此，他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由陈延年接任广东区委书记。参加东征的黄埔军校校军由教导一团、二团和学生总队组成，共约三千人。1 月 31 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东征誓师典礼上作了政治动员，提出不蛮横无理，不强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保障人民等要求。政治部还组建了战时宣传队随同部队出发，

向群众宣传东征的意义，发动群众协助运输，充任向导和刺探敌情。2 月 3 日，校军出发，参加右翼军的军事行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黄埔校军同粤军第二师和第七旅组成的左翼军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直捣潮汕，取得了赫赫战功。2 月 15 日，攻克淡水， 27 日攻占海丰，3 月 6 日扫平潮州、汕头之敌。3 月 13 日，黄埔校军教导一团千余人在棉湖与五倍于我的敌林虎部遭遇激战。周恩来亲赴前线，激励士气，待到援兵赶到，将林虎部主力击溃，取得了关系到东征战争胜败全局的棉湖战役的胜利。此后，东征军乘胜追击， 18 日取五华， 20 日克兴宁， 22 日收复梅县。陈炯明残军被迫退入江西、福建境内。陈炯明只身逃往香港。4 月初，第一次东征战事结束。

东征的胜利，使黄埔校军英勇善战的威名震惊远近。当时的报刊曾生动地记载：“此次联军进攻，初出茅庐之黄埔学生教导团，尤出类拔革，每战必克，每攻必取。”“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篷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①]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后来，毛泽东曾对黄埔校军的战绩和其成功的政治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②]周恩来在东征途中，曾在东莞发表演讲，阐述了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区别，概括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他讲道：“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故特设立党的军官学校，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此党立军官学校设立之目的，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在谈到东征目的时，他说，“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周恩来还在东征回师途中所作的《军队中政治工作》讲演中，系统地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同军阀武装的根本区别。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但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

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周恩来对军事工作由陌生到熟悉，提出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表现出一种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干练的领导才能，由此在国共两党内，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师生中深受敬重。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称赞他为“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的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缔造一支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积累了宝贵经验。

[①] 载 1925 年 3 月 27 日《商报》。

[②]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351 页。

正当军民欢庆东征胜利之际，驻守广州地区的滇、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与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在取得英帝国主义提供的军事援助后，趁孙中山病逝北京，革命军远征潮汕之机，率部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部分地区以及广州电报局和火车站。广东革命政权又一次陷入危机。5 月 13 日，廖仲恺从广州赶到汕头，同东征军共商讨伐杨、刘之计，决定放弃潮梅，于 20 日回师广州。周恩来等率领由黄埔教导一、二团组成的党军第一旅，随军回师。

6 月 12 日，东征军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向叛军发起猛攻。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指示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也先后从北江、西江、河南三面发动进攻。广州人民素来对杨、刘军队恨之入骨，纷纷起来破坏交通，断绝水电供应。市郊农民也加入了战斗，他们为革命军运送粮食、武器，切断敌人后路，收缴敌人枪械。经过一昼夜激战，叛军全面崩溃，杨希闵只身逃往沙面租界。15 日，杨、刘所部滇、桂军在瘦狗岭一带被全歼。一场反革命叛乱就这样被迅速平息，多年的心腹之患被干净利索地除去了。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洪流中

正当东征军队从东江回师的过程中，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国警察在上海南京路上对示威群众用排枪射击，打死十三人，伤者不计其数。为了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援上海工人的同盟大罢工，香港十多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 6 月 19 日开始举行省港大罢工。港英当局宣布戒严，对支持香港工人正义斗争的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这就激起了广州、香港工人的无比愤怒，6 月 23 日，广州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七八万人，在广州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廖仲恺主持大会，提出这场斗争“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唯一目的”，号召人民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周恩来率党军两个营和黄埔学生军一个营，共约两千人去参加。上午十一时，示威游行开始，“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报仇！”的口号声响彻广州市区。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国军警突然用步枪向游行群众射击，接着以机枪扫射，当场打死五十二人，打伤一百七十多人，其中，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二十三人，伤五十三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当时，在周恩来身旁同他并排前进的两个人都中弹身亡，他却幸免于难，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险情。

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香港十三万工人撤回广州，罢工总人数达到二十五万人。由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汕头，西至北海，婉蜒几千里的广东海岸，使香港变成了一座“死港”。周恩来选派铁甲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担任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并派陈赓等人去担任工人纠察队的教练或干部，加强对工人纠察队的领导。

7 月 1 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启发黄埔学生的革命觉悟。他说：“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到了那时，才能以机关枪、大炮报沙基惨案的仇，因为中国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不知道近代的潮流，这完全希望各位作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7 月 31 日，他在省港罢工

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他说：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联合起来，以打倒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他总结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经验，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的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工农兵联合的势力，已能打倒军阀，犹如摧枯拉朽，现在更要进一步而打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周恩来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尤其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对军队的领导作用，“我们要使他不为军阀所利用，不为帝国主义作走狗，而成为革命的军人。”在政治报告的最后，他激昂地号召：“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反抗英国帝国主义，是工人作先锋，以铲除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其次就是要兵士预备武装起来与英帝国主义决一雌雄。休戚相关，守望相助，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给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大会一致拥护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作出了工人到农民、士兵、群众中去，推动工农兵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的决议。

与邓颖超结婚

在周恩来积极参加领导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反帝斗争的时候,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在天津时她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调到广东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周恩来同她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他们都非常高兴。8 月 8 日，他们在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举行了俭朴的婚礼。婚后，他们搬到文德东路文德楼居住。这是一幢三层楼房，里面住着几十户人家。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西边的一间约十平方的房间里，他们对面住的是李富春和蔡畅夫妇。

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结婚后的生活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与当时在广州的某些国民党官员们的奢华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周恩来夫妇住的房间，陈设十分简朴，靠东墙窗下摆着一张写字台，几张靠背椅；一只四层的藤书架上放满了周恩来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和国内新近出版的报刊。客厅设在楼下，屋子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台，几张藤椅和圆木凳子。周恩来就在这里会见客人或召开会议。一位担任过黄埔军校交通员的同志在回忆他到周恩来家送信时的情形时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工农群众非常热情，对待我们这些交通员，也像兄弟一般。”

那时，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经常一早就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赶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向干部讲课、作报告。四十多年后，邓颖超到广州时又一次来到当年的中共广东区委旧址，深情地回忆起那一段不平常的难忘岁月，她说：“我和恩来每周都有几个晚上来这里开会，那时，毛泽东也经常到这里指导工作，研究问题。有时一直开到十一二点。”

参加“廖案检察委员会”

1925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将孙中山陆海军大无

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廖仲恺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兼财政部长。廖仲恺不屈不挠地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推行各种革命措施，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极端仇视，他们经过密谋，于 8 月 20 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廖仲恺遇刺案”，枪杀了廖仲恺。

这一天上午九时许，廖仲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刚刚登上门前的台阶，就遭到预伏的几名刺客的枪击，身中四弹，俱中要害，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

周恩来得知廖仲恺遇刺的消息，立即从家中赶往医院探望，向廖仲恺的家人表示深切的慰问。他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为搜捕杀人凶犯紧张工作，两天两夜都没有回家。

8 月 24 日，周恩来同蒋介石等人开会商定，当晚十一时实行戒严，加紧搜捕凶手。会后，周恩来赶往黄埔码头，迎接苏联政府派来的“国际工人沙基惨案调查团”。晚上九时许，周恩来与苏联客人匆匆话别，赶回司令部，参加指挥缉凶行动。而蒋介石等人突然改变计划，将戒严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并更改了口令。他们没有把这一变化通知周恩来。当周恩来的汽车到达司令部附近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周恩来的护兵按原定口令作了回答，随即遭到警卫的开枪射击。司机和护兵弹中要害，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满了他的全身。车一停，他立刻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发现来者是周恩来，急忙停止射击。由于缉拿廖案凶犯任务在身，周恩来在对两位牺牲者做出妥善安排之后，立刻又奔赴各个搜查点检查部队执行任务的情况。深夜，当搜捕结束他回到家中时，灰色的西装上血迹斑斑，邓颖超以为他可能是在缉捕凶手时沾上的，就没有问，周恩来也没有细说，这次遇险，是周恩来一生中无数次出生入死的经历中的一次。蒋介石等人为什么不将变更戒严时间和口令的情况通知周恩来？是有意还是无意？历史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周恩来对廖仲恺的遇害，非常悲痛，他出席了黄埔军校举行的追悼大会，并同何应钦联名撰写祭文，内说：“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行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怨，不避险艰，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工农阶级，革命先锋。帝国主义，蠹国正凶。唯公知此，团结工农”[①]。他还撰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等文章，沉痛悼念廖仲恺和沙基惨案死难烈士，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为。他指出，廖先生是我们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廖先生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这次杀害廖先生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周恩来号召黄埔师生，要把悼念廖党代表和沙基惨案死难烈士的悲痛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他指出，沙基死难之黄埔同志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廖党代表之惨死，更是为反帝国主义而死。党军党校的同志们！哭他们的热泪，要变成反帝国主义的怒潮。记着，这两个惨死的纪念日！记着，这两桩惨死的事实！我们从今后不必问我们命在何时，只问我们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9 页。

死在何处。为反帝国主义而死，方是沙基死难者的真同志，方是廖党代表的真门徒。“我们每一人每一滴的鲜血都要立志泼在帝国主义的欢乐宴中，积成我们最后胜利的红酒，备我们后继的战士痛饮黄龙。”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紧张工作，廖案检察委员会查明，这次暗杀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他们在胡汉民家开了好几次“倒廖会议”，参加的有吴铁城、邹鲁、林直勉等，最后决定采用暗杀手段，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逮捕了胡清瑞、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等人潜逃香港。这些措施给了国民党右派以沉重的打击。同时，蒋介石利用群众的愤怒情绪，借机向与此案有关的胡汉民和许崇智施加压力，迫使胡汉民出走国外，许崇智亡命上海，从而使广东政府的军事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蒋介石手中。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在沙基惨案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去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右派，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

调离黄埔

1925 年 8 月 25 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9 月，周恩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同时免去了他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由邵力子接任，共产党员鲁易任副主任。不久，中共中央调派刚从苏联回国的熊雄、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时，叮嘱鲁易、熊雄、聂荣臻等人，要在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 1926 年初，恽代英也调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这样，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仍由共产党人来负责，并继续受担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这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的鼎盛时期，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创造性地开展军校政治工作，奠定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良好基础，为

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邓颖超后来说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国共合作的实现，带来了什么？我们这些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它带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它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南方各省的蓬勃高涨。它带来了新的革命武装的创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的黄埔建军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它还带来了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规模的广泛传播。那时候，到处热气腾腾，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①]

[①] 邓颖超在纪念国民党“一大”60 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 1984 年 1 月 17

周恩来告别了他呕心沥血为之工作了近一年的黄埔军校，怀着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强烈愿望，走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岗位，开始了他的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涯。

日《人民日报》。

九 在第一军

第二次东征

周恩来刚刚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部队就接到了进行第二次东征的命令。就在第一次东征取得最初胜利，东征军主力奉命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时，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支持下，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于 9 月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盘踞在广东南部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也予以配合，形成了对广州的犄角夹击之势，对革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为了彻底消灭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 年 9 月 21 日，国民政府做出了发动第二次东征的决定。东征军设总指挥部，下辖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第四军的一部分，分为三个纵队。由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李济深、程潜为第一、二、三纵队队长。 10 月 6 日，东征军从广州出发，向东推进。

为了宣传东征的意义，鼓舞国民革命军的斗志，周恩来主持下的总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发布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规定了解释东征意义，尊重士兵，努力提高作战士气和改善军民关系等具体宣传内容。总政治部还组织了由一百六十三人组成的政治宣传队，广泛深入地开展对国民革命军、工农群众和敌军俘虏的政治宣传工作。东征军到达东莞石龙后， 10 月 8 日，周恩来在各界人士欢迎东征军大会上讲了话，热情宣传革命政府的各项政策，号召当地人民协助东征军消灭反动军阀陈炯明的势力。他说：“我们这次东征，完全是为人民幸福而来，人民应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人早日打倒。”

10 月 13、 14 日，周恩来参与指挥了第二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惠州战役。惠州城三面环水，一面是险要的飞鹅岭，城墙坚固，易守不易攻，号称“东江天险”。历史上留下这样的诗句：“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水无忧。”惠州守敌是陈炯明的一个王牌师，他们做了充分准备，凭险固守。负责进攻惠州的是第一军。战斗开始时，由于地势险要，敌军防守严密，进攻遇到很大困难。这时蒋介石在作战会议上提出放弃攻打惠州的计划，周恩来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攻下惠州在军事上、政治上影响很大，放弃攻打惠州对战争的全局不利，只要改变攻城方案，是可以打下惠州的。”他又说：“瓮中捉鳖，鳖会咬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鳖爬出来，捉鳖较为容易。”周恩来提议调动广州的飞机到惠州侦察敌军指挥部，为炮兵指引轰炸目标。这一方案为作战会议所接受。10 月 13 日，北征军向惠州守敌发起总攻，周恩来亲临飞鹅岭前线指挥。在战斗关键时刻，他令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攀登城墙攻城。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在 14 日傍晚终于攻克惠州，全歼了陈炯明部最精锐的惠州守敌。

在惠州战役中，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官兵英勇牺牲。10 月 16 日，在追悼第一军阵亡将士的大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讲，勉励革命军人为实现孙中山统一广东、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的遗志而继续努力，他说：“第一军的力量，已有这样的成绩，假使能够把各军都化成和第一军一样，那末广东统一就在目前了，进一步就可统一中国，我们不是三师军队

就够的，要把全中国的军队都要化为革命军。”“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令敌胆寒，但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还很多。我们的任务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取得独立，我们应该继续向前努力，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革命军人。”[①]

惠州战役后，东征军乘胜前进。 11 月初，连克陆丰、河婆，直抵潮汕，重奠东江。 11 月 8 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入闽追击陈炯明残部，其后方工作统由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14 日，东征军在福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盘踞东江多年，已成广东革命政府心腹之患的陈炯明叛军，被彻底解决。接着，在李济深指挥下，第四军从东江前线回师南进，参加围剿邓本殷部的战斗，于 12 月下旬攻克雷州半岛，次年 2 月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胜利完成。

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如何巩固革命成果，治理被陈炯明等军阀势力长期蹂躏的东江地区，立即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个任务。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1925 年 11 月 21 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二十五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由于当时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周恩来没有立刻就职，而是继续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处理地方行政事务，进行民主改革。在此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着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发动工农商学各界参加民主改革和革命运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向旧势力和官场上的腐败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严厉处置违法乱纪者。

到汕头后，他委派国民党左派陈卓凡等担任揭阳等县县长，还向东江各县派出检察官，改组和加强了检察工作。同时，他还以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身份向各县派出特派员，负责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并领导当地的农会、工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这些特派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周恩来指示他们：如果县长是左派，就同他合作；是右派，就各干各的。

11 月至 12 月间，周恩来下令撤销勾结工贼携款潜逃的汕头市代理市长陈个民，以及饶平、澄海、普宁、潮阳、惠来等县的反动不法县长的职务。委任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到新政权中任职。他还雷厉风行地处置了一批案件：制裁毒害东江人民的鸦片商，查办陈有利、陈坚夫贩卖烟土案；将侵占公地营建私宅的五华县税务局长张谷山撤职查办；取缔各县劣绅把持的县议会；改组由工贼控制的人力车工会和小贩工会；等等。

1926 年 1 月，周恩来派国民党左派李春涛接管了汕头的《平报》，把它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并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毛泽东曾以“子任”笔名，在这个副刊上发表题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的文章。

所有这些有力的革命措施，对于稳定东江地区的政治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深得东江人民的拥护和欢迎，为巩固革命政权和以后的北伐战争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表现出周恩来在组织政府、管理行政方面的卓越才干。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军事行动的结束，东征军总指挥部撤销，东征军总政治部改组为行政公署。1926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正式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①] 载 1925 年 10 月 23 日《广州民国日报》。

委员。也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他挑起了东江地方革命政权建设和第一军政治工作的两副重担。2 月 2 日，周恩来发出了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通电，提出了他的施政方针：“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梅革命之基础。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旧，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①]2 月 11 日，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说：“观革命基础已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未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俾建设计划均得实施。”[①]

此时的周恩来，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东江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各项事业之中。他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题词：“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须要打破这两大障碍物。”作为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体察民情，总揽全局，一扫旧衙门那种“徒恃一纸空文”的官僚习气，代之以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2 月 22 日，他主持召开了历时九天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同各县县长、各县群众团体代表共商东江建设和发展的大计，综合解决地方行政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周恩来为这次会议拟定了如下主要议题：市长对于市政交通计划、工程布施、财政统计、户口调查、警政改良；县长对于县政府财政统计、户口调查、生产概额、行政计划、警察扩充、土地登记、农工生活、造林计划；教育局长对于教育方针、经费确定、学龄儿童调查、改良私塾；农工会对于农工状况的调查、生活的改良、新知识的灌输；商会对于商务的发展和商品出入口的调查、商业知识的灌输、外国奢侈品入口增减额的调查；妇女协会对于妇女入学调查、生活改良等。这些议题的提出，显示了周恩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已经迅速、全面地熟悉了地方行政事务，并且对管理和协调这些事务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方法。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其方式是：“先把理论找出，再将历来的政治来证明事实，做政治报告的前提”。他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很显明是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在里面捣鬼，压迫至于极点，“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作弊骗人。中国这几年政治的腐败，都是这班官僚政客在里面播弄。”他又指出，广东是国民运动最发展的地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是革命政府能够实现其主张的重要力量。他提出要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向外发展，同时亦整顿内部，并对工商联合，进行封锁香港，以及注意政治。”[①]会议对周恩来的政治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结合会议议题，提出和通过了关于商务、财政、妇女、教育及组织人民自卫军等议案九十三件。

这次会议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和汕头、海丰工农会组织联合举办了工农运动人员讲习所，为东江的工农运动培养骨干。各级基层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扎实稳妥地进行，海陆丰、潮汕等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地方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等武装组织，大革命的洪流给被陈炯明一伙统治多年的东江地区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

[①] 载 1926 年 2 月 10 月《广州民国日报》。

[①] 载 1926 年 2 月 12 日《广州民国日报》特刊。

[①] 载 1926 年 3 月 3 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6 年 3 月 12 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一周年。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出版了《党刊》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号。作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在上面发表了一篇充满怀念之情的纪念文章，表达了他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和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他写道：

“伟大的领袖之逝世周年，引起了被压迫人类心弦上悲哀的颤动，深刻的回忆。”

“日夜长流，时代使总理不能再与我们相见，不能再亲临战线指挥我们五十万党员和帝国主义与军阀作剧烈的斗争。不能，不能，已延长了整整一个年头，更将延长至永无尽期。”

“但是，颤动终是一刹那，悲哀刻在心弦上和着那伟大的革命历史之回忆，兴奋终是他的最后产物。”

“因此，悲切的怀想，热情的索回，是纪念总理特刊启幕时的哀音。历史的复习，革命的回忆，主义学说的叙述是特刊的正文，是特刊的物质基础。有了哀音的导演，有了基础的影响，最后便会烘托出原来的刊旨——感动而兴奋，兴奋而努力，努力于国民革命。”

“从纪念到革命，是这个特刊唯一的使命，付托与一切被压迫人类中的读者。愿读者齐呼：为纪念总理兴奋起革命之努力！”

周恩来还和第一军将领何应钦、钱大钧等人一起发表通电，主张遵奉孙中山遗嘱召开国民会议。

就在周恩来雄心勃勃地在东江地区“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为“立潮梅革命之基础”努力工作之时，3 月 16 日，广州国民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出的同时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和第一军副党代表“事繁责重，不能兼顾”的请求，宣布免去他的东江行政委员的职务。同时，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要周恩来立即回广州，这样，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交待工作，便在第二天早上乘船离开汕头匆匆赶回广州。他没有料到，此时号称“总理的真正信徒”的蒋介石正在酝酿着一个极其险恶的全面践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政治阴谋。

中山舰事件前后

周恩来回到广州后，发现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联想到蒋介石在黄埔学校和第二次东征中的反共言行，周恩来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兆头，他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当时给苏联顾问兼当翻译的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而苏联顾问季山嘉对此事未予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戒备措施。3 月 20 日，经过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以夺取军权，排斥、打击共产党人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终于发生了。

3 月 18 日，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收到一封发自黄埔学校驻省办事处的公函，内称：“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为祷。”当时由于另一艘军舰正在检修，李之龙就只给中山舰下达了升火起锚的命令。3 月 19 日早晨 6 时，中山舰驶达黄埔，向黄埔军校报到候用。这时，蒋介石突然声称并无调舰命令。他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大肆散布谣言，说是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企图劫走蒋介石，开往海参崴，等等。晚上 12 时，蒋介石下令黄埔戒严。他派孙

文主义学会分子，把李之龙从床上拖起来，反绑双手，蒙上眼睛，嘴里塞进两块毛巾，丢上汽车，向远处驶去。蒋介石还下令解除中山舰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强行解除省港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逮捕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扣押共产党员的广东造币厂，找到蒋介石，向他提出质问。蒋介石说：“李之龙及中山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现得早，李之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一军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周恩来当场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并对他破坏国共合作的卑鄙行为提出了抗议。蒋介石把周恩来软禁了一天。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实行反共的一个重要步骤。早在 1925 年 11 月东征途中，他就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开会，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予以拒绝。后来蒋介石同周恩来个别谈话时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与陈延年等人交换了对蒋介石的看法，并商定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成立国共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着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在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等了好久，中共中央却来电不同意，从而丧失了一个遏制蒋介石势力发展的良机。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李富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在李富春家一起商讨对策。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而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其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基于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反击。周恩来找到苏联顾问季山嘉，季山嘉表示不同意他们的主张，说不能与蒋介石破裂。3 月 29 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就中山舰事件向广东区委发出指令，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向蒋介石退让。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采取退让政策，4 月上旬，蒋介石进一步提出：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要完全的国民党员才能担任；第一军的党代表统统调回再训练。这样，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中共广东区委针对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发表了《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造谣诬蔑，影响到了广东局势，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得到解放，为此积极参加反帝国主

义反军阀的运动。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是努力于工农群众组织的，工农的组织是国民政府的保障，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共产党决不会因敌人的谣言而放弃革命工作。“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的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革命政府。”

5 月初，周恩来担任了由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的主任，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多是中山舰事件后被迫撤离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周恩来先后向学员们作了《反吴（佩孚）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演讲，帮助学员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方法，使学员们坚定了克服困难的信心。这个训练班结业后，周恩来将大部分学员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从而为党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

十 广东军委

准备北伐战争

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后，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广东军委设在广州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干部很少，只有聂荣臻和黄锦辉。军委机关机密性比较大，只有比较高级的干部才到那里同他们直接联系，一般人都到文明路的广东区委联系工作。

当时，两广已经统一，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为北伐战争作好准备便成为广东军委的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和发动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它继承了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志，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北伐战争的直接任务是，粉碎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夺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北伐军的大本营。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各军中的党的工作，历来是由中共广东军委直接领导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各项准备工作的重担，不能不落在周恩来所领导的广东军委的肩上。

广东军委加强了对军队中党的工作的领导，当时由它直接领导的有：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七个单位中的党的组织。周恩来每个星期　　都要召集这些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二次会议，听取汇报，部署工作。聂荣臻、黄锦辉等同这些单位的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北伐战争作准备。

作为中共广东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还帮助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制订北伐的军事计划，并应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出席北伐军战时工作会议，同邓演达共商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周恩来推荐共产党员朱代杰担任了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处长。

为了使北伐军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作了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讲演。他在讲演中系统地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指出，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都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基础上，是由封建制度下经济不安的社会里崩溃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经济不安的民众，都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不可让其走入军阀军队中。“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他具体地论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范围、军人素质的提高、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设计等问题，并且指出：“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和训练。能如是，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才能使军队去过的地方，人民不发生

反革命的举动，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1]当北伐军准备出发的时候，周恩来作的这个系统的讲演，对北伐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对政治工作人员明确工作的要求、范围和方法，是大有帮助的。

北伐开始之后

1926 年 5 月初，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军队，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等都是共产党员。独立团出师北伐，经过广州时，周恩来在司后街叶家词叶挺寓所向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讲话。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北伐的有利条件，介绍湖南、湖北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情况，唐生智部的情况，广东各军的情况，说明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意义和任务。并且提出几点要求：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二是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是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与友军团结；四是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五是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六是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最后，他用“饮马长江”这四个字来鼓励大家。临走时，同每个同志一一握手，亲切而又充满信心他说：“武汉见面。”

独立团党支部决定把周恩来的指示在全团官兵中进行普遍的传达和讨论，作为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行军中休息和到达宿营地后的时间进行讨论。这个讨论，极大地鼓舞了全团的战斗士气，从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独立团长驱直入，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声誉。

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代誓师典礼，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各路大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奔赴前线，讨伐盘踞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和盘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

7 月 12 日至 18 日，周恩来赴上海参加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代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中山舰事件的经过。会议期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北伐中对蒋介石应采取何种方针，陈独秀等人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

北伐开始后，周恩来主持下的广东军委决定聂荣臻以军委特派员身份，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或报告给军委；并沟通军队党组织同各地党组织的关系。

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广东军委对其发出指示信说：“革命形势的发展可能很快，你们的战斗任务更加繁重了，要争取在独立团里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1]周恩来还派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许继慎等三十多个营、连、排干部到独立团工作。叶挺坚决执行军委指示，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很快招足了新兵，配备了干部，把特别大队和补充营建立起来。

---

[1] 王铁猛的笔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笔记簿》，1926 年，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1]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2 页。

张发奎后来对叶挺说：“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的。”[②]

广东军委在北伐军中开展的有效的政治工作，提高了北伐将士的革命意识，尤其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除此之外，广东军委还担负着收集各路北伐军作战情况的任务，并及时将这些情况整理出来，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告。在这些工作中，周恩来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同时，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制造分裂，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革命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反对革命的面目日益暴露，一方面，他加紧同帝国主义勾结，拥兵缓进，消极北伐，一方面竭力策划反共阴谋，扼杀工农运动。周恩来清醒地看到这一切。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蒋介石为了拉拢周恩来，曾表示准备委任他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战地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重要职务，被周恩来拒绝。

为了批驳国民党右派对于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诬蔑之词， 1926 年 12 月 10 日至 17 日，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接连发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三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广东及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工农运动、国共合作及人民武装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于澄清党内的种种模糊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制造的所谓“目前民众运动超过国民革命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的谬论，指出，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针对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周恩来写道：共产党员不管在反帝国主义的上海、省港罢工中，在东征、北伐的血战中，在北、中各部为办国民党而遭遇的囚杀中，在工农运动的牺牲中，他们总是最忠实站在前线。他们所流的血，总是洒向国民革命，无一点迟疑，无一点吝惜。一切工作，我们尚找不出非国民革命的证据。“我们要很坚确的认定，现时方是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很辽远。所以这时候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①]

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国民党右派所谓“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的滥言，指出，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它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斗争，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

[②]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2 页。

[①] 《人民周刊》第 34 期，1926 年 12 月 10 日。

“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分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接着，周恩来用事实来证明了这一点：五卅运动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曾联合一致地同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斗争。其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且革命势力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取得今日的发展。

周恩来明确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他写道：“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因此，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最后，他响亮地提出：“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①]

在《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一文中，周恩来分析了国民党改组以来广东的政治局势，指出：广东各种反动势力正在互相勾结，联成一气，同革命力量作斗争。为着巩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周恩来强调了民众武装的重要性，指出：“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队之组织亦为势所必需。”

在该文的最后，周恩来指出，巩固革命根据地，不能一味地靠妥协，而首先应当分清敌我。他写道：广东的政治斗争走上正轨，中国的国民革命根据地才能稳固。这不但广东的民主派的联合战线可以充分，半封建势力可以肃清，并且只有以这样的革命基础，才能影响民主革命势力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才能继续北伐，才能支持民族革命，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所以我们现时应当分清敌我。敌人方面：广东一切半封建势力——买办、大地主、逆党、土豪、民团、土匪、贪官污吏始终是民主革命的最大障碍”，并且他们后边还有个香港帝国主义。“我们民主派——国民党、省政府、工人、农人、小商人、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至C.P.和C.Y.都应该毫无迟疑地互相了解地努力联合这个民主战线，充实自己的力量，扫除革命的障碍。我们继续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②

周恩来在这些文章中表现出的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光明磊落的胸怀，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行为所采取的一味迁就退让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照。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由于种种原因，周恩来的这些正确主张当时没有为党中央所采纳。中国革命历史的后来发展，一再证明周恩来在这些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是富有远见和完全正确的。

1926年底，周恩来奉命调往上海中共中央工作。在一个初冬的早上，他告别已有身孕的邓颖超，登上北去的火车，离开了他工作了两年多的广州。

[①] 《人民周刊》第37期，1926年12月11日。

十一 上海起义

分析形势，总结经验

上海，这个拥有近百万产业工人的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对外通商口岸，当时正处在反动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帝国主义列国在这里设置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作为其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形成了“国中之国”。上海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1925 年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便从这里开始。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也设在上海。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准备迎接国民革命军，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在 1926 年 10 月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过于悬殊，以及准备不充分等原因，起义失败了。但是，反抗的烈火没有熄灭，工人群众在殊死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他们在准备着一场新的更大的起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2 月间，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调，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在中央组织部只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着手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由于周恩来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所以被调去负责这次起义的军事工作。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是由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的。1927 年 2 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先后占领了嘉兴、杭州。上海总工会于 19 日宣告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提出了“响应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 口号。几天内，罢工工人增加到三四十万。21 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许多工人群众徒手夺取军警的枪支，表现得异常勇敢。当时正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临时被派往南市区指挥那里的行动。正当第二次武装起义全面展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下令北伐军停止前进，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控制下的便衣队和商团也按兵不动，使得孙传芳集中力量，并在租界工部局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向起义工人发起猖狂的反扑，第二次起义又遭失败。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上海区委决定停止暴动。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复工命令和宣言，其中写道：“本会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特命令全体工友，于本月二十四日午后一时，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停止是紧密衔接的，中间没有间歇。2 月 23 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并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何松林、尹宽、彭述之、萧子章八人组成。同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后，又确定周恩来担任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为了领导好新的起义，周恩来认真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3 月 3 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他充

分肯定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意义，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人们懂得了很多，“应该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起义作准备。”同时，明确地指出了这次起义的两条主要教训：“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周恩来还和罗亦农、赵世炎等人一起分析当时的形势，批评了那种“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懂得民众政权的意义，只是专门等待北伐军到来”的错误观点，强调上海起义的性质“实为民众与北代军合作的问题，而不是民众欢迎北伐军的问题，如果是民众欢迎北伐军，上海必仍为一个反动的局面”。

当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本钱，可以把昔日的盟友一脚踢开，他把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视为实现他的野心的最大障碍，已经开始磨刀霍霍了。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等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而又自信地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积极地向一切反革命势力进攻，建立民众政权。绝不能把起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和蒋介石的身上。

除此之外，上海军事形势的变化也为新的起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原来盘踞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在北伐军的多次打击下已支撑不住，只得投靠统治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2 月底，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接替原来驻守上海的孙传芳系统的李宝章部。毕庶澄部只有三千多人，加上当地警察共五千人左右。毕部刚到上海，对环境不熟悉，防守上露出许多漏隙，加上北伐军逼近上海，军心严重不稳。这种形势，说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趋于成熟。中共上海区委及时发出了《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指出：工友们是上海市民争自由的先锋，上海市民要得到自由，非以暴力根本铲除残暴的孙传芳的政权，建立上海市民民主政权不可。呼吁工友们夺取武装，以武力回答武力，向新的斗争努力。

周密准备，把握时机

2 月 24 日上午，周恩来参加了上海区委各区书记联席会议，详细地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并在会上指出：“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下午，他同各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议上作军事工作的报告。他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情况，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三支，即工人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他还就军事准备工作提出五项具体意见：第一，建立领导机构；第二，加强队伍训练；第三，加强敌军工作；第四，做好武装准备；第五，做好情报工作。

到 1927 年 2 月底，上海总工会会员已发展到近二十九万人，工人纠察队队员已有五千余人，但其中有武装的仅一百五十人。周恩来把工人纠察队按地区划分，组成若干大队、中队和小队，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由特别军委统一指挥，分区行动。他还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过实际作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在闸北宝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班，由各区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参加，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讲课内容有，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经验，城市起义的战略和战术，以及学习射击、修理枪械和制造手榴弹等。训练班结束后，这些同志又用同样的办法，去训练各区和大厂的广大工人纠察队队员。周恩来还从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

黄埔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让他分管起义前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以后还担任部分军事指挥工作。侯镜如回忆说：“我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①]经过紧张的训练，有一千八百名纠察队员可以使用武器了。在武器准备方面，购买了二百五十支手枪，并从租界内秘密地偷运出来。据参加过这次起义的李强回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当时积极筹集武器，购买原料来制造炸药，并在僻静的墓地里进行爆炸试验。”

当时，上海商界发起组织保卫团，周恩来问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我们是不是要参加？”有的工人说：“我们参加保卫团？难道去保卫资本家？”周恩来爽朗地笑了，亲切地问大家：“我们现在缺什么？”工人说：“缺长枪。”周恩来说：“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各区工人纠察队有一百多人打进了保卫团，仅商务印书馆就有二十多个工人参加保卫团，占保卫团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参加保卫团的工人们，掌握了一批武器，白天作为保卫团员刻苦训练，晚上他们把枪拿回家去训练工人纠察队员，大大加快了军事训练的准备工作。后来起义爆发时，这些参加保卫团的工人们把枪带出来，成为攻打敌人据点的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

3 月中旬，北伐军沿沪杭线向上海推进。整个局势越来越紧迫。19 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形势，指出：驻守上海的敌军只剩下三千人，警察两千人，他们军心涣散，已无斗志，而上海市民的革命热情已达高潮，工人纠察队已受到初步训练。另据北伐前线的消息，“松江大战，宜兴确下”。根据这些情况，他果断地提出必须采取行动。他说：“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①]下午，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各区委、各产业总工会联席会议上下达预备动员令，并颁布《行动大纲》，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民选市政府。”当晚，起义领导机构作出“假定后天（21 日）一致动作”的决定，并通过了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制订的起义计划，包括行动时间、作战地区的划分、战斗步骤、纪律等等。起义地点分为闸北、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七个地区。闸北是起义的重点区，该区的北火车站、第五区警察署、商务印书馆等均是进攻的重点，各区工人纠察队在解决战斗后，均应驰援闸北。

第二天，上海罢工工人已达二十八万人。同日，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在傍晚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果断发动，亲自指挥

3 月 21 日清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区委书记紧急会议，区委书记罗亦

[①] 访问侯镜如谈话记录，1982 年 9 月 11 日。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5 页。

农在会上宣布说：“北伐军昨晚已抵龙华，上海工人今天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消灭军阀毕庶澄的军队，夺取上海！上海总工会已经准备好命令，全市八十万工人中午十二时举行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下午一时全市各区工人开始军事行动，转入武装起义。”他还宣布由周恩来担任这次起义的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会议一结束，周恩来、赵世炎等立即赶到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的起义总指挥部。据当时在场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黄逸峰回忆：“周恩来同志身穿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平凡朴素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周恩来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和赵世炎一道，一会儿伏在桌子上，对着上海市区地图，边指划边商量，一会儿和外面进来的联络员交谈，听取汇报，指示行动。

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中午十二时，上海各工厂、商店、轮船、码头、机关、手工业工场的工人，以及人力车工人、清洁工人，共计八十余万人，一律罢工。顿时，上海变成了一座瘫痪的城市，工厂停产了，商店关门了，学校停课了，铁路不通了，电话不响了，电灯不亮了，自来水不流了。市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人们呼喊着各种口号，纷纷向预定集合地点集结。

一小时后，数千名起义先锋——工人纠察队，开始统一行动。他们按照周恩来等人制订的作战计划，向被敌人占据的大大小小的军事据点发起了进攻。起义进展得十分迅速，当时毕庶澄部的鲁军为了便于撤退，主要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区。所以，其他地区的战斗都比较顺利。工人们用斧头、铁锉、木棒、铁棍、菜刀、石块和少量的枪支，攻占了一个又一个警察署。已经无心恋战的警察们，急忙脱下黑制服，扬起白毛巾，纷纷逃命。工人们边战斗、边夺枪、边武装，越战越勇。到下午四时，闸北以外的各区先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时，斗争的焦点集中到敌军兵力厚集的闸北区。周恩来当即决定：调集沪东、虹口和沪西的工人纠察队支援闸北，加强对北火车站的包围。其他各区的纠察队就地维持地方秩序，搜索残敌，追查工贼、敌探，发动群众管制。他还把指挥机构迁到了闸北第五区警察署。起义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四时左右，接到吴淞区委报告，敌毕庶澄部五百人左右，配备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企图从海上逃跑，因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故又掉头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周恩来接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召集会议商量对策。他在会上果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它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他指着地图宣布：选择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立即调铁路纠察队员一部于天通庵车站南将铁轨破坏，闸北工人纠察队一部由区委书记郭伯和指挥，在铁路两侧选择有利地形，构筑简单工事，就地埋伏，当列车出轨后，即时开火，包围列车，歼灭全部敌人。

黄昏前后，敌列车缓缓驶向天通庵车站，进入伏击圈。这时火车因道钉被拔而突然出轨翻倒，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向其猛烈射击。列车上的敌人毫无准备，被摔得晕头转向，又因车门被关闭反锁，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不久，沪东和肛口的工人纠察队也赶来投入了战斗。天黑后，敌军一部分士兵下了车，坚守待援。这时，周恩来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赶

快投降”。经过一夜战斗，敌军士兵见援兵毫无希望，军心开始涣散，火力减弱。到第二天中午，除少数敌人溜走外，其余四百余人扬起白旗，丢出武器，全部向工人纠察队投降。天通庵车站伏击战的胜利，不仅消除了工人纠察队腹背受敌的危险，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与反动派浴血奋战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斗志。周恩来命令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来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员，并将轻机枪调给正在围攻北火车站的纠察队，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

周恩来在安排、指挥天通庵车站伏击战的同时，对围攻东方图书馆的战斗也做出及时而又重要的指示。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别称，位于宝山路中段，当时它是敌军军需处所在地。这是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守敌有一个排的兵力，并配备有两挺轻机枪和充足的子弹，敌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由于东方图书馆是起义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之间必经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战略上讲，这个据点必须早点拿下。起义前，工人纠察队去这里察看地形，已引起敌人注意。总攻一开始，敌军以密集火力向下扫射，拼命死守，使工人纠察队牺牲三人，受伤一人。许多工人急了，准备利用梯子和搭起的桌椅爬越围墙，向里硬冲。也有一些人主张用火攻，把敌人烧死在里面。这时，周恩来及时赶到，他对这种做法加以制止，说：你们这样上去跳墙，容易暴露，牺牲太大。他也反对使用火攻方式，他说，这个地方最好不要损坏，更不能烧毁，因为这些建筑解放后都是属于人民的。

他在认真察看地形后，决定采用“围而不打”的战术，以减少纠察队的人员伤亡。他一方面指示工人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对面的楼上部署火力，严密监视。敌人一露头，立刻猛烈射击。一方面他要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东侧挖一条一百多米长的交通壕，来保护总指挥部同北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线。他说：我们打下了北站，这个孤立的据点敌人自会放弃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工人纠察队对守敌围而不打，并进行政治喊话，这样坚持了一天。

天通庵车站战斗结束后，原在那里参加战斗的工人纠察队赶到东方图书馆。指挥部用广播喇叭向守敌宣传天通庵车站战斗的情况，劝告他们立刻放下武器，投降人民。下午四时半，敌军用白毛巾扎在竹竿上伸出墙外，表示投降，并停止射击。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懂得对方悬挂白旗的含义，仍在继续进攻，又牺牲了六个人。这时，周恩来来了。他立刻命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总指挥部随着也由闸北第五区警察署迁入东方图书馆。这时，敌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固的据点——北火车站。东方图书馆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周恩来就立即赶往北火车站，亲自指挥那里的战斗。

北火车站有守敌两千多人，是守敌最多、武器最强的一个敌人据点，军阀毕庶澄亲自在这里督战。他设计了一个立体的防守工事，北站的屋顶上设有重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着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配备有迫击炮两门。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还有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重机枪阵地。毕庶澄企图凭借武器上的优势，固守北火车站，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反扑。

21 日下午起义打响后，周恩来一直关注着北火车站的战斗进展，并直接指挥对守敌的围攻。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他作了周密的部署，指示纠察队员在轻机枪掩护下，在虬江路到北站间修起三道防御工事，以便接近并包围敌人。黄昏后，敌装甲火车上迫击炮及租界方面重机枪的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居民住房着火。火借风势，蔓延开来，顿时形成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上海夜空。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抢救衣物，并向纠察队的阵地上涌来。周恩

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击，立即赶到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有秩序地转移疏散，另一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果然，敌军乘这个机会发动出击，准备突围，密集的炮火使得工人纠察队被迫后退。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的纠察队向敌人猛烈回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居民区的大火也被扑灭。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前沿检查工事，并同纠察队员一起扛木料，修工事。突然，一发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立刻卧倒，全身溅满了泥灰。他毫不在意，禅去身上的泥灰，继续干了起来。一位纠察队员对他说：总指挥，这里是前线，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周恩来笑着说：当指挥的怎么能不来？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在场的纠察队员为周恩来临危不惧的精神所感动，更增强了战斗的勇气。

22 日下午，毕庶澄见大势已去，悄悄地换上便服，逃进租界。敌人的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五时，按照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命令，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准备对北站守敌发起总攻。周恩来站在三叉路口的高地上，对他们讲话。他叙述了各区敌人已先后被消灭的情况，接着说：现在敌人两千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淞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求在六时以前攻占北站，结束战斗。各路纠察队员士气高涨，立刻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向北站发起猛攻。周恩来还叫纠察队员们准备了许多煤油桶，在桶里点燃鞭炮，发出像机关枪似的声音，使敌人胆战心惊。英勇的纠察队员发出震天的冲杀声，从四面八方猛打猛冲，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六时，起义队伍攻下了这座敌人的最后堡垒，北火车站大楼上飘起了红旗。起义成功了！

当天晚上，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经过连续三十个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辉煌的胜利。五千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开始时虽然只有一百五十支枪和少量手榴弹，但由于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又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发动起义，不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有计划地扩大胜利成果，终于打败了武器精良的反动军警，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并建立起革命的民主政权。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记录之一。作为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在准备、发动和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中，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显示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他的坚定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指挥若定的领导风格，也对这次起义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指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①]。但上海工人阶级的行动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的恐慌，“他

[①] 《向导》第 193 期，1927 年 4 月 6 日。

们尽力注定目标向上海工人进攻”，人民要警惕反动派的阴谋活动。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丝毫没有懈怠，他按照党的“一切指挥集中，恩来出来找一个地方接洽重要事”的指示[1]，密切注视着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潜伏着的那股反革命暗流。他积极部署，使上海工人阶级用缴获的五千支枪武装起来，组织起六万八千人参加的工人纠察队。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成功地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并建立起一支崭新的革命工人武装。此时的周恩来已经预感到，一场更艰苦的战斗很快就要到来了。

---

[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8 页。

十二 “四一二”前后

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上海工人阶级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准备在取得上海、南京后就实行“清党”。大革命的形势正在急转直下，人民革命事业已处于危在旦夕的险恶境地之中。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统率下的北伐军一部，在上海工人同军阀部队浴血搏战时已推进到上海南部的龙华。可是，他们一到那里就停止了脚步。上海总工会派出代表，要求他们迅速进兵，援助苦战中的工人起义队伍。白崇禧却奉蒋介石密令，借口“军队初到，很疲困”，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正在白崇禧指挥部参加军事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竟然露骨地说：“北伐军绝不支援上海工人纠察队。让毕庶澄消灭了纠察队再进上海。”工人代表当即回击说：“上海工人纠察队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解放全上海。”直到工人起义队伍攻克了北火车站，胜败大局已定时，白崇禧才挥兵北上，进驻上海。由薛岳指挥第一师在麦根路车站将毕庶澄的一部分溃兵缴械，并把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 209 厂迅速抢占在手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也设在兵工厂内。

3 月 26 日，蒋介石乘坐楚同号军舰沿九江、安庆赶到上海。他一到上海，便立即和集中在那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和帮会流氓头子会面，着手策划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两万多军队帮助蒋介石，并通过租界为蒋介石提供一切便利；上海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蒋介石筹集了巨额资金；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势力作出了组织反革命打手的保证；国民党右派分子还纠集一批社会渣滓，成立了以拥蒋反共为宗旨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分庭抗礼，蒋介石专门派人为这个反动组织送去了写有“奋斗到底”四个字的锦旗。同时，蒋介石还将上海、南京等地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和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调离，另调其嫡系部队开到上海及沪宁铁路沿线。

蒋介石把掌握一部分武装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看作是他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最大障碍。他到上海后，以“外人说话”作口实，要求上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来又要求把纠察队改归他指挥调动。上海总工会以“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己组织”为理由，加以拒绝。对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蒋介石也不予承认，下令要它停止活动。他还利用国民党右派的报纸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工人手里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必收回枪械以维持治安”，“工人没有资格带枪，工人不把枪交出来，自己会内讧”，等等。

周恩来一直密切注视着蒋介石一伙的动向。3 月 25 日，他从各种信息中敏锐地察觉到一些反常的迹象，他向中共中央报告：白崇禧将薛岳师调开，将刘峙师调来闸北，是要对付我们的纠察队。我们要主张“拥护留薛”[①]。30 日，他在特委会议上报告：“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断言：“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8 页。

佣流氓”[②]。后来事情的发展，确实如他所预计的那样。工人纠察队员缪龙江回忆道：当时周恩来对蒋　　介石一伙要缴工人纠察队的枪的阴谋，给予了严厉的驳斥，他说：“上海工人赤手空拳，敢于同反动军队作英勇斗争，缴了反动派的枪。他们有勇气，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资格带枪呢？　　我们还要北上，工人纠察队是一支力量，为什么要缴他们的枪？”有一次，国民党右派控制的中华共进会的流氓朝天开枪，向工人纠察队挑衅，周恩来坚决命令把这些流氓抓起来审问。上海总工会连续发表声明和启事，揭露和指责反动派策划解散工人纠察队的阴谋，对反动势力给予严正的警告。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共产国际的代表和陈独秀等人，醉心于对蒋介石持妥协和缓和态度，他们对周恩来发出的警告和党内的正确意见，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响。

4 月初，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后，加紧进行反共的秘密策划。4 月 1 日，蒋介石同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会谈，提出赶走鲍罗廷和分党两件事。2 月下午，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吴稚晖等，同特地从广西悄悄赶来的李济深、黄绍竑，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由吴稚晖提出“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叛逆有据”。这次会议决定“早日清党反共”。3 日，蒋介石又同汪精卫会谈，达成了“清党分共”的协议。在具体方法上，蒋介石主张立刻以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务纠纷”问题。5 日上午，蒋介石等人又举行一次秘密谈话会，决定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咨请有关当局对共产党人作“非常紧急处置”。同日，蒋介石下令将刚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来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他还指派吴稚晖、陈果夫、白崇禧、钮永建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掌握上海的军政财权，篡夺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成果。4 月 9 日，蒋介石颁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为上海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至此，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蒋介石在布置他的心腹杨虎留驻上海监督执行政变计划之后，悄然离开上海，去了南京。

这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仍醉心于向蒋介石妥协让步，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他不但没有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反而于 4 月 5 日同汪精卫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称：“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并未必终不可解释。”[①]这篇宣言，帮助掩盖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对 上海工人阶级起了解除精神武装的恶劣作用。在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放弃了最后一线反抗敌人武装屠杀的机会，革命成果被他们白白葬送了。

在“四一二”政变的日子里

4 月 11 日深夜到 12 日凌晨，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发生了。

[②] 周恩来在特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436 页。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 页。

蒋介石是富有反革命政治经验的，他在这个事件中使用了极端阴险和卑鄙的手段。11 日深夜至 12 日凌晨，集结在租界内的上海青红帮的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一齐出动，向上海总工会（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发动袭击，枪声刺破了上海宁静的夜空。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反击。正在这时，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先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并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二十六军官兵放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就变了脸色，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这时机关枪已经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几处的情况，大同小异。

周恩来当时住在设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在事件发生前，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派人送信给周恩来，邀请他到第二师司令部谈判。周恩来虽然预感到形势危急，但又认为斯烈不会立即动手，还可以利用和争取他，于是就应邀前往。

12 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去二师司令部谈判的消息后，万分焦急，立即要与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员黄逸峰速找赵舒营救，以防不测。黄逸峰回忆说：“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词严地对着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

赵舒和黄逸峰赶到后，赵舒一面与周恩来打招呼，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斯烈询问事情的经过。原来，斯烈当时并无恶意，他的弟弟斯励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在赵舒等人的影响下，斯烈对周恩来素来敬佩。在接到周凤岐袭击工人纠察队的命令后，他仅凭借个人的感情，想让周恩来离开那个即将发生惨祸的危险之地，所以才邀请周恩来赴二师司令部谈判。而他根本没有想到，周恩来对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所关心的是整个上海工人阶级的安危。赵舒与斯烈商量过后，决定立即送周恩来脱离这个危险的地方。赵舒亲自用汽车把周恩来护送到北四川路罗亦农同志办公所在地。赵舒护送周恩来离开闸北以后，心情沉重。当天，他便通电全国，辞去二十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以示不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不久，斯烈也称病离开了这支反动军队。12 日清晨起，各厂工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后，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工人数万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南市群众冒着大雨到东路军总指挥部请愿，要求立刻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取缔反动团体。

13 日，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上午十时，周恩来和赵世炎出席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当游行队伍行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遭到叛军的血腥屠杀，当场打死一百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宝山路血案。当时住在闸北的郑振铎、胡愈之等人，亲眼目睹了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在第二天致函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对叛军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控诉。函中写道：“四月十三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

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已被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枪械。群众行至鸿兴路口，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鸿兴路口三十六军司令部门口守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上之群众，标准扫射，历时十五六分钟，至少当有五六百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成血海。”“此为昨日午后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他们愤怒写道：“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段棋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乃竟忍心出之。”[①]

13 日下午，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封闭。 14 日下午，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昔日的盟友突然翻过脸来，转成冷酷凶残的刽子手。蒋介石发出了通缉革命者的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并出八万大洋来买他的头颅。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全部转入地下。周恩来在 14 日转移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离市区远，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附近居住的大多是吴淞机器厂的工人，是一处很合适的秘密据点。

力主出师讨伐蒋介石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没有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中央特别委员会在秘密状态下，于 4 月 16 日和 18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周恩来在 16 日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十分愤激的发言。他说：“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①]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意见书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针对陈独秀等人的右倾主张，意见书强调：“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周恩来等力主坚决讨伐蒋介石，提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18 日的特别委员会会议，议题是讨论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主张我们要有一个结论”。他着重指出：“中央政策动摇，

[①] 《牺牲》，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印行，1929 年 3 月 15 日。

[①] 周恩来在特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458 页。

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初是模糊，后来是妥协”，“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直到缴械以前并未停止。”他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提到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去，“此次大会，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他还批评：“此次运动东方局也要负责，大会也要提出讨论，并要注意以后整个党的统一指导问题。”②

中共五大定于4月27日在武汉举行，中央通知周恩来和李立三、罗亦农等，在25日前赶到汉口参加会议准备工作，留下陈延年代理上海区委书记。但周恩来因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问题还需要处理，没有马上成行。在聂荣臻的协助下，周恩来拟定了工作计划，将在“四一二”事变中保存下来的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起来。他还对江浙一带的地下武装斗争做出安排。三十年后，他谈到：“那时候，按理应该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果那时我们把力量暂时撤退到农村中去，那就会保持很大的干部力量。”“当时江浙两省农民运动已有相当发展（当然比两广，比湖南、江西要差一点），如果我们工人武装和农民结合起来，无论如何是可以保持力量的，当然长期坚持还是有困难的。”①

在反革命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时候，周恩来一直惦念着远在广州的邓颖超。从周恩来离开广州后，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之间音讯不通。周恩来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邓颖超也不知道。“四一二”事变后第三天。广州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清党事件，开始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此时邓颖超因难产后身体没有恢复，住在医院里，她怀的男孩没有活下来，陈铁军化装去医院找她，要她赶快离开。也就是在这时，她接到了周恩来的通知，要她赶快到上海，用化名登报找他。当时广州局势已十分严重。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连夜把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由护士送她上了去上海的轮船。5月1日邓颖超到达上海。周恩来在报上看到由邓颖超母亲杨振德署名的找寻伍豪的启事，立即派人去把她们接走。邓颖超先在一个医院内躲了两个星期，以后找了所房子。周恩来在那里一起住了几天，就先动身去武汉了①。

为了避开反动军警的追捕，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周恩来化装后由一个交通员悄悄地带他到虹口码头，搭上一艘英国轮船，上船后他躲到三等舱里，整整两天没有出来。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党派了带着武器的保卫人员与他同船前往武汉。到了九江，才松了口气，周恩来可以到甲板上散散步了。船到汉口时，码头上恽代英正在焦急地等着他，随后，恽代英驱车把周恩来接到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居住。

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

周恩来到达武汉，已是5月下旬，此时武汉的局势已经开始恶化，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处于紧急关头。

“四一二”事变后，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并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由此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

---

① 周恩来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老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2月22日。

① 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1985年6月5日。

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在一个时期内呈现出继续高涨的景象。4 月 17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国民党中央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国民政府下达了通缉蒋介石的命令。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到武汉，并于 20 日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在两湖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 月 19 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代誓师大会，此后，北伐军在河南前线节节推进，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讨蒋运动和北伐都未能阻止武汉地区形势的逆转。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武汉同外地的联系被截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资本家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使得金融阻滞，物价高涨，日用品缺乏，工人大批失业，人心浮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动分子，更在积极准备叛变。5 月中旬，也就是周恩来抵达武汉的前夜，这种危机终于表面化了。17 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嘉鱼公开叛变，叛军先头部队推进到离武汉南面只有六十多公里的地方，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 21 日，驻军长沙的团长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残酷屠杀大批革命群众。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武汉的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周恩来到武汉时，中共五大已在十多天前结束，在那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周恩来一到武汉，立刻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5 月 25 日，中央决定中央秘书长一职改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转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

中共中央军事部的班子，是以湖北省委军委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原来人手很少，只有聂荣臻、欧阳钦等五六个人。周恩来到后，增加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很精干，总共不到十个人。那时的中央军事部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他们抓紧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派人到北伐前线慰劳伤员，在武汉宣传北伐的胜利；同时向北伐军中陆续派去不少党员，包括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中央军事部还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军。

为了挽救危机中的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于 5 月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挽救危机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开展土地革命；吸收新的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收到这一指示后，认为其中的各项措施都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指示也采取消极态度，他甚至把这一指示的内容告诉了汪精卫，成为汪精卫叛变革命的一个借口。反动派加快了他们的反革命步伐。6 月 5 日，汪精卫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的职务。6 日，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13 日，汪精卫从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后回来，宣布唐生智部主力全部从河南回师武汉。20 日，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公开向右转，要求宁汉合作，把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此时的武汉三镇，己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景象，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

周恩来等曾经尝试过进行最后一次努力来改变危局——发动湖南农民暴动。那时，湖南农民运动的力量很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部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

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兵武汉。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6 月 17 日和 20 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举行湖南暴动的计划。他指出：现在浏阳、平江一带农军还有八千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十人（其中有营长三人）到那里去。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他提出，在长沙设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技术上建立交通处。并说明准备另派一百五十人到各地做农军及地方工作。会议同意了他的计划，决定成立湖南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他前往湖南指挥这次暴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此时表现得犹豫不决，他把暴动计划改了又改，最后，在听了一个关于湖南情况的不准确的情况报告后，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专横地推翻了会议的决定，取消了湖南暴动计划。在敌人已把屠刀放在我们脖子上的时候做出取消暴动的决定，无异于束手待毙。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到罗易，同他争辩起来，但罗易的决定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支持，这个挽救革命的最后一条生路最后还是被抛弃了。

6 月 28 日，周恩来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在会上报告了第三十五军何键部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的消息，说明中央军事部和省委军事部已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参加第四军。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会后，周恩来、张太雷在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问题时，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

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

面对武汉政府的日益反动，陈独秀拒绝党内的正确意见，坚持实行妥协退让政策，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路线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强烈反对，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这次改组虽然晚了一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这次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的地位，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前提。二十九岁的周恩来也由此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开始挑起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宣言》指出：“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摆在临时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紧急地撤退大批共产党员，把大革命时期处在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

事变。而这时，李立三、张太雷已去江西九江，李维汉刚从湖南来到武汉，张国焘又是一个爱说大话、少干实事的人。大量繁重而又紧急的工作重担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尽管留下的时间是那样的短暂，周围的环境是那样的险恶，但周恩来始终沉着地、有条不紊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各种棘手的问题，出色地赶在敌人大屠杀之前完成了把党转入地下的任务。

反动派也在同样紧张地实施着他们的反革命政变计划。7 月 14 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 日，又召集分共会议，并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宁汉合流，公开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断然作出了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周恩来，以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前往南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艰难、最为辉煌的一次伟大壮举！

十三南昌起义

历史性的决策

风云突变，烟雨莽苍。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

7 月 18 日，刚刚从汉口迁移到武昌的中共临时中央，在蛇山山麓的啸楼巷举行了秘密会议。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以贺龙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以叶挺为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全权领导起义。这个决定，不仅因为周恩来在临时中央分管军事，而且还由于他有成功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会后，周恩来立即赶往中央军委，着手布置准备工作。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他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又写道：“七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后，恩来回军委连夜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五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他说话时态度严肃，语调坚定，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等三人很快来到了九江，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与此同时，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吴玉章等人，也因武汉形势紧张，由武昌转移到九江。7 月 20 日，谭平山召集这些同志和叶挺在九江召开谈话会。会上，有的同志显得很激动，主张立即动手。对此，聂荣臻发表意见说，临来的时候，周恩来交待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决定等待中央的命令。会议还决定不依靠新军阀张发奎的力量，而由共产党人单独领导南昌起义。李立三在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得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二、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①]

[①]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8 页。

这时形势已更加紧急。对九江谈话会提出的这些意见，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24 日，中共临时中央再次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南昌起义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及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他还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对起义部队予以军人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样，南昌起义的部署就正式确定下来。

军情紧迫，刻不容缓。当晚，周恩来就告别了邓颖超，在一片夜色中，踏上了去南昌的征程。邓颖超后来回忆道：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②]。

起义的前夜

7 月 26 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向正在讨论有关起义各项问题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他针对讨论中发生的是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的争论，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从而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并做出了决定。周恩来又找到聂荣臻，要他立即赶到位于九江、南昌之间的马回岭，将第四军的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因为这个师是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保留着不少革命骨干。后来跟随朱德上井冈山的，主要就是这支队伍。

7 月 27 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还处于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据当时见过他的人回忆，那天他穿着灰色中山装，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皮包，下车后径直到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陈赓也陪同到达。一到南昌，周恩来立即投入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在他到达南昌的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通过抢修恢复的铁桥，先后开到南昌。在此前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吴玉章、林伯渠、郭亮、方维夏、徐待立等人，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张曙时等，也陆续到达南昌。也是在这一天，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

江西大旅社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是一幢高大的五层楼房，后来它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由周恩来任书记。这次会议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落实了起义总指挥部的组成人员，并决定在 7 月 30 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第二天，周恩来前往子固路第二十军指挥部去见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②] 邓颖超：《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99 页。

这时，贺龙虽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他对革命胜利有着坚定的信念。6 月初在武汉时，周恩来前往贺龙住处，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对政局的主张，征求他对回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意见，那时贺龙就明确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

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时候，29 日上午突然接连收到中央代表张国焘从九江发来的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前委其他成员商议后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这个决定，为南昌起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0 日早晨，张国焘到了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这是一次决定起义部队数万人命运的关键性会议，也是决定革命前途的生死攸关的会议。不同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张国焘的意见，当即遭到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的坚决反对。周恩来明确表示：“还是干。”前委几个成员都指出：“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①]张国焘一看受到那样强烈的反对，就说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平时对人很温和的周恩来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说话时还气得拍了桌子。二十多年后，他对人说道：“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用多数来决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得不休会。谭平山十分气愤，在会后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了，他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31 日早晨，前敌委员会继续开会，经过数小时的争论。此时，汪精卫、张发奎在庐山作出反共决定及封闭九江《国民新闻报》的消息传来。贺龙、叶挺还收到张发奎的电报，要他们立即带部队回九江，并说他于 8 月 1 日前来南昌。接到这个电报，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就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是否应立即干的问题，已无讨论必要了”。在他表示服从多数以后，会议就起义时间、宣言定稿、革命委员会组成等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并决定在 8 月 1 日凌晨举行武装暴动。

31 日下午，起义的准备进入最后阶段。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分别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和前委的决定，宣布起义的命令，并给各团、营明确了战斗任务和有关规定。晚九时以后，全城戒严，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部队分别进入了指定的战斗岗位。参加起义的官兵都佩上红领带，在手电筒、马灯的玻璃罩上面贴上红十字，作为识别的标志。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第二十军第一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这个军的一个士兵发现了，立刻向贺龙报告。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周恩来镇定自若，为了保持起义的突然性，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果断地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发动。

[①]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0 页。

打响第一枪

8 月 1 日凌晨二时整，一声枪响划破了静寂的夜空。起义开始了！周恩来以“炮兵营”为代号，在于家前巷的一所学校里指挥战斗。他站在南昌市敌我态势图前，坚毅沉着地掌握着战斗的全局。贺龙、刘伯承、朱德、叶挺等不断派人来传递战斗信息。起义部队两万余人向盘踞在南昌城内的各部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贺龙、刘伯承指挥二十军第一、二团，向朱培德的第五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敌人总指挥部设在藩台衙门，配有一个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带来的精锐部队。敌人事先得到叛徒的告密，做了些准备，他们凭借精良的武器和有利的地形，进行抵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起义部队的进攻一度受挫。周恩来得知后，十分着急，他知道，南昌周围有好几支敌人的部队正火速向南昌压来，如果不迅速解决敌人的总指挥部，消灭南昌全部敌人，尽快结束战斗，形势会变得十分不利于起义军。他指示贺龙、刘伯承，一定要设法尽快拿下敌第五军总指挥部。贺龙、刘伯承亲临前沿，调整了进攻方向，在火力掩护下，抢占了敌总指挥部附近的鼓楼制高点，使整个敌人总指挥部都暴露在起义军有效射程里，机枪手架起机枪，狠狠地向敌人扫射。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大部分被消灭，其余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官兵在俘虏中发现了告密的叛徒，立即押往军部，给予了严厉的惩罚。

松柏巷天主堂的战斗，也打得十分激烈。担任主攻任务的是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敌人把天主堂的大门紧紧关闭，利用坚固的掩蔽物负隅顽抗，他们调集几乎所有的轻重机枪，架在天主堂的钟楼上，封锁了狭窄的松柏巷。为了攻下敌人的阵地，一支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组成的先锋队，出现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在火力掩护下，迅速冲入敌军阵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敌人终于支持不住，向起义军投降。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个整夜。到清晨六时，城内的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三千多人，缴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起义终于胜利了。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染红了这座刚刚属于人民的城市。兴奋的人们从各个地方汇集到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门前，庆祝起义的成功。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来到门前石阶上，高兴地同群众会面。尽管连日来紧张工作，但周恩来依然毫无倦意，英姿勃发。在群众的欢呼声和掌声中，他发表演讲说：“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

8 月 1 日上午九时，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叶挺在会上报告了起义的经过。然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周恩来、叶挺、恽代英、谭平山、彭湃等二十五人为委员。当天，还发表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提出了毫不妥协地打倒蒋介石新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维护工农利益等政治主张。

随后，在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主持下，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8 月 2 日，革命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

军长。

南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兵力，向南昌反扑过来，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起义军于 8 月 3 日撤离南昌，启程南下，踏上了向广东地区进发的艰难里程。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亲身参加领导这次起义的周恩来以后这样说过：“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①]李立三在回忆中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②]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1933 年 6 月 3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把南昌起义的日子——8 月 1 日，定为建军纪念日，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缔造者之一。

[①] 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1972 年 6 月 10 日，手稿。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第 267 页。

结束语

历史的长河，惊涛拍天。周恩来在对科学真理的不断追求和探索中，在争取中国人民自由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度过了他的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在风雨漂泊的二十九年中，周恩来由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成熟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他的成长道路，是那一代革命青少年求索过程的一个缩影。他的最后抉择，代表了那一代革命青年的历史性抉择。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开拓历史的人物，周恩来首先是被历史塑造的。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奋斗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透过周恩来青少年时代闪光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从危亡中拯救国家和人民的人生日的和勇于进取、锐意求新的人格力量。从少年时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青年时代东渡日本前夕的“邃密群科济世穷”，从五四运动中的“革心！革新！”到初到欧洲时的“研究主义”、“推求比较”，从黄埔军校时的“复活辛亥革命精神”到南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人格的自我完善与追求民族幸福的崇高理想，在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身上得到了完善和谐的统一，从而为他后半生成就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代在前进，每一代青少年都会有自己的探索，自己的使命，然而，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启迪和思考却是永远存在的，它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新中国青少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续探索，奋勇开拓，谱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新篇章！